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热”。经过 20 多年来的发展,今天我们完全有把握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本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以后,国际上出现的任何重大的社会思潮,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贷思想资源,甚至直接地或间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相关的思潮或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次,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许多国家已经经历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蕴涵着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否会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理解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一系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国内理论研究者的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兴趣。再次,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当然应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致力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以便确保我国的精神生活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高点上。

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的耕耘者,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研究领域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复旦大学哲学系于 1985 年建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室;1999 年升格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0年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小基地”）；2004年，在小基地之外，建立了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级创新研究基地（该研究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简称“大基地”）；2005年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设博士点。2006年，全国又建立了21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马哲史或外哲史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而小基地和大基地的相继建立也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之所以要策划并出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其直接的起因是：通过投标和竞标，我们获得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和基本理论研究》。这个课题促使我们凝聚大、小基地的全部学术力量，及博士后和博士生中的佼佼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做出全方位的、有穿透力的研究。这套丛书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系统性。本丛书试图通过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即“区域研究”、“流派研究”和“问题研究”来构建这种系统性。“区域研究”重点探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流派研究”主要探索国外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等；“问题研究”侧重于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等。通过这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这套丛书将全面而又有重点地勾勒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面貌。

其二，前沿性。本丛书对“前沿性”的理解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上。也就是说，重点考察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是什么？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哪些有影响力的著作和论述？他们正在思考哪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然，为了把前

沿问题叙述清楚,也需要做一些历史的铺垫,但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前沿的问题上。

其三,思想性。纳入本丛书出版规划的著作,除译著外,都充分体现出对思想性的倚重。也就是说,这些著作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反思性的”、“研究性的”。它们不仅要弄清新的现象和资料,而且要深入地反省,这些新的现象和资料可能给传统的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造成怎样的挑战?如何在挑战与应战的互动中丰富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发展?总之,它们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思想的贯通。这也正是这套丛书不同于其他丛书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套丛书在策划的过程中就得到了重庆出版社总编辑陈兴芜编审和该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吴立平的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基本理论研究》(课题批准号为04JZD002)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俞吾金 陈学明 吴晓明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续总序

---

这套《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早在 10 年前就由重庆出版社推出，前后共出版了近 20 部书，由俞吾金教授任主编，陈学明、吴晓明任副主编。当今天再次筹划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时，俞吾金教授已谢世一年多，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他的敬意与怀念。

俞吾金教授在“总序”中已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特点，以及对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都已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仅做若干补充。

与 10 年前相比，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刻认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明确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二级学科。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二级学科，而主要是通过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体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流传进我们中国的。中国学者已经对其进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译介和研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从 21 世纪初至现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实践中，先前的思想障碍逐渐被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理解要求出现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意义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助成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20世纪末到现在,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某种对照性的理论资源,既为论证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有参考意义的理论说明,也为破解中国道路面临的难题提供借鉴性的理论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因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显学。我们这套丛书的价值与意义是同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清醒地知道,一套丛书的命运固然主要是取决于社会对其需求的程度,但同时也离不开这套丛书自身的品质。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使这套丛书的品质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我们打算做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

其一,原先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或者某种思潮、某种流派,现在我们力图强化“问题意识”,在继续推出研究人物、思潮、流派的著作的同时,着重出版以问题为导向的著作。

其二,原先我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西方的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现在我们试图进一步扩展视野,把更多的思想家包含进来。具体地说,本丛书所涉及的国外思想家将包括“三个圆圈”：“核心的圆圈”还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思想家;再扩展到那些并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国外左翼学者;最后再往外扩展到那些

2 “左翼”以外的学者,只要他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就将成为我们的

研究对象。

其三,原先本丛书的作者主要是我们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教师以及在这里就读的博士生,现在我们将本丛书扩展成整个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丛书,热忱地欢迎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相关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列入本丛书出版。

其四,原先本丛书的著作基本上是以“述介”为主,即主要是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把其讲清楚。现在我们提倡在走进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从研究对象中走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做出深刻的研究,本丛书还会继续出版“述介”型的著作,但将更加重视“研究”型的著作。

最后,我们在此对重庆出版集团致以谢意。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指出,重庆出版集团是对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早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他们就支持徐崇温教授推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当时作为青年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该丛书的写作和出版。我们所编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名著提要》(三卷本),作为该丛书的一个部分,在上海推出时,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亲自参加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重庆出版集团所做的工作。近30年时间过去了,重庆出版集团不改初衷,继续竭尽全力支持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在与我们商谈出版这套丛书时,根本不与我们涉及当前出版图书通常所见的那种所谓“出版贴补”之类,这着实使我们感动。这使我们在重新策划这套丛书时,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们希望以交出更多的优秀著作来回敬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陈学明 吴晓明



*History and Politics: On Perry Anderson's Thought*

# MULU

## 目 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1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续总序 1

---

### 导 论 1

- 一、安德森的学术思想简介 1
  - 二、国内外学者对安德森思想的研究状况 12
  -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路径与构成 22
- 

### 第一章 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解读 26

- 一、例外与普遍：命定论的复杂史观 26
  - 二、东方专制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解读 40
  - 三、差异的动态总体观 53
  - 四、抽象结构与经验事实 71
- 

### 第二章 安德森对左翼思想的研究与批评 84

- 一、对汤普森阶级文化心理主义的批评 84
- 二、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100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评述 111



---

**第三章 安德森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分析与批判 122**

- 一、后工业社会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122
- 二、当代世界霸权的“三重”特征 130
- 三、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霸权 139
- 四、中国崛起的道路与逻辑分析 152

---

**第四章 安德森的文化诊断与社会分析思想 158**

- 一、文化与文明的当代内涵 158
- 二、后现代主义的起源与特征 169
- 三、社会主义的文化与自由 175

---

**第五章 安德森对当代思潮的分析批判 186**

- 一、对奥克肖特“个体性”思想的批判 187
- 二、对哈耶克反民主思想的批判 192
- 三、对罗尔斯“设计共识”思想秘密的暴露 198
- 四、对哈贝马斯思想“背叛”的批评 202

---

**结 语 207**

---

**参考文献 210**

---

**后 记 222**



## 一、安德森的学术思想简介

提起佩里·安德森的名字,中国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政治学界的学者并不陌生。身为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史家、新左翼知识分子,安德森为学严谨。近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引导着欧美新左派理论、政治斗争的方向,在西方左翼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称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sup>①</sup>。安德森后来转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先在纽约新学院大学从事研究,后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任教。除了自身过人的才情外,安德森的名望与他准确把握住新时期的经济结构转型,不满传统左翼的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和思想僵化有密切关系。新左派的兴起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结

---

<sup>①</sup>Terry Eagleton, in a Review of Ellen Meiksins Wood's *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1), *Guardian*, October 1, 1992.

构转型密切相关,安德森认为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标志着一个历史的拐点。自此之后,资本主义“非常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白领工人的出现和传统蓝领工人阶级比重的相对下降,大量中间阶层的涌现。从这些新的中间阶层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激进分子,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传统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进行政治认同的同时却又不能接受它们的政治路线和理论立场,从而保持了巨大的异质性。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左派”<sup>①</sup>。学生运动给安德森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安德森1938年生于伦敦,是个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婴儿期,早期教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完成,后回到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受到了汤普逊、霍布斯鲍姆、希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并以激扬的文字、透彻犀利的分析能力、纵观全局的历史眼光和务实的态度,在求学期间开始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分庭抗礼。安德森作为新左派中最有战斗力的一员,决意介入刚成立的《新左派评论》,很快成为新左派的核心,赢得《新左派评论》的主导权,并成为这一著名刊物的灵魂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很快成为欧美最重要的左派理论刊物,引领着欧美左派论争的主题和方向,翻译及介绍了当代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论著,分析和研究了欧美及第三世界的主要政治动向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安德森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主编《新左派评论》杂志,创办和主持新左翼书局(Verso出版社)外,还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大量的书评和访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也逐步确立了他在欧美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安德森的著述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现实展开研究。早在1961年的《瑞典:克罗斯兰先生的梦乡二》一文中,他就针对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人本个体主义的主张,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只有通过精致而复杂的与他者的应对关系,人才能获得自我的实现”<sup>①</sup>。同时又与纯粹的阶级还原主义保持了应有的距离,形成了跨中心、非单面的社会融合整体观。受葛兰西影响,安德森给予了资产阶级跨阶级的融合整顿能力应有的重视,主张工人运动应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进行结合。而在1962年的《葡萄牙和超殖民主义的终结》<sup>②</sup>一文中,安德森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基础:打破学术界历时性和共时性二元分离的方法论,将结构和发展的因素综合和统一起来,“任何社会……首先在结构上应该按照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系来理解,同时在过程上只能被理解为其过去的积累。困难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综合这两者”。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是真正做到把“纯粹的历史性和极端的功能主义结合和统一起来”<sup>③</sup>的唯一思想家。因此安德森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同时受到了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从而与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持久的距离。此外,安德森的“竞争性对抗”(competitive confrontation)概念无疑比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更有新意,认为世界的边界日益变得复杂模糊而多元。应该说安德森更强调对结构的未来颠覆和替代,而汤普森更重视传统激进思想的发掘与当代激活,主张只有从民族传统中抓住历史的记忆,才能克服当代的危机。

安德森的成名作《当前危机的起源》<sup>④</sup>一文,一经刊出便产生了重大影响,连同汤姆·奈恩的《工党的剖析》等论文<sup>⑤</sup>,共同构成了“安德森—奈恩论题”:第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法国彻底,它只改变了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Sweden: Mr. Crosland's Dreamland II," *New Left Review*, 1961(9), p. 36.

<sup>②</sup>Perry Anderson,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New Left Review*, 1962(15).

<sup>③</sup>Perry Anderson,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New Left Review*, 1962(15), p. 113.

<sup>④</sup>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sup>⑤</sup>Tom Nairn,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Left Review*, 1964(24); Tom Nairn, "Anatomy of the Labour Party (Part 1)," *New Left Review*, 1964(27); Tom Nairn, "Anatomy of the Labour Party (Part 2)," *New Left Review*, 1964(28).



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它的政治结构，结果在政治上依旧是土地贵族在统治英国；第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形成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革命意识形态，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保持着它的霸权地位——“革命的意识形态遗产几乎是零，清教是一种无用的激情”<sup>①</sup>；第三，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英国工人阶级既缺乏“革命”传统，又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洗礼；第四，从前三点可以得出，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

同时，安德森在该文中借鉴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试图创立一种有关历史轨迹和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具体的类型学”（a concrete typology）。在他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权力仅仅看做是经济基础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难以避免经济还原论的抽象和单一性，无法识别社会历史的丰富色谱。他明确指出，“需要的不是对权力最终来自社会所有权模式的这一陈旧观点的重申，迫切需要的是对当今不同权力形态的一种具体的类型学”<sup>②</sup>研究。在他看来，权力的运行方式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差异巨大，权力运行的方式是多中心的，它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层面和要素之中，这些层面和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形成一种整体的权力结构模式。安德森指出，英国“在旧贵族和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矛盾”，这是“理解现代英国历史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sup>③</sup> 在此文中，安德森提出了一个和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一致的问题，即物质生产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能与意识形态和权力架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存在不一致性。

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sup>④</sup>一文中，安德森提出了“整

---

①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in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 20.

②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47.

③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20.

④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ew Left Review*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Collins, 1966.

体的差异普遍性”<sup>①</sup>(a wholly uniferent universe)的概念,批评社会民主党未能认识到西方权力的多中心(polycentric)形态,从而陷入了议会政治的游戏之中不能自拔,并把议会神化为西方社会权力的真正所在。国家对于社会的他治和外在性是社会民主党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即西方的国家并非是单一的权力宝座,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霸权发挥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sup>②</sup>因此西方的社会主义策略就不能仅仅针对“国家机器,还要考虑市民社会的整个复杂地形”<sup>③</sup>。其组织方式也就不能仅仅是工联—社团主义的模式,否则就只能是完全的从属,而应该让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他们才是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来源。唯其如此,方能超越工人阶级的狭隘性,从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中汲取力量,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历史集团。<sup>④</sup>安德森还在葛兰西和萨特的影响下,提出了一个有别于右翼的选举主义和左翼的民粹主义的新视角,回避了改良和革命之争:在西方,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长期目标只能通过拒绝这两种战略才能得以实现,即用葛兰西所构想的创建霸权政党的计划,而且这个政党的组织方式应该是未来那个社会的模型,而不能寄生在其所处的那个社会结构中。并且,安德森十分强调霸权系统再生产的传统方式的中心地位,因为它是再塑造社会信徒的主要手段。

戴维·麦克莱伦曾指出:“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sup>⑤</sup>但在1976年发表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安德森指出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混乱与缺陷,即一方

---

①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ew Left Review*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Collins, 1966, p. 230.

②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ew Left Review*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Collins, 1966, p. 237.

③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ew Left Review*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Collins, 1966, p. 244.

④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New Left Review* (ed.), *Towards Socialism*. London: Collins, 1966, pp. 240-242.

⑤[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余其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52页。

面受到资产阶级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学说的影响,仅把国家理解成“外部的壕沟”(outer ditch),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或者自相矛盾地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构成中的一部分。<sup>①</sup>他同时批评了学界广为流传的误读,比如像科拉柯夫斯基所理解的那样:“无论如何,在葛兰西的学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工人们只有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sup>②</sup>先要掌握文化霸权,然后才能夺取国家的政治统治权,这是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解读方式。安德森认为强制性(coercion)仍然是现代西方国家合法垄断的暴力,但霸权却并非市民社会的专利,国家同样通过议会政治和福利国家行使着意识形态的统治(民主是霸权的赎金<sup>③</sup>)。葛兰西则未能意识到经济和国家本身也是重大的霸权和意识形态运作主体。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sup>④</sup>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史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是中国学者最初接触到的安德森著作,该书的中文摘译在1980年前后便已发表于国内的内刊之上,对中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界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起了重要作用。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特点作了宏观的透视和考察,书中所概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安德森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个同质性的传统,“卢卡奇、葛兰西和萨特的理论前提和关注重点存在重大差异”<sup>⑤</sup>,但他仍然力图总结出内在的共同性特征,用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洞见编织出一套共同的理论共性来。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战后随着无产阶

①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p. 26, 31, 33.

②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③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42.

④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中文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⑤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p. 31-32.

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欧洲失败的产物,这一理论传统表现为日益脱离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实斗争,退缩进美学、解释学和抽象的思辨哲学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行了自我检讨和反思,同时对哈贝马斯、后结构主义等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和评述。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安德森广泛享有盛誉的两本重量级著作,西方学界认为安德森在这两本书中将历史社会学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sup>①</sup>前者通过辨析东西欧、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显著差异特征,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最先起源发展于西欧;后者则分析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差异、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安德森的这两本著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受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反对线性进化历史观的单一模式,认为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标准来涵盖现实的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有许多交错的开端和各自错落的结局。它的基本统一性是真实而深刻的,但是这不是一条直线上的统一。因此世界历史是绝对结构和复杂变体的结合。两本书标题中的“过渡”(passages)和“系谱”(lineages)的复数形式就意在表达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这些思考对于今日中国在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独特发展之路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与此同时,安德森在上述论著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汤普森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呼吁重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形成了与汤普森所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对立的解释路径。在安德森看来,“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的口号,而且对我们理解过去产生重大影响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



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者，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sup>①</sup>。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一生的梦想，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机关。

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安德森开始受到科莱蒂和曼德尔等人的影响。不同于阿尔都塞，科莱蒂在批评黑格尔的同时，认为异化概念并非是黑格尔的遗产，因此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断裂。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性在于对客观因果关系的分析上。而这种因果性的关系并非是机械而又简单地对生产进行强调，并且将生产视为整个历史的核心要素的并非马克思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元性特征。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非常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它是一个随社会历史而变化的社会性活动，并在生产力的转换、生产关系的变迁、政治和意识形态及其他上层建筑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异质性体系结构，因此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学的，并且不存在纯粹一般的社会抽象，任何社会都既有一般社会的特征，也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安德森在对科莱蒂的思想进行介绍时，充分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

汤普森 1978 年发表著名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sup>②</sup>一书，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高调的冷嘲热讽和批评，在新左派内部引起哗然。作为第二代新左派理论旗手的安德森，带领斯图亚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等新锐思想家纷纷发表论著，对汤普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驳斥。安德森 1980 年出版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就是主要围绕汤普森的指责，从理论和政治上就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评进行的回应。该书还对汤普森的“共同决定观”（主观与客观）、把阶级等同于阶级意识、工人阶级早在 1830 年便已完全形成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5—6页。

②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等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分析。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对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适度辩护,进一步维护马克思生产方式赋予社会形态基本的统一性立场的同时<sup>①</sup>,安德森在该书中也充分采纳吸收了汤普森的方法和优点。<sup>②</sup>该书内容涵盖历史学、能动性、如何理解马克思后期著作、乌托邦等诸多方面,具有较为厚重的理论含量和论辩深度,被埃利奥特称为安德森信条的集中展现。<sup>③</sup>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社会历史现实所发生的一系列改变,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等等,众多右翼学者纷纷发表著述,论证“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必将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自此之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将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理念的实现进程是不可更改的。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及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任何其他所谓的进步制度都是不可行的”<sup>④</sup>。安德森亦据此认为新左派内部“抛却旧的争吵,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将是有益的”<sup>⑤</sup>。

面对苏东剧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新形势,安德森也悲观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讣告。<sup>⑥</sup>他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完成从福特制(垄断资本主义)到弹性生产(晚期资本主义)的转型,无产阶级将因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变得更加多元化,这必将有

①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80, p. 55.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③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 13. 不过保罗·布莱克利奇认为这只能代表安德森早期革命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因为安德森晚期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资产阶级学者给社会主义所开的讣告。

④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⑤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80, p. 207.

⑥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p. 93.



助于资本主义迅速吸收矛盾,将社会更全面、更严密地组织起来。安德森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不管实践中有多少局限,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影响之广甚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无一例外是地区性的”<sup>①</sup>。当前的“社会结构总是按照右派的意愿被组织”<sup>②</sup>,而“左派并不比中派和右派看得更清楚或更富于想象力,犹豫不决和迷惘依旧是它们的标准反应”<sup>③</sup>。面对这一不利局面,安德森认为“60年代人在其中成长起来的那个完整的地平线实际上已经被抹去——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界标在同等程度上被抹去了”,“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性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所有对其制度的威胁”,“在目前视野内,仍然没有一个集体力量能同资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如果人类改变这个体系的力量被重新释放出来了,它将就是资本本身的新陈代谢。对此我们不能扭头不顾。因为另一种秩序形成的秘密只能存在于旧秩序的发展之中”<sup>④</sup>,可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安德森自己也全然没有了早期的乐观心态,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线,重新开辟一条革命路线的机会已大大增加。理论和实践的这样一种重新结合的结果,将改造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创造出曾在当年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的那些条件来”<sup>⑤</sup>。

回过头来看,安德森进一步确证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并非资本主义崩溃的标志,而是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结构转型的象征,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象征。因此,福特制的垮台所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而是晚期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直接动力肯定存在于新出现的富裕的雇员和专业人士阶层,他们是

①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7.

②[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2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④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2000(1), p. 17.

⑤[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和投机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sup>①</sup>。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中进一步强大,仅剩的工人阶级在资本向全球转移的过程中也被收编并逐渐丧失阶级意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可能受到左翼运动失败的刺激,安德森开始下大功夫去了解研究左翼的对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专论:迈克尔·奥克肖特、里奥·施特劳斯、弗·冯·哈耶克、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弗朗西斯·福山……他最长的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福山的,研究范围遍及政治、历史、文学、国家关系、法律、社会理论等领域,对历史的终结、现代性与革命等学界关注的话题,都一一给予了独特的梳理与分析。<sup>②</sup> 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中,《英国问题》收集了三篇发表于1964年至1968年间的深远影响的文章:《当前危机的起源》、《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构成》,它们一道构成了理解早期英国新左派必读的经典文献,并且和《交锋地带》一起构成了左翼内部相互批评和论争的经典文本。《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则左、中、右同时开弓。安德森在书中将奥克肖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并划进“顽固的右翼”大加挞伐;揭开了蒙上公正面纱的中间派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伪装”;对作为卡斯特罗朋友的左翼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分析解读也让人眼前一亮。20世纪90年代以后,佩里·安德森还出版了多部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专著,如《后现代性的起源》、《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印度意识形态》等等。还对中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进行了精彩的比较,对中国的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对巴西卢拉的新政也有独到分析。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成为一种普遍“宗教”的时代,安德森没有与利奥塔一起转向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也没有像吉登斯那样直接拥抱新自由主义,而是坚持悲剧式抵抗、拯救式批判的原则立场。因此,仅仅根据他的现实主义姿态就猜测他已经倒向了新自由主义,是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7, p. 62.

<sup>②</sup>冯楫:《启蒙与审美:当代西方思潮史——〈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评论》,载《写作》,2013年第11期。



有失公允的。<sup>①</sup> 因为安德森仍然坚信：“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多为人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柔韧可塑得多。”<sup>②</sup> 但不管怎么说，安德森的转变是明显的，认为在资本全球化无可置疑地获得空前成功的今天，简单地依据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来批判资本主义是不足取的，剩下的只是“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他已然从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和乐观激进主义转向了与后马克思主义同道的改良主义，希望用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来代替全面胜利的新自由主义。<sup>③</sup> 这既有新意，却更像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事实上，如果安德森真的是个中国通，他就应该能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发现更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希望之路。

## 二、国内外学者对安德森思想的研究状况

佩里·安德森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埃利奥特就认为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安德森的广博性确实与众不同，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安德森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学者。恰恰相反，他是个通才。<sup>④</sup> 保罗·布莱克利奇认为安德森的作品涵纳“从柏拉图到波洛克，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从亚历山大到路易十四，他简直可称作是一个奥林匹亚”<sup>⑤</sup>。甚至一直对历史唯物主义持反对态度的麦克雷也认为安德森对历史社会学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⑥</sup>。塔里克·艾里称安德森的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杰作”<sup>⑦</sup>。中世纪史专家希尔顿认为安德森的论著

---

①张亮：《从激进乐观主义到现实主义——佩里·安德森与〈新左派评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②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载《读书》，2005年第6期，第40页。

③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p. ix.

④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 XI.

⑤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p. x.

⑥D. G. MacRae, "Chains of History," *New Society* 31, January 30, 1975, pp. 269, 270.

⑦Tariq Ali, "Feudalism to Absolutism," *Books and Bookmen* 20(235), April 1975, p. 21.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业和投机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sup>①</sup>。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中进一步强大,仅剩的工人阶级在资本向全球转移的过程中也被收编并逐渐丧失阶级意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可能受到左翼运动失败的刺激,安德森开始下大功夫去了解研究左翼的对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专论:迈克尔·奥克肖特、里奥·施特劳斯、弗·冯·哈耶克、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弗朗西斯·福山……他最长的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福山的,研究范围遍及政治、历史、文学、国家关系、法律、社会理论等领域,对历史的终结、现代性与革命等学界关注的话题,都一一给予了独特的梳理与分析。<sup>②</sup>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中,《英国问题》收集了三篇发表于1964年至1968年间的深远影响的文章:《当前危机的起源》、《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构成》,它们一道构成了理解早期英国新左派必读的经典文献,并且和《交锋地带》一起构成了左翼内部相互批评和论争的经典文本。《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则左、中、右同时开弓。安德森在书中将奥克肖特与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并划进“顽固的右翼”大加挞伐;揭开了蒙上公正面纱的中间派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伪装”;对作为卡斯特罗朋友的左翼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分析解读也让人眼前一亮。20世纪90年代以后,佩里·安德森还出版了多部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专著,如《后现代性的起源》、《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智囊》、《印度意识形态》等等。还对中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进行了精彩的比较,对中国的台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对巴西卢拉的新政也有独到分析。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成为一种普遍“宗教”的时代,安德森没有与利奥塔一起转向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也没有像吉登斯那样直接拥抱新自由主义,而是坚持悲剧式抵抗、拯救式批判的原则立场。因此,仅仅根据他的现实主义姿态就猜测他已经倒向了新自由主义,是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7, p. 62.

<sup>②</sup>冯桦:《启蒙与审美:当代西方思潮史——〈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评论》,载《写作》,2013年第11期。

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富启发性的渊源介绍之一”。霍布斯鲍姆称赞安德森的工作是“十分杰出的、具有权威性和透彻性的学识成就”<sup>①</sup>。在与众多知识分子的交锋中,安德森总是把单纯的概念或是主题置于有机的社会历史整体中加以探询,并且追溯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在历史与政治的交叉中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坐标。

国外对于安德森的研究起步较早,如今已有两部专著问世,一是由格里高利·埃利奥特撰写的《佩里·安德森:历史的无情实验室》<sup>②</sup>,二是由保罗·布莱克利奇撰写的《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sup>③</sup>。应该说,不管是埃利奥特还是布莱克利奇,都更重视安德森的早期思想。埃利奥特的著作主要关注的是安德森的政治思想,认为安德森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一直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及其规范性展开批判。但埃利奥特却试图在安德森的学术构想(prediction)与现实述行(performance)之间的裂缝中展开内在批判:安德森是否成功理解了历史?是否同时分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局限,没能把理论与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从而沦为“奥林匹亚普救论”?

布莱克利奇通过把安德森思想和理论演变置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和思想变迁之中来进行考察,分析安德森的思想来源和学术努力。布莱克利奇认为安德森在英语世界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理论贡献,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葛兰西的思想作出了开创性的精致研究;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本质也有自身独特的理解。布莱克利奇书中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动态而丰富的安德森形象,同时也对安德森提出了多重性的批评。比如布莱克利奇认为安德森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描述非常让人不满意,安德森关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具体性(differentia specifica)的描述也并没有像他所设想的那么明显。更严重的批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8.

<sup>②</sup>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sup>③</sup>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安德森从革命的社会主义退却激变为改良保守主义。

此外,已经有多篇研究和讨论安德森思想的论文发表。在政治哲学领域,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普朗查斯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sup>①</sup>一文。普朗查斯在文中批评了安德森的总体性概念的局限性,同时用阿尔都塞对黑格尔“表现的总体性”(expressive totality)的批判,来批评安德森对早期卢卡奇思想的借鉴和挪用,即这种总体性无法呈现出现代社会复杂性的特质,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的真正特征是复杂性:各层次之间是有区别并且相对自主的。此外,安德森有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等同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的倾向,把意识形态霸权视为非中介的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未能意识到无产阶级本身的客观利益。同时,安德森还存在把全球性的概念置于社会形态的规定性之上的缺陷。

彼得·D.托马斯在《葛兰西时刻》<sup>②</sup>一书中对安德森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作者认为安德森的文章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对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中最具影响力的论著,但由于安德森没有看到《狱中札记》的评笈本,因此对葛兰西的理论存在误读。与托马斯的解读不同,埃利奥特在《佩里·安德森:历史的无情实验室》一书中则称赞安德森对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进行了最精彩的解剖,并成为思想史上的卓越典范。<sup>③</sup>布莱克利奇在《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中则称之为“至今对《狱中札记》最精致的政治批评”<sup>④</sup>。

以安德森的历史社会学理论为主要关注点的论文,最主要的一篇是由玛丽·福布鲁克和西达·斯考切波合著的《命定的逻辑:佩里·安德森的历史社会学》。在该文中,作者认为安德森的著作“不仅语言

<sup>①</sup>Nicos Poulantzas,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967 (43).

<sup>②</sup>Peter D. Thomas, *The Gramscian Moment: Philosophy, Hegemony and Marxism*. The Hague: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9.

<sup>③</sup>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 31, 118.

<sup>④</sup>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p. x.

优美,而且内容非常吸引人,在诸多方面还具有不寻常的理论性和方法论特质”<sup>①</sup>。安德森试图强调漫长社会变迁中具体的政治方面的做法,“延续了古典社会科学的伟大传统,以及与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开放式对话,提供了一个简洁而连贯的视角来审视欧洲文明从希腊和罗马的古老统治到近现代欧洲专制君主政体最后岁月的开放过程”<sup>②</sup>,并且提出了历史研究如何与当代政治理解对话的问题。但文中也批评佩里·安德森所划定的复杂地域框架,看似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实则隐含着以西欧为典型和参照系的深层目的论色彩和“命定论逻辑”。如果世界历史的多样性,是以西方发展的优越性为参照的话,其他地区和国家偏离西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便成了落后和野蛮的代名词,特定的历史差异从而被隐秘地均质化了。

同样,在一篇访谈中,沃勒斯坦称安德森“是全世界人都认可的最严谨的作者之一。他还是为数极少的不让你记录他谈话的人之一,绝对拒绝,因为他不希望没有定稿的任何东西面世”<sup>③</sup>。对于和安德森思想的差异,沃勒斯坦自称“完全不一样”:安德森看到了历史的阶段性——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之后诞生。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的观点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最好解释。虽然安德森对历史沿革和差异的研究细致入微,却是目的论式的。不过伯尼斯·马丁并不同意这样的判断,认为“安德森对历史的复杂性怀有一种真正的尊重”<sup>④</sup>。摩西·芬利在《卫报》将其评论为“一种复杂、漂亮的结合”<sup>⑤</sup>。

此外,丹尼斯·史密斯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对安德森与沃勒斯坦进行了对比分析,德兰迪等人主编的《历史社会学手册》也对安德森

---

①[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

②[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③[美]格雷戈瑞·威廉姆斯:《世界体系研究之缘起:对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杨智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4期。

④B. Martin, “Review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and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27(2), p. 267.

⑤Moses Finley, *The Guardian*, February 6, 1975.



的影响和贡献进行了肯定,认为安德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巧妙地综合在一起,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内部的一些问题和观点,他的作品已经被证明对历史社会学而言具有持久意义。<sup>①</sup>对安德森的历史和社会理论进行过研究和探讨的还有贝蒂·白伦斯的《评论: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sup>②</sup>、理查德·拉赫曼的《单一社会形态中的对比:对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批评性赏析》<sup>③</sup>,后者分析比较了安德森和英国其他思想家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路径的分歧。

由波特和魏特克撰写的论文《国家与地产》对安德森的思想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评价是:“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把国家开创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对象,并且同时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拥有一种充分的类型学之前这样做必须走多远。”<sup>④</sup>但也指出安德森对权力结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方面关注得不够,若是将两者分别具有的国家个体主义与世界体系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的世界进程。但笔者认为,安德森始终强调“国际主义”的视野。比如,他认为西欧和东欧各国的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轨迹,其原因不能仅仅从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来探寻,还应该从各国在欧洲的“国际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来找。<sup>⑤</sup>“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但历史地看,民族文化发展的潜力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有时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sup>⑥</sup>不过,当安德森强调外来文化

---

①[英]杰拉德·德兰迪、[英]恩新·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②Betty Behrens, "Feudalism and Absolutism,"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76, 19(1), pp. 245-250.

③Richard Lachmann, "Comparisons Within a Single Social Form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Perry Anderson's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Qualitative Sociology*, March 2002, Vol. 25, No. 1, pp. 83-92.

④R. B. Porter and C. R. Whittaker, "Review States and Estates," *Social History*, 1(3), 1976, p. 376.

⑤[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中译者序言”,第7页。

⑥Perry Ander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New Left Review*, 1964(180), p. 55.

的影响时,汤普森批评他流于一般化和国际化,而未能考虑到接受主体一方的选择、抵抗与转换的能力。“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上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那么,在对话中我们就不会真正在场。所以,我认为,我不是什么英国的‘民粹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说英语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我认为,国际主义不应当像电视台网那样,将民族的节日传播给外地被动的观众。它应当是汇合,是交换。争论是它真正的代号。”<sup>①</sup>

彼得·古勒维奇《评论:国际体系和制度建构:对安德森和沃勒斯坦的批评性评价》<sup>②</sup>亦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对两者的差异展开了讨论。彼得·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sup>③</sup>一书中,认为安德森对同质化时间的克服,以及对阿尔都塞异质化时间的超越都贡献巨大,但却没有完全超脱出年代学的时间视野。将 E. P. 汤普森与安德森之间的论争作为讨论对象的研究成果,包括苏珊·米盖里的《老掉牙的东西,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英国学术界内文化与结构,或者历史与理论之间的论争》<sup>④</sup>一文,作者在该文中以英国新左派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思想史为背景,梳理了二者的基本立场和观念,以及这场论争对英国新左派发展方向的影响。此外,林春的《英国新左派》<sup>⑤</sup>,丹尼

①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IV.

②Peter Gourevitch,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Regime 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Anderson and Wallerste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0(3), 1978.

③[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页。

④Susan Magarey, "That Hoary Old Chestnut,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Culture vs. Structure, or History vs. Theory in Britain, A Review Articl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3), 1987, pp. 626-639.

⑤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斯·德沃金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都涉及了两者的论争。德沃金甚至指出,“从一定程度上讲,佩里·安德森由史学向社会政治学学术路向的转变渊源于英国‘新左派’运动对他的思想和视界的深刻影响”<sup>①</sup>。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sup>②</sup>也对两人的争论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两者的差异并没有像各自所以为的那么大。霍尔顿在《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博士论文中,认为尽管“第一代新左派运动试图部分吸收劳工运动,但安德森及其同事却呼吁英国应像欧洲大陆一样,产生出一个新的运动远离劳工政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并且批判了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研究了有关现代社会一致的、囊括所有的结构性分析范式”<sup>③</sup>。

作为安德森理论上的老对手、生活中的朋友、政治上的战友,汤普森本人则批评安德森过度关注权力,忽视那些与阶级权力无关的历史与社会现象。虽然他“对于权力的关注,对于政治分析的关注,这是适当的。但并非所有的人类现象都能同化为权力或阶级的范畴”<sup>④</sup>,因此安德森存在一种对“不健康的权力迷恋症”。当安德森在新千年钟声敲响之际发表《更新》(Renewals)一文,并提出“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口号之后,一些国际性的学者和杂志对安德森的立场转向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吉尔伯特·阿奇卡在《佩里·安德森的历史悲观主义》<sup>⑤</sup>一文中,批评安德森陷入了一种历史悲观主义;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在《〈新

---

①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46.

②Ellen Meiksins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David Richard Holden, *The First New Left in Britain, 1956-196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1976, p. 356.

④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96.

⑤Gilbert Achcar, "The 'historical pessimism' of Perry Ander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utumn 2000.

左派评论》的自杀》<sup>①</sup>一文中,认为安德森等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放弃了批判性思考的传统和责任;美国《每月评论》发表了《社会主义:是退却的时刻了吗?》<sup>②</sup>的评论文章,批评了他转向等待资本主义自身新陈代谢和危机爆发的现实主义不作为立场。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在《佩里·安德森的面像》<sup>③</sup>一文中,刻画了安德森既激进又保守的形象。在2001年发表的《佩里·安德森的自相矛盾》<sup>④</sup>一文中,莱昂回顾了安德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撰写的系列经典著作和文章,在对安德森思想的重大贡献给予毫不吝啬的赞誉的同时,对其理论中所隐含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矛盾也作了无情批驳。斯蒂芬·科林尼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sup>⑤</sup>一文中为安德森的转向进行了忠诚的辩护,认为安德森一直有效地结合了道德政治和权力政治的分析维度,因此算不上退却。

从国内的视角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便逐渐接触到安德森的中文版著述。比如《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sup>⑥</sup>、《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争》、《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英国问题》<sup>⑦</sup>、《交锋地带》、《后现代主义的起源》、《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等。据了解,《印度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也正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此外,安德森发表的大量书评、访谈和文章,如《新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文明及其内涵》、《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和《内部人》等,也基本上都译成了中文。

①Boris Kagarlitsky, "The Suicide of *New Left Review*,"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Autumn 2000.

②Review of the Month, "Socialism: A Time to Retreat?,"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2000.

③Edward Skidelsky, "Perry Anderson," *New Statesman*, March 19, 1999.

④León, "The Antinomies of Perry Anderson," 2001, <https://edgeorgesotherblog.files.wordpress.com/2013/01/the-antinomies-of-perry-anderson.pdf>.

⑤Stefan Collini, "Marxism and Form," *Nation*, November 22, 2005.

⑥《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是安德森四部著述计划中的前两部,按照安德森的原定计划,另外两部是“从尼德兰起义到德意志统一的一系列重大资产阶级革命”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可惜尚未完成。

⑦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其中收录了安德森从1968年到1991年间发表的6篇重要的政论文章。



在对安德森左派精神的研究方面，张亮教授在《从激进的乐观主义到现实主义——佩里·安德森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理论退却》一文中，认为安德森从激进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被迫退却，同时将安德森的哲学观念来源界定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认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sup>①</sup>袁银传教授则认为安德森本人的基本立场是左翼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民主问题上主张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反对依靠暴力推广“西式民主”；在研究方法和纲领上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戈。<sup>②</sup>甘琦在《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一文中也认为，安德森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始终如一的追求。

在历史研究方面，台湾学者郑陆霖在《〈绝对主义国家之系谱〉的历史方法》一文中，认为安德森的贡献在于集经验与理论、普遍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于一体。郭方的《评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文，认为安德森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世界具体历史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但其中暗含结构功能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姜冗在《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一文中，认为安德森反对历史发展的单线封闭进化论，主张各种文明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国际主义”。国恩松在《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评介》一文中，认为安德森突出了政治史的研究。王晋新在《评佩里·安德森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一文中，认为安德森对封建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形成、结构、动力与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是巨大的理论创新。

在左翼思想研究方面，段忠桥在《对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说法的质疑》一文中，通过考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安德森的界定与科尔施和梅劳-庞蒂所作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

---

<sup>①</sup>张亮：《从激进乐观主义到现实主义——佩里·安德森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理论退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sup>②</sup>袁银传：《佩里·安德森视域中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

吴冠军在《“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从安德森的“犯规”说起》批评安德森误把罗尔斯视作“战争哲学家”，存在对《万民法》的误读。刘铮《孤高的左派》一文则把安德森描绘成了一个不合群，但对中间路线的思想家诊断极准的学者。王洁在《对于佩里·安德森中美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非常认可安德森的建议：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大国，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会是个怎样的局面，观察者们不宜作出过快的判断和评价。肖滨在《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兼对安德森与吴玉山之争的回应》一文，认为在现代国家成长的视野下，具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重性质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留下的遗产是一把“双刃剑”，而不是安德森所理解的“双头臂”，认为在提供作为中国崛起之基础的主权国家的同时，又留下了作为改革对象的政党—国家体系：就短期效应而言，将国家、市场和政党奇特地整合为一体的制度框架提供了中国崛起的活力源、驱动力和稳定器；从长期效应看，政党—国家逻辑与共和国逻辑的混合运行隐含着深刻的制度紧张，带来了中国崛起有待破解的制度难题。安德森的问题在于过分看重中国革命对崛起的意义。

对于安德森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杨生平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评析》等论文中，认为通过对后现代概念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认真考察与分析，安德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不是后现代主义引领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滋生着后现代主义。安德森关于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寄生物的说法，虽然与詹姆逊相似，却也是有新意的。由于后现代主义存在维护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两种价值取向，因而安德森主张从后现代主义中汲取积极因素，最终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尽管《后现代性的起源》一书还不够全面，但这不影响其成为评价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力作。赵国新在《佩里·安德森及其后现代观念》一文中，认为安德森对激进政治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探讨极有理论深度，对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形成了重要的补充。

与此同时，乔瑞金教授通过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研究， 21



出版了两部研究性专著《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如《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特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历史的整体视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理论”之争及其启示》、《破解主体与结构关系之继——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及其启示》等等，形成了对安德森思想较为深入的介绍。其所指导的学生李瑞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从类型学的视角，对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具有文献和理论深度的研究。

### 三、本书的研究方法、路径与构成

同安德森自身思想的广博复杂相应，国内外的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模式，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从何入手来研究安德森？通过广泛的阅读，笔者发现安德森是被誉为“通才”型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思想内容纵贯千年，横跨中西，广博而丰富，很难用哪一种流派来界定，甚至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不属于任何国家传统，而是各种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漂浮着的躯体”<sup>①</sup>。但在本人看来，在与众多知识分子的交锋中，安德森总能把单纯的概念或是主题置于有机的社会历史整体中加以探讨，并且追溯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在历史与政治的交叉中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坐标。

本书将首先紧紧依托原著进行评论，通过理清安德森思想的“谱系”，把握那些构成他思想资源的核心要素。梳理安德森思想的“光谱”，从他众多同时代的思想家的论战中，提炼出他的思想来。这里主要包括安德森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安德森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外文

著作和论文(主要是英语的资料)的涉猎和研究,以图把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方向。

其次是紧紧围绕问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把握,还是对安德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都突出问题意识,紧紧围绕着他们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和在当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对安德森的历史和政治思想进行阐发。

同时突出思想性。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是简单地从安德森的著作中孤立地抽取出某个片断和部分来加以研究,而是在其整个思想的背景中,力求借用他的视角,对核心问题深入展开研究。最终以《历史与政治: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研究》为题,勉力对其思想进行提炼归纳和剖析,以飨读者。

第一章分为“例外与普遍:命定论的复杂史观”、“东方专制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解读”、“差异的动态总体观”、“抽象结构与经验事实”等四个部分。安德森将历史的开端和过程理解为复杂的、多样的,从而与单线进化史观保持了距离;但同时又坚持统一的与目的论的史观,呈现出由多到一、九九归一的过程。本部分介绍安德森的历史思想;同时介绍安德森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的独特理解和适用限制的研究,以及对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质疑与反思;呈现安德森试图将历史与当代、时间和空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置于统一的整体中进行理解的努力;勾勒安德森在扬弃范畴与事实、理论与历史的二元分离,实现两者互通融合方面所作的贡献。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从结构性矛盾与主观性政治的双重视角出发,呈现汤普森的阶级文化心理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客观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各自的特色,以及安德森对他们开展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批判。进而介绍安德森试图同时把握住结构性矛盾和主观性政治双重动力相互交织的努力;介绍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特征的精练归纳与评述,分析安德森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他者”的优势和不足。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以“后工业社会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当代世界霸权的‘三重’特征”、“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霸权”、“中国崛起





的道路与逻辑分析”等四个方面为抓手,介绍安德森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和批判:工人运动已经衰落、新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当代霸权是在国内、国际和超国家的不同空间运作的有机结合,是军事、经济和文化、生产统治和消费主义相互内嵌的结构;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在例外论与普遍主义之间发生纠缠,但其实质是在博爱的理想主义话语与帝国霸权的循环之间,按照自身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的权力统治;中国的崛起既归功于传统文明的再度复兴,更归功于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完成了在主权上“站起来”的革命逻辑,还要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富起来”的发展逻辑,三者之间并非是分离和矛盾的,而是相互支撑的结构体系,缺一不可。

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与社会,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安德森对当代文化的分析批判。首先是对右翼思想家文化观的分析批判,即不管是斯宾格勒的文化衰退观、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还是福山的文化效率观,都未能从阶级、权力和政治经济的视角审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是安德森对后现代主义所作的文化分析,安德森认为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转向密不可分,文化和反抗在后现代主义时代日益被吸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主要分析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价值观对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继承性超越,以及社会主义本身仍将面临的挑战等等。

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介绍安德森对右翼思想家的片面性与残酷性、中间派思想家的两面性与虚伪性、左翼思想家的幻想性与幼稚性的分析批判。具体来说,一是介绍安德森对以奥克肖特、哈耶克、施米特、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右翼思想家反人民民主的批判,揭露他们在“个体性”、“自然的等级”等等的掩盖下,拒斥人民民主,甚至现代民主的本性;二是梳理安德森对以罗尔斯、哈贝马斯、博比奥为代表的中间派思想家的批判,他们往往在国内诉求分配正义、保护生活世界的同时,在国际领域却又矛盾地支持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者对弱者的侵略。

---

荡之时,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安德森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左,就是在行人生之大路,他在行路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保持批判性的了解和研究,复原社会历史时间和空间的真相,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努力发现新社会的可能性,这值得我们尊敬。

# 第一章

## 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解读

---

### 一、例外与普遍：命定论的复杂史观

人们往往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线性史观,其实,真正持线性史观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主张“自然发展的路径”的线性史观。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则把历史理解为自由意识的展开过程。通过把历史看作客观上有终极目的的过程,赋予历史一种统一的标准的“规律”,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程序而“发展”和“进步”,不再只是一堆偶然事实的集合。当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sup>①</sup>,他对历史进行划分和评判的标准影响了很多思想家,如恩格斯就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

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sup>①</sup>并在评价黑格尔的这一发现时说：“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sup>②</sup>而在历史中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sup>③</sup>。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sup>④</sup>。“物质生活和经济这个简单本原就成了用以说明决定该历史民族的各种因素的唯一本原……这种想法最终必定把历史的辩证法彻底地降低为产生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辩证法，实际上也是降低为产生各种生产技术的辩证法。这些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做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sup>⑤</sup>在黑格尔那里，物质生活仅仅只是理性观念的外化，它在独立的假象下受到一条与己无关的规律的支配。而在颠倒了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他们保存黑格尔的术语，但是把本质改为现象，把现象改为本质。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不再是经济因素的本质，反过来，经济因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部本质和“真理”。物质生活和经济这个简单的本原就成了用以说明决定该历史民族的各种因素的唯一本原。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也批评人道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唯物主义又回到了第二国际经济主义和机械论的解释的基本理论原则上面。它们不过是另一种不同色彩的宿命论，只是把不同领域的东西相互替代，是以恩格斯为宗师的自然哲学的复活。后者在意识和政治中只看到经济，前者则使经济充满政治和意识。两者都消除了现实存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差别，从而使它们在理论上等同起来。两者的方法都是同时代性的本质主义切割，在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横断面上，只看到单一色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3页。

④[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⑤[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7页。

彩。<sup>①</sup>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根本差异：与黑格尔是矛盾一元决定论者不同，马克思是矛盾多元决定论者。马克思的整体统一性，“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sup>②</sup>，“在任何社会中，尽管表现形式可以变化万端，但始终有一种基本的经济活动、一种政治组织和一些意识形态形式（宗教、伦理、哲学等等）。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sup>③</sup>。对此，拉布里奥拉也认为，需要注意的是“问题不在于只是发现和确定社会基础，然后把人变成已经不是由天意，而是由经济范畴操纵的傀儡。……简单说来，要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历史的骨架子，要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而不要抽象化，要记叙和解释整个的历史”<sup>④</sup>。

受阿尔都塞影响，福柯认为传统的历史著作将真实的历史简化了、理论化了，忽视了从而也压制了真实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否认了历史的偶然性。真实的历史与一切所谓恒常不变的东西无缘。福柯认为自己在别的学者发现进步与线性发展的地方发现了循环、间断性与断裂。一句话，在别的学者忙于认祖归宗的时候，他的系谱学往往对此泼上一盆凉水。福柯的结论是：在事物的历史开端被发现的不是它们本源纯粹的同—性，而是相异事物的纷争，是差异（comparity）。<sup>⑤</sup> 与此同时，福柯并未完全否定历史和时间的维度，他认为社会历史形式都是有开始的，因而也是有结束的。并将社会政治史描述为人类从一种统治到另一种统治前进的权力仪式的戏剧，从而将考古学和系谱学结合起来。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儿认为：“在福柯的著作中，……考古学

①[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7—158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④[意]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麟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137页。

⑤M.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 F. Bouchar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42.

强调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实际上也可以是很长的时段),而谱系学则关注历史过程。具体说,‘谱系学在话语之网上向我们提供了过程视角,考古学方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快照,一个穿透那些话语的横断面’。且在这两个方法中,福柯都将话语当作关注的焦点。”<sup>①</sup>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sup>②</sup>。作为当代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霍布斯鲍姆,亦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解读方式提出了质疑。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有意去确定一种在年代上单线发展的更替次序”,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线索、多路径特征。这种多线索首先是一国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线索具有交错和独立性;其次,不同的结构组合构成了不同地区历史线索的复杂性。

就安德森本人而言,他一方面深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同一性”的总体观,而持差异性的统一观,认为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并非绝对符应关系,而可能存在错位和互补。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sup>③</sup>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明确指出三者之间的交错性。认为某种生产方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农奴制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农村封建关系的消失,将两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个普通的错误。”“当榨取农村剩余价值的手段不再是劳役或实物地租而是货币地租时,私人超经济强制、个人依附关系、直接生产者与生产工具相结合这些封建生产关系的特征并未适时消失。”“只要封建贵族地产阻碍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劳动力的实际流动,换言之,只要劳动未与其生存的社会条件相分

①[美]乔治·瑞泽儿:《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离,成为真正的‘劳动力’时,农村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式的。”<sup>①</sup>

原本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定义是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力链条。农民起义的威胁总是与商业、制造业资本的压力相结合,共同塑造着新时代贵族阶级力量的轮廓。各个因素之间多元共存,互相争斗,但地位各不相同,“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古典时代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sup>②</sup>。但在这些结合中,必然有一个占主导性的地位,比如“古希腊的古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它控制着各类地方经济之间繁杂的关系,它给整个城邦文明留下深刻的印记”<sup>③</sup>。就罗马法的复兴而言,同时是君主政体的要求压倒了商人对“确实性”的要求,形成了一种双重混合式的结构。时间上,现代性的外表一再暴露了深层的古旧;空间上,它是王权与商人权力之间的竞相发展。超经济强制的战争与暴力和纯经济的竞争张力共存,前者的属性是政治和军事的“零和性”:战场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冲突构成这种竞争,通过冲突赢得或者失去一定量的土地。由于土地是大自然的赐予,它不可能无限扩展,只能被重新分割。后者的属性是经济和生产的“加成性”:竞争双方仅仅通过对抗就可能同时扩大、繁荣(虽然程度上不会相同),因为制造业的商品生产天生就是无限发展的。<sup>④</sup>绝对主义的官僚机构既标志着商业资本的上升,又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混合性的整体结构“是新经济在旧体系内的长期运行的结果……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从本质上讲,它是保护贵族与特权的机构。但是,与此同时,为实施这一保护所采取的措施却同时保证了新生商业、制造业阶级的基本利益……它为原始积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这是资本主义生产

---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

方式最终取胜必不可少的因素。它之所以能够扮演双重角色,其原因在于商业或制造业资本的特殊属性:它并不源于大机器工业集团性生产的特性,也不必与封建农业秩序决裂……换言之,它们可以在经过改组的封建机构界限之内发展起来”。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是静态的停滞,在“经历了一定的成熟时期之后,在特殊的紧要关头,政治、宗教或经济冲突便会酿成反对绝对主义的革命性巨变”<sup>①</sup>。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们之间的运作具有潜在的协调共存性。当然,在这样的斗争中,人民大众则依然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具体到英国而言,安德森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提出英国资本主义历史道路的“例外论”,即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迥异于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一般模式。17世纪的英国革命只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上层建筑,革命之后,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是贵族式的,也就是说,英国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它没有彻底而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完全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全社会打下自己深刻的思想烙印,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贵族与资产阶级融为一体。与法国革命不同,它没有留下任何有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遗产——英国的资本主义在接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接受了旧贵族,有如恩格斯所写:“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sup>②</sup>时间的线性更替变成了空间的平面共存。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中,安德森认为英国资产阶级与旧贵族联手构成统治集团,社会意识形态以“崇尚传统”(tradi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为主。

再比如日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日本是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封建图画的地方,一个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真正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25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封建主义的历史地点。<sup>①</sup>在安德森看来,日本也与欧洲有极不相似的动态差异,唯其如此,方能探寻到历史变迁的秘密。在他看来,虽然日本有与欧洲相同的基本组合:效忠、土地、豁免权混合而成的采邑制度,领主、封臣和部曲之间的梯形等级制也同样构成宗主和附庸的链条等等,但日本在领主和总领主之间,效忠关系往往高于封地关系:主仆之间的“人际”纽带历来比受封的“物质”纽带更牢固。与促成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封建契约性相比也不那么具有契约性,即臣仆的义务更广泛,而主人的权力更武断。日本更强调服从和不平等,而不是荣誉和互惠,主仆之间关系的压迫性“法规”来自于亲缘关系的具体身份,而不是抽象的法律规定,因此领主对臣仆的权威比欧洲更具有家长制特点。因此没有大领主犯罪的概念,法制观念总的说来极其有限。其法律完全是为了惩罚和镇压而几乎不涉及民事关系,没有商业法,因此根本不能为当代的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架构。这种更强烈的威权主义不对称性质造成了一种极其严重的后果,即无论是地区还是全国都没有等级议会制度。上述种种,形成了日本封建主义与欧洲之间的政治分界线<sup>②</sup>,也为位于欧亚大陆两端极为相似的封建主义地区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欧洲封建主义产生出一种大陆范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要素,即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导致和酝酿了与之相伴的市民阶级的兴起,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并扩张和席卷到全球。日本是唯一一个非欧洲及其海外定居区获得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地区,这和日本在19世纪后期令马克思惊讶不已的封建主义传统密不可分。但是,因为前面所述的差异,日本的资本主义并非是内生型的,它向资本主义剧烈转变的基本动力是外生的(exogenous),即没法产生任何能够稍微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东西,也不能从内部产生欧洲式的绝对主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法律、统一的行政机构、统一的全国性赋税、统一的外交。这些绝对主义的各种重要制度机构,在日本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毫无踪影。

---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2页。

<sup>②</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安德森对简单进化概念的厌恶和排斥,即不存在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也不存在一种生产方式完全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简单化的进化论是站不住脚的: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内生的,是其古代和封建主义的联结(concatenation)的结果。日本向封建主义转变的机制完全不同不同于欧洲,并非是两种彼此冲突的生产方式发生灾难性的崩溃和解体之后诞生的新生产方式,而是通过中央集权帝国的衰落,产生了封建的生产方式,日本封建主义的整个发生系谱(genealogy)显然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日本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线索是完全不同于欧洲内生性的外生资本主义。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也在多处文本中反对将他的历史观理解为线性的同质史观,比如当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资本积累叙述成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马克思马上就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这种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的做法,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①</sup>

马克思还强调,虽然《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sup>②</sup>。早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他就指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sup>③</sup>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也进行了绝妙的分析。正如恩格斯在其第三版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页。

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sup>①</sup>。所以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类型及发展规律，就需要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②</sup>。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历史哲学相比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科学。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Zasulich)的信中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sup>③</sup>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的用意并非是俄国可以从公社农民所有权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从而避免这种情况，而是强调一个更为深刻的真理：“在土地贵族内部，从一种私人产权形式——有条件的——转变成另一种私人产权——绝对的——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必要准备，而且标志着欧洲把其他所有农业体系抛在身后的时刻。在漫长的转变时代……无限制的和世袭的私人土地产权的巩固就成为解放生产要素、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基本步骤。”<sup>④</sup>限制土地转让权(vinculism)因此就成了促成自由土地市场的客观障碍，一旦此障碍被突破，自由的土地市场将产生出资本主义的农业，并代替小农所有制，最终形成启蒙运动结束时欧洲独有的绝对主义君主国家的现象。而东方社会的路径则是有差异的，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公社集体所有制向现代资本所有制的转换，虽然殊途同归，但路径各不相同：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不会从内部解体，但在面临欧洲列强的全球殖民时，则可能迫于外部的压力而解体。最终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开始取得全球霸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换言之,对于西欧而言,“当资本在绝对主义金光熠熠的上层建筑下慢慢积累起来,并且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策略作用时,欧洲近代早期的贵族地主在此时高居于他们的君主国里并且通过君主国维持着自己的历史优势。拥有经济保障、社会特权和成熟文化的贵族依然掌握着统治权,而绝对主义国家则调整着自己的优先次序,把重心转向在西欧混合社会结构中稳步发展的资本”<sup>①</sup>。但对于东欧来说,贵族的社会权力没有像在市场化的西欧那样受到妨碍,领主的统治是为所欲为的。东欧的绝对主义不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长直接造就的,而是西欧军事压力下的产物,即是外生的,这种多边的政治秩序的诞生本身,既是绝对主义在欧洲普及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但由于东欧与西欧的谱系差异,注定了它们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直至产生各自不同的结局:前者被逐渐强大的资产阶级推翻,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

在接受了阿尔都塞差异论的基础上——为阿尔都塞的历史观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方向——安德森抛弃了阿尔都塞及其学派无目的、无方向,甚至无历史、纯粹空间的思想,仍然坚持一般的、宏大的标准。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主义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sup>②</sup>。在安德森看来,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索介于本质与现象之间中介基础,在考察国家、社会的“纯粹”结构的同时,又考察具体历史的“复杂”变体。也就是将国家模式与具体个案相结合、将历史沿革与类型差异相结合、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将作为总体理念的一般理论建构与有限地区或时期的特殊个案研究相结合,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长时段(long-run)和短时段(short-run)或抽象与具体之间实现平衡。同时,将最一般的理论抽象与最具体的现实丰富性相结合,安德森认为历史的起源、开端和过程虽然是复杂的,各不相同的,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不会走向共同的结果和目标。他认为:“经济剥削同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页。

超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复杂迭盖(imbrication)使得各种可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要比相对简单而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演化范围宽广得多。到了工业帝国主义时代,后者成为它们共同的和非自愿的结局。”<sup>①</sup>开端、起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结局的共同性,使得“任何先验地按照后者的整齐划一性来校准前者的尝试都会受到抵制。后部落的(post-tribal)、非奴隶制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多样性根源于它们压榨剩余的机制”<sup>②</sup>。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安德森的历史观就是对于历史的开端和过程来说,各有各的起源、开端与复杂的过程,不同的文明,甚至欧洲文明的不同地区和社会结构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都不是沿着相同的轨迹在深化的。但对于历史的结局来说,却是统一于资本主义,终结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具体说来,就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处理的那样,从原始部落到资本主义的前夜,总是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但资本主义的到来,打碎了这一切。以前是有复杂性的,现在没有了,起源不同于结构,同样的当代组合结构是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途径”成为现实的,系谱差异、偏离、交织的结果是结构的相似性,一种生产方式一旦形成,就远离最初产生的前提,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断造就自己严密的统一体: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力。当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征服世界的体系时,原来所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历史,都被纳入了这一结构。“一种无所不在的全球性权力最终成为这种独特性的结果,也结束了这种独特性。”<sup>③</sup>当发源于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逐步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普遍秩序之时,抵抗这种正日益成为全球普遍性的欧洲独特性,可能是中国传统中的“天下为公”精神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转化。期待它成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则的“新的独特的普遍性”,这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真正世界意义所在。

---

①[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0—451页。

这被斯考切波批评为新进化论。这种新进化论并非是早期按照一种等级分类体系进行排序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允许多样的发展路径,就像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分化、整合、适应来解释重要的历史变化。在面临着内生发展和外部环境刺激时,通过内部的功能专门化以及动态平衡的维持来实现“进步”。“进步”是根据更高层次上“提升适应能力”的分化和整合来衡量的。发展的模式多种多样,但结果是,历史成了记录散落着一些无目的的“失败”路径,那些更久远的“幸存者”,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总会在最后姗姗来迟。<sup>①</sup>这种方法被称作“系枝”汇合的进化论而不是“多重线形”的进化论,也不是无目的系谱学。

另外,安德森也否认古代复杂的历史中,没有共同的特征。我们知道,阿尔都塞批评黑格尔的时间是“均一的连续性”和“同时性”的简单本质主义,认为黑格尔是包含对立面的同一的整体观,而马克思是包含对立面的统一的总体观。因此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有差异的复合的结构统一体的时间性截然不同,因为真实的历史性结构是“这个整体中的所有要素都在同一时间里、同一个现在中并存,因此它们同一个现在中是同时的”<sup>②</sup>。但每个层面或状况都有它自己特定的相对独立的时间,被标识上自己的独特节奏。但是不同的时间在整体的统一体中又相互之间和谐一致。<sup>③</sup>因此,阿尔都塞宣称“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假如人们匆忙地把复杂整体的有结构的统一性和总体的简单统一性等同起来,假如人们把复杂整体单纯当作唯一的、原始的和简单的本质或实体的简单发展,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从马克思倒退到

<sup>①</sup>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5页。

<sup>②</sup>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p. 94.

<sup>③</sup>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pp. 99-100.



黑格尔,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从马克思倒退到海克尔!”<sup>①</sup>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阿尔都塞反对黑格尔的本质主义的话,这个没有本质的统一体的共通与和谐的根据何在?如果没有一个共通的本质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贯穿于复合的总体性中,就必然导致我们无法言说某个时代的性质,最多只能用物理时间的均一性,去维持“去中心的”杂乱时代的整体性,这对阿尔都塞来说是个挑战。彼得·奥斯本认为这使得阿尔都塞根本没有能力思考作为整体的发展,无论是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还是历史本身的层面上,即不可能去思考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的过渡——而这恰好是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的基本理论所考察的对象——因为历时性的时间在结构中总会发生中断或者断裂。

在斯考切波看来,尽管安德森常会借用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安德森实际上认为:纯粹的结构主义并不能抓住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例如,它无法解释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只是安德森用来概括的特征和马克思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出入的地方。马克思依据各不相同的论题需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过三种划分和概括。第一种是以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判断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种以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性质作为判断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时期、物的依赖时期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期的三大阶段。第三种是以人的自由与必然为切入点,把人类社会历史概括为处于必然性王国约束的时期和生活于自由王国的时期。

安德森认为作为联系经济生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所有权概念,在任何生产方式中都占据着绝对中心的地位。<sup>②</sup> 因此对历史复杂性的考察,首先就是对所有权形式的考察;其次,安德森认为从财富的增长与发展方式来看,古代共同的特征之一是:“古代任何国家的扩张路径

①[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7—198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都是……横向出击的——地理上占领——而不是经济发展……”<sup>①</sup>再次,从目的论的视角来看,安德森认为自古至今的所有复杂性的历史、复杂性的制度,不管其倾向和意志是什么,最终都是以某种方式被设计出来维护“最终”利益的,历史的差异从而被普遍均质化了;最后,安德森的复杂性,还暗含了某种预设的标准模式,并以此分析他国的例外与不足。比如他先将西欧定义为封建主义的标准模型,再分析其他地区的差异。判断它们是先进或是落后、符合期望或是怪异、平衡或是失衡,都是与法国或者西方联系在一起。当中心地区对非中心地区产生影响时,这些影响也就实际上消除了不同历史轨迹之间的持久差异,其独特性便只剩下内在的落后性了:“交汇之后,它仍能继续早期的演化路径朝着在欧洲其他地方已经消失或被抛弃的经济秩序方向发展。”<sup>②</sup>

斯考切波认为,对安德森来说,虽然历史发展的路径不同,但结果却是,西方世界不仅在整个世界史中已经一边倒地撞击了——虽然没有带来完全转变的结果——非西方的世界,这一独特的历史轨迹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将会得到普遍化。甚至认为“西欧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已经完全创造出了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这个世界伟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民主制”<sup>③</sup>。并且,“无论西方民主的缺陷或局限是什么……(西方的)民主都会展现一项永久的人类成就——一种如此重要的体验,以至它最终会民主化,也不再是某一地区的特权了”<sup>④</sup>。但与自由进化论者不同的是,安德森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视作世界历史的终极,而是假设未来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人类充分民主的崭新时代。当某一特定的历史路线被提高到一个优势地位时,许多条对比鲜明的历史路线得到了探讨。如果说西欧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测量标杆和发动机,以及吸纳

①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4, p. 28.

②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4, p. 264.

③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④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Towards Socialism*, with Robin Blackburn (eds.). London: Collins, 1966, p. 230.





整个复杂多样的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的話<sup>①</sup>，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古文明的复兴及社会主义道路，将代表另一条重新整合世界的路线和另一种测量标杆。

## 二、东方专制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再解读

自马克思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一文中明确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域展开了成百上千次跨国大规模论战。如今虽然论争的硝烟逐渐止息，却余波未尽，并在中国道路独特性的讨论中，再次获得学界和民间的广泛关注。表面上的原因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作的不同论述和差异造成了思想对垒；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东西方之间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历史差异，是否使得以中国等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探索出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衷是为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一”之前的众多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在马克思看来，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就西方而言，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就东方社会而言，则是以“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sup>②</sup> 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过程是破坏性创新的破立辩证体，它既是前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解体过程，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形成过程。

但是，20 世纪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封建主义是世界范围的现象，涵盖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因此，他们揭示和研究奥

---

<sup>①</sup> 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斯曼、埃及、摩洛哥、波斯、印度、蒙古和中国的封建主义。政治上反抗欧洲优越性的这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学术上把从一个欧洲大陆的历史得出的历史概念加以扩展,用以解释其他或所有大陆演变。从未有任何一个术语像封建主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推而广之,在实践中经常用来指介于部落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极之间的、没有打上奴隶制烙印的任何社会形态。在这种用法中,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界定是,大土地所有权同小农生产相结合,剥削阶级用超经济强制的习惯方式——劳役、实物贡赋、货币地租——来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另外,商品交换和劳动力流动也因此而受到限制。这种复合体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核心,它可以存在于许多各式各样的政治外壳下。换言之,基于一种不变的生产核心,法律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可选择的和外在的人工产物。这样,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就同经济基础结构脱离了,后者单独构成这种实际的封建生产方式……除了整个社会形态的基础是相同的农业秩序外,农业产权的类型、占有者阶级的性质以及国家的基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地说,中世纪欧洲的主权分裂、臣属等级制和采邑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封建主义固有的或本质的特征。即便它们不存在,但只要基于超经济强制和依附关系建立起大规模农业剥削和农民生产的结合体,就存在着一种封建社会形态。因此,明代中国、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土耳其、萨非王朝时期的波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图伦王朝时期的埃及、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叙利亚、穆拉比王朝时期的摩洛哥以及瓦哈比派时期的阿拉比亚都适用于封建性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上层建筑表面上同西方规范的差异掩盖了生产关系基础的趋同。因此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秘密的多样形式,因而西方发展的所有特权都化为乌有。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学中,封建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涤罪大海,任何社会都可以在其中受到洗礼。”<sup>①</sup>对于徒有唯物主义外观的“唯心主义”色盲症,安德森谆谆告诫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1—432页。



道：“只有在无知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sup>①</sup>

如上节所述，安德森本人坚持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多”的立场，反对把封建主义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就像马克思不赞成把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说成是封建社会一样。否则，理论的普世主义会导致世人认为封建社会在地球任何地方都存在，却又不能解释除了欧洲及美洲以外，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发地发展起来。这种把封建主义视为人类普遍必经阶段的所谓唯物主义，被倒转为仅仅因为法律和政体形式的差异，导致只有部分地区产生资本主义的解释路径。“一旦整个主权和法律结构脱离了无所不在的封建主义经济，其阴影就会令人意外地笼罩这个世界：因为它变成了能够解释全部生产方式发展差异的唯一原则。这种无所不在的封建主义概念把各大陆的命运都变成纯粹地方方言的表面游戏。患色盲症的唯物主义不能辨别在同一历史区段的不同社会总体的现实而丰富的色谱，从而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刚愎自用的唯心主义。”<sup>②</sup>在安德森看来，马基雅维利是这种唯心主义的现代代表。马基雅维利将东方的专制官僚制作为同所有欧洲国家的制度进行区分的标志，他以土耳其为例，指出“整个土耳其帝国是由一个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撤换他们……他们都是臣服于他的奴隶和奴才”<sup>③</sup>。博丹将土耳其视为不受限制地统治其臣民的帝国，而西欧则必须尊重臣民的人格和财产。

把东方视为专制主义的最早的思想家要数亚里士多德，他对东方社会的著名诊断是这样表述的：“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

---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7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3页。

③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7页。

很稳定。”<sup>①</sup>这样,在欧洲全部政治哲学的源头,专制主义便明确地成了亚洲独有的属性。经过启蒙运动,孟德斯鸠对东方专制主义作了更为深入的表达: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没有稳定的私人产权,没有世袭贵族,因此其性质是专横和暴虐的,其原则是伴君如伴虎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臣民之间表面上的森严等级遮盖着一切差别都被消除的“平等”:他们都屈从于专制君主可怕的心血来潮。即除了皇帝,其余人都是奴才。“在共和国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国家中人人也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孟德斯鸠从启蒙运动世俗主义和进步论的立场出发,批评东方社会缺乏法典,伦理宗教成了法律的代用品:即使偶有法律,也会“一钱不值,或者不过是君主心血来潮的专横意志。在这些国家,如果宗教法规类似于人定法规,那么它们也等于零;但是因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些固定原则,宗教就提供了这种东西”。<sup>③</sup>这样的社会带来的结果是长期的静止和停滞:“东方的法律、风俗和习惯,甚至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今天和一千年以前相同。”<sup>④</sup>当然,孟德斯鸠将这种社会政治现象的原因归结于气候和地形:“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而欧洲从未有这样的帝国……在亚洲,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在欧洲……法治同国家的生存不是格格不入的;相反,法治是极其有利的,如果没有法律,国家就会堕落,而变成低于邻邦的弱者。正是这一点造就了自由精神,使得大陆的各个部分除了屈从于法律和商业利益外,绝不屈从于外力的征服。反之,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

①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5页。

②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5页。

③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6页。

④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6—497页。

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sup>①</sup>

根据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看法,欧洲是“皇家主权”(royal sovereignty),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东方则是“主子权力”(lordly power),对于后者而言,国王是王国人民和财产的绝对主子,奴仆的后嗣只能继承他们的动产,而不是不动产。而欧洲从来没有容忍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识过主子君主国。培根也同样强调指出,欧洲和土耳其的主要差异在于后者没有世袭贵族。“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乃是纯粹和绝对专制政体(tyranny)……因为贵族能够抵制君主权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民众的目光转移到王室以外的地方。”<sup>②</sup>从经济上说,土耳其国王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在土耳其,除了大君外,任何人拥有土地都是非法的。”<sup>③</sup>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更加极端,其了无生气的专制统治的基础同样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剥夺了土地私有制,就必然会导致专制统治、奴颜媚骨、贪赃枉法、冤狱丛生、乞丐遍地、粗鲁野蛮、土地荒芜、无人耕作;结果将是民族的毁灭、国王和国家的灭亡。深受贝尔尼埃影响的孟德斯鸠也认为,如果国王有任意的财产、生命处置的权限的话,这样的国家是最招致伤害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废弛,经济毁灭。<sup>④</sup>

与上述思想家关注于政治哲学不同,亚当·斯密则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这种差异。斯密肯定了大一统的好处,即由于国家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所以它直接关注农业水利和公路等公共条件的改善,修建了大量的运河和公共建筑。他指出,东方的不同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东方的技术不能迅速发展起来。“现代欧洲的政治经济学

---

①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7页。

②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8页。

③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

④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

更有利于城市的行业,即制造业和外贸,而不利于农村的行业,即农业;而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学则遵循着另一条道路,更利于农业,而不是制造业和外贸。在中国,据说卖苦力的人的状况比手艺人状况好得多,而在欧洲,手艺人的状况则比卖苦力的人的状况好得多。”<sup>①</sup>换言之,斯密的意思似乎是因为中国手艺人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不够好,因此技艺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在安德森看来,孟德斯鸠和斯密共同影响了黑格尔对中国的判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重申了孟德斯鸠中国没有中间等级或中间权力的观念。“规模宏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专横、恶劣和横行于世、为所欲为,是暴政的舞台。同时,中国又是平均主义专制的一个范型,人们没有个性和特色:“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绝对平等的现实,所存在的差别只是同政府机构的联系,个人凭借着才能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由于盛行平等,而没有任何自由,所以专制主义就是一种必然的政体形式。”与中国不同,在黑格尔看来,欧洲人“只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互相尊重彼此的财产权”,并且因为有自由,所以可以确保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和特权,而中国普通人是没有个性的,因为他们的自己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余地,也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等级制度:“政府统治完全是出于皇帝一人,他操纵着政府的官员等级体系。”<sup>②</sup>一切政治都集中到其中心即皇帝的身上,因此各个臣民不可能获得独立和主体自由。印度因种姓制度,而陷入了最低劣的精神奴役和僵化状态。黑格尔最后将中国的普通人生活定义为伦理专制主义,而印度是没有任何伦理或宗教准则的专制主义。特别对于印度而言,这种专制主义表现为停滞的村社生活。两者都不受国家政治变动的影 响,特别是印度,任何政治革命都与印度普通人无关,因而他们的命运是不变的。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和印度的乡村生活一直到18世纪都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7—498页。

<sup>②</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9页。

在安德森看来,琼斯(Richard Jones)是上述陈词滥调之外有所创新的学者,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琼斯主要从经济入手,意识到“君主是唯一的所有者”<sup>①</sup>。为了生计普遍地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君主对经济的垄断是社会匍匐在他脚下的原因。

安德森认为所有这些思想家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sup>②</sup>马克思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自然长成的社会”、“自然形成的部落社会”或“天然社会”等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描述。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其演化过程中又会异化为:“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sup>③</sup>结果是,这一总合的统一体成为实际的所有者,表现出一种凌驾于小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力量,即东方专制集权。这就使得完全公有的“东方公社”所有制蜕变为“作为各小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统辖之下的“亚细亚社会”或“东方社会”,成为与古典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带有“普遍奴隶制”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sup>④</sup>“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sup>⑤</sup>,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sup>⑥</sup>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村社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共同劳动”成为东方专制制度及其停滞状态的最坚实的基础。

---

①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④涂成林:《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与东方发展道路》,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⑥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马克思对于欧洲扩张对中国和印度所造成的影响是既痛心又矛盾的：“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服的猎获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sup>①</sup>

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野蛮统治，虽然“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让人“感到悲伤难过”，但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的输入造成“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的破坏：“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sup>②</sup>英国在印度其实完成着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sup>③</sup>显然，马克思的见解带有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痕迹，即东西方社会的差异：“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3—8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sup>①</sup>最终都必然被统一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sup>②</sup>

安德森的结论是，马克思早期对中国和东方世界的看法，都极其接近于其他启蒙思想家：将东方社会定义为专制和停滞，“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sup>③</sup>，中国“对于时间来说毫无咀嚼的味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明确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种自给自足的村社部落公有制，是专制君主土地所有制的“想象统一体”背后的社会经济现实。即所谓土地国有制的官方面纱背后，存在着自给自足的村社的部落或公社土地所有制度。“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属于他的条件，看做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sup>④</sup>总的说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东方社会的朝代变迁时指出：“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中的风暴所触动。”<sup>①</sup>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几经修改,最终还是认可了土地国有制的说法,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村社和个人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各个村社之间确实是封闭和相互隔绝的。不过安德森提出质疑,即专制的东方国家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自给自足的村社”、“公社所有制”的概念与土地国有制的自相矛盾乃是马克思理论大厦中的基本实证缺陷。另外还有其他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有时说东方村社包含残酷种姓和奴隶制度,有时又说东方村社是“无害的社会有机体”。安德森认为马克思的误读来自于所了解的材料不足,真实的情况是村社并非对王朝的变动“漠然处之,无动于衷”,而恰恰是他们的反抗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村社概念的虚假性还在于把印度的状况随便安到中国的头上来。比如把中国称之为泰然自若的天朝帝国,是腐朽的文明制度,是因因相袭的愚昧,是极其单调乏味的社会等等。马克思在1862年时更是明确指出,政治上眼花缭乱的王朝更替背后,掩藏着的却是社会基础、社会结构的长期停滞不动。

安德森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般性描述非欧发展道路的概念残余,不能真正分析中国和印度等社会差异的结构类型。埃伦·梅克辛斯·伍德认为,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式上“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安德森认为东方没有西方那样的运动,但却不代表它们的发展是停滞或循环往复的,即使它们没有通向资本主义。因此,安德森批判“停滞”和“始终如一”是一种极大的错觉,因为土耳其和中国这两者在历史上的膨胀是极其惊人的,只在较近的时候才停顿下来。进入17世纪时,伊斯兰文明的威力达到了地理上的极致,东南亚被征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归顺了伊斯兰教,三大伊斯兰帝国在当时都拥有雄厚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实力。而清王朝更拥有广大的内陆空间,人口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安德森认为对这两大文明不能简单用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分析,这种老生常谈会掩盖真正的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

核心关键。<sup>①</sup>

在安德森看来,伊斯兰教的核心在于其征服和传教模式,其教义给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精神的统一,并完成了牲畜个人所有制同集体使用土地相结合的制度结构,国家享有对全部土地的绝对权力,国家垄断土地成为伊斯兰政治体制的一个传统法律规范。此外,宗教管束着穆斯林生活的全部。这是一个教会和国家没有任何区分的文明,任何系统的法典化都不可能形成,人们之间无法形成明确的关系,经济上繁华似锦却没有市政自治或市民秩序。商人没有社会权力,家族财富总是有可能被军事统治者粗暴所没收,也没有商业协会或手工业协会,缺少地域性贵族,完全为家庭消费而生产,原始工业资本始终未能发展起来。

而中华文明更为复杂,帝国体制是整个政治史的特有标志,根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确实也不存在绝对的土地私有制。国家在法律上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农业生产基于所谓的“均田制”,遏制了贵族地主私人地地产的形成。国家规划与控制很细,国家机器本身由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控制着,这个集团通常是前一次内战的赢家,战略上的扩张主义是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相辅相成的。在安德森看来,虽然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中兴,但清朝最后几十年的挣扎和灭亡,使得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停滞的。不过,安德森的结论是,自宋代社会经济大革命之后,“中华帝国的生产力增长从表面上看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奇怪的螺旋运动形式。它每一次都在启动时呈上升趋势,但从未形成一种全新的发展轨迹。近代早期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殊运动的悖论在于,与欧洲相比,中国早就具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大多数纯粹技术前提。到中世纪晚期,与西方相比,中国拥有全面而重大的领先技术。实际上在物质生产的各项关键性发明方面,中国都领先几个世纪。中华帝国文明的整个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

---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23页。

技术的威力和潜力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展现和最深刻的实验”<sup>①</sup>。但“它们本应引起的工业和社会的根本改造没有发生……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最终发生了停滞,或者还出现了倒退”,“从16世纪初起,正当意大利城市的文艺复兴向外扩散,左右了整个欧洲的发展方向时,中国的城市不再为帝国提供重大的革新或根本性的动力”。<sup>②</sup>没有出现向大众消费品机械生产的飞跃,也没有发生城市手工业者向工业无产阶级的转变。工业潜力沉睡不醒,萎靡不振。

安德森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当时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个结构本身:一方面,没有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财产权制度,“任何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总是取决于以超经济强制为特征的阶级统治的政治——法律机制。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私有制在中国比在伊斯兰世界发展得更充分。它们的不同发展道路也正是以这种基本差异为标志。但是中国的所有制观念同欧洲的财产权观念相去甚远。绅士中流行的是大家庭所有制,优先购买权和赎回权限制着土地买卖”<sup>③</sup>。中国的生产过程本身没有受到商业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的触动,批发商是同直接向手工业生产者收购的包买商打交道,无须经营商品的实际生产。生产和分配之间由于官方行业分割的绝对性而未能形成一个循环体系,使得商业资本对工业技术改进漠不关心。帝国的国家机器是由地主来中介的,中国的地主阶级一直拥有双重的经济基础,一是庄园,二是官职。国家机器依靠地主来完成公共职能和维持社会秩序,并且国家机器工作人员过于丰厚的收入和政治威权主义的日趋强化,也阻止了精英人士对农业的投入,更别说从事商业。直到清朝垮台的前夕,儒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皇帝的权力也越来越扩大化。

另一方面,从文化、政治和科技上看,“尊崇氏族纽带的遗风——这是明显不同于伊斯兰大国之处——正是缺乏民主制度的体现。在缺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sup>②</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sup>③</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2页。



乏成文法的情况下，坚定维护传统的习俗和亲缘关系得以长存。国家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惩罚性的，只是一味地镇压犯罪，而没有提供指导经济生活的正面的法律架构”。除了技术发明的实用智慧和官方扶持的精密的天文学外，中国文化也没有形成自然法(natural laws)的理论概念。各种科学往往注重分类而不是因果关系，喜欢中庸平和的弹性宇宙观把各种异常现象包容起来，而不是西方式的精确/差异和质疑/解释的对抗观，因此缺乏因果关系的范式，而范式的建立和反驳却是科学内部理论发生突变的前提。知识分子与手工者之间严格的社会划分阻碍了数学和实验之间的重要接触，二者的结合是现代物理的前提。用李约瑟的话来说，中国科学一直停留于达·芬奇的阶段，而没有达到伽利略的阶段，即从未进入量化而精确的宇宙。<sup>①</sup>

安德森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结论是，尚武的奴隶禁卫军是伊斯兰政治体制的拱顶石，而文雅的儒士则支配着中华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弥漫使得亲缘关系黯然失色，退居次要地位；在中国，世俗道德和哲学支配着官方文化，而宗族关系依然是民间生活的外壳。中国的城市主要是官府的所在地。生产方式的复杂组合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显得过于简单。安德森认为是时候给这一概念一个体面的葬礼了。对非欧洲道路的研究，需要更深入的历史研究和更大量的翔实考证，而不是像启蒙学者那样地走马观花，隔靴搔痒。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关键是尊重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因为“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sup>②</sup>。

除了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外，安德森还在《中国热》<sup>③</sup>一文中，批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其他误读。在他看来，启蒙学者东方学

---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2—563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7页。

<sup>③</sup>Perry Anderson, "Sinomani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8, 2010, pp. 3-6.

的名声其实很糟糕。就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作的精妙总结那样,是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实际说来,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18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都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挑选出来的。而当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它早先的美好变成了原始、野蛮和迷信之后,先前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后来又是甚嚣尘上的“黄祸论”和极权主义噩梦。在此先不展开。

### 三、差异的动态总体观

虽然本章的前述两节已经大致呈现了安德森的历史思想,但这一历史思想与政治本身又如何关联?或者说历史的某个横断面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又如何理论的层面上进行把握?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本节的深入阐述才能得以理解。正如前述,对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研究,安德森主张采用“差异的动态总体性”的思想和方法,以理解整体的辩证运动和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其又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深入诠释:一是历史时间的统一性,二是空间地域的统一性,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性。

对于历史时间的统一性问题,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对黑格尔的历史与当下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尔都塞用“残余”来指称历史,并认为残余是确实存在的,它既指政治势力的残余,也指生产方式的残余,同样指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结构(包括风

俗、习惯、民族传统特征)的残余。但这些都不是黑格尔关于“扬弃”和“否定之否定”的含糊其词的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从而仅仅是回忆的一种方式。过去只是以回忆、许诺的“残余”存在。过去既不是黑暗也不是障碍。它总是可被现在所同化，因为它预先已被同化了。历史成了启示未来的影子，因为现在的过去无非是现在自身，过去无非是向现在揭示出人类发展的命运这条内在性法则。

在阿尔都塞看来，对马克思来说，过去不是一个影子，甚至不是一个“客观”的影子，而是一个积极、能动、具有严密结构的并且可以量化的现实，正如饥饿、寒冷和黑暗对马克思谈到的贫苦工人来说一样地现实。在马克思那里，无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族传统、民族习俗或民族精神等等都是现实：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假如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革命就会引起这样的改变），因为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因而能够在其直接生存环境之外保持自己的生存，甚至重新创造出或暂时“分泌”出替代的生存条件；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因此必须通过澄清马克思的思想，让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sup>①</sup>

那么，安德森是如何看待历史与当代以及起源与结构的关系的呢？安德森承认阿尔都塞的贡献，认为“具体的社会形态通常都包含着若干属于不同时代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sup>②</sup>。各种文明的特殊道路不仅取决于一种社会结构产生另一种社会结构，同时也取决于先前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与后来社会结构的交融与复活。即使是第一个变成真正全球性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也绝没有完全收容和消灭了它在自己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和征服的各种原有的生产方式。在安德森看来，“历史的实际运动绝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生产方式向另

<sup>①</sup>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5—106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一种生产方式的简单转变,而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结构,其中有若干种生产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和日耳曼世界本身早已消失以后,封建生产方式之前的古代和原始公社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还能够在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内部保留下来的原因”<sup>①</sup>。就思想文化而言,“古典思想绝不会被当作脆弱而无关痛痒的传统而被保存起来,即使在中世纪它们被有选择地吸收的时候,它们始终保留着一种敌对的侵蚀性的内容,一种非基督教宇宙观。一旦新的社会条件本身使得欧洲思想家们能够逐渐清醒地回顾过去,超越他们同古代之间的深渊,古典思想最伟大作品的根本活力就会充分地显露出来”<sup>②</sup>。不管是哥白尼的天文学、蒙田的哲学,还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格老修斯的法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上了古代的信息,受益于古典的复兴。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旗号下,提出了它的“动力学”自然观。

就如普朗查斯在《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观强调在已知的任何历史社会整体中可能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社会”一词常常反映一个历史整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统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单纯的统一特性并不存在。而社会形态则指不同生产方式在一种占统治地位(dominance)的生产方式的组织下的结合。即这种异质的社会结构类型从未以“纯粹形态”存在过,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更是如此。在安德森看来,这种社会结构的复合体系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奴隶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而自由农民在“黑暗时代”的任何地方都从未完全被消灭掉。<sup>③</sup>

马克思曾经说过:“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

---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5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sup>①</sup>但是,这并非表明古代的某些资源不能为现代所用。因此,经过改造的罗马法既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大陆迅速形成的一个基本制度前提,同时也确定了欧洲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不同的特殊性,即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结合,会产生极其独特的社会风景和历史发展道路。

因此,虽然对很多学者而言,不理解当代就不可能理解历史,甚至有学者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安德森则主张,过去并非是静默的历史,历史一直活在当代。只有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代。<sup>②</sup>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sup>③</sup>。但与阿尔都塞学派无保留的历史现实性不同,也与黑格尔的过去预言未来不同,安德森认为历史的遗留在当代并不会是界限分明的差异共存,而会被熔铸于整体之中。他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是单纯为了过去而写一段沉寂的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而试图重构它……我们所选择的方法不是把一切还原为经济,而是把现状当作一个总体分析,其中每一个部分危机的决定因素都会蕴含在其他部分之中……所有部分最终都会在结构上构成一个鲜明的整体——被它们复杂的社会历史所熔铸。”<sup>④</sup>

看起来完全对立的阿尔都塞学派和汤普森都分享了同样的逻辑:历史会原封不动地被继承,而未能认识到其总是被以“扭曲”的方式继承的,比如西欧罗马法的复兴,“与其说他们对于罗马法理论原则进行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②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 (35), pp. 32-33.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④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 (35), pp. 32-33.

学究式的分析,不如说他们更关心在实践中运用罗马法律原则。在使罗马法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的过程中,他们既破坏了其原始形式,又清除了它的特殊性的内容。他们对于拉丁法理不忠实的翻译却将它‘普及化’了。所谓不忠实的翻译是指他们删去了罗马民法中与古代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内容(例如它对奴隶制的全面规定)”<sup>①</sup>。因此,这个起源的继承是遗忘的记忆,是传统的发明,是有选择的强调。传统的复兴适应了经济和政治的需求:从经济上,它适应了商业、制造业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政治上,罗马法的复兴适应了那个时代改组后的封建国家的政制需求,其首要决定因素来自王室对加强中央权力的渴望。

历史时间并不总是直线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继承,“罗马法律体系包括截然不同而且显然相互矛盾的两个部分:规定公民之间经济交换关系的民法和规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公共法……在一方眼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无条件性与另一方行使的帝国主义的绝对专制性成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如果罗马法所有权的概念的再生说明并推动了当时过渡性经济中商品交换的普遍发展,那么,多米纳特权威主义特权的复苏则表明并巩固了贵族阶级权力在集权化国家机构内的集中”<sup>②</sup>。结构上发生的双重社会运动在古代的传统中各自找到了法律依据。法律成了权力实施(主权就在于创制新的法律并使臣民无条件服从的权力)和自我保护(必须限制统治者对臣民横征暴敛的封建权力)双方斗争的场域。前者试图无须征得臣民同意就将法律强加于其头上,法律成了君主在行使权力时所发出的命令。后者认为君主在没有正当、合理的理由之时,没有任意征敛赋税或专断地从他人手中攫取财产的权力,这是上帝所制定的自然法则。这体现了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与强化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威的竞相发展,反映了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之间权力的分配,国家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也成了各团队、阶级竞逐的平台，贵族阶层强调积极的干预性，资产阶级试图借助国家来保护消极的权力。

“没有任何一种统一的目的论能够以这种方式支配着迂回曲折而分道扬镳的历史轨道。”<sup>①</sup>“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在这种编年史中，一个阶段继承和取代另一个阶段，又产生出一个将会取代它的后继阶段），而是显示出在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遗产的存留效应（remanence），这种遗产的符咒在向第三种生产方式过渡时的活化作用（reactivation）。欧洲相比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古典前身，即使在黑暗时代到来后，它也没有在其‘身后’消失，而是在其‘前方’的某些基本方面保存下来。在这种意义上，欧洲封建主义的具体历史起源不同于变成了地球完成结构的固体的火和气，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对其最后的解体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迄本世纪为止欧洲历史上三大生产方式的实际历史时段（temporality）就根本不是进化编年史的那种时空连续体。”<sup>②</sup>

传统总是扭曲和矛盾性地得到继承甚至发明，而非原封不动地停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分析德国的未来之路时指出，德国的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sup>③</sup>但最终，当矛盾不可调和时，资产阶级革命便使国家和主导生产方式的性质转向了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事件

①[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0—4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总体直线发展观念才能获得解释。通向资本主义的历程不是展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编年史”。“与所有的历史主义的假设不同,前两种生产方式的时间在某些层次上似乎发生了颠倒,而造成向最后一种生产方式的根本转换。与所有的结构主义假设不同,并不存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者被视为毗邻的封闭体系)位移的自动机制。”传统与当下的“关系不仅仅是历时系列,而且在某个阶段也是共时组合”。在时机成熟时,曾经湮没的“古典的过去再次苏醒,帮助资本主义的未来兴起。它既比想象的更远离后者,又令人惊讶地接近于后者”。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古代的再生。比如“罗马法规定的所有权——古代商品经济的最高法律体现——一直等待着时机:一旦商品关系在封建欧洲得到普及,再次需要它的那种准确性和明晰性,它就会被再次发现和重新起作用”<sup>①</sup>。罗马法为买卖、租赁、雇佣、借债和商品检验提供了一个系统而严密的架构,经过改造和推广,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迅速形成的基本制度前提,即罗马法的“过去”并没有在“当下”的欧洲消失,而是时时为所有权的安全、契约的稳定、经济交易的保护和可预见性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就政治而言,诸如公民(citizenry)的整个社会和法律概念都带有古典的记忆和来源,在欧洲之外的地方绝没有这种概念。罗马法的复兴也伴随着或者带来了对整个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重新利用。古代的哲学、历史、政治和科学思想突然获得了新的活力和现实性,因为具有批判和理性因素的古典文化比其他大陆文明更容易造成复兴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是整个欧洲历史的关节点。

安德森在《交锋地带》一书中,批评伯曼“在这个连续流动的过程中,在一个事态或一个时代与另一种事态或另一个时代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区别,它们只不过是纯粹年代学上的新与旧、早与晚的连续性,这些范畴受制于单向的位置上永不停止的排列,正如时光流逝,后来变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成了从前，崭新变成了古老”<sup>①</sup>的平滑历史观。安德森认为，“一种生产方式一旦形成，就‘远离’最初产生的前提，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断造就自己严密的统一体。……当转变完成以后，就都服从于相同的严密逻辑”<sup>②</sup>，这些结构具有相似的历史后果。比如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原始积累完成后，资本的自我增殖系统就是和原始积累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本人是正确地强调了生产方式的起源和结构之间的差别的伟大思想家，资本主义诞生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彼岸一样”<sup>③</sup>。换句话说，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资本主义，一旦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换，这些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就不再是原因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自我系统繁衍的前提。

起源和结构的断裂使得任何线性回溯都显得滑稽可笑。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名言，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所写的，“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而未能注意后面的限定，即“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

---

①Perry Anderson,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p. 101. 参见[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sup>①</sup>从物质生产出发去探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限定在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殊的阶段。将市民社会特殊的历史形态推广到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时期，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容易犯的错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sup>②</sup>安德森在此提出自己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方法论前提：“任何先验地按照后者的整齐划一性来校准前者的尝试都会受到抵制。后部落的（post-tribal）、非奴隶制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多样性根源于它们压榨剩余的机制。”<sup>③</sup>

动态的差异总体观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空间的相互影响。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表述了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表现的总体”（expressive totality）的“结构总体”（structural totality）概念。阿尔都塞明确区分了四种社会实践，即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实践，并强调各自之间不可相互还原，还提出了著名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思想，从而形成将社会结构理解成绝对差异的多元决定的整体观。<sup>④</sup>这种对于绝对差异性的强调不同于年鉴学派的总体观。比如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认为：“对我们历史学家来说，结构无疑是建筑的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sup>⑤</sup>在阿尔都塞看来，年鉴学派“仅仅看到历史中有不同的时段，许多时间类型，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他们满足于把它们之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④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67-69.

⑤[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浪、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间的冲突标明为这些时间类型的犬牙交错的大量产物：他们没有……把这些不同类型即如此繁多的变化同整体的结构联系起来，尽管后者直接支配着那些变化的生产……”他们“很想把这些类型，即这许多通过时段(duration)来度量的变形，与流俗时间(ordinary time)本身，与意识形态的延续联系起来”。<sup>①</sup>阿尔都塞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结构：它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整齐划一的年历时间来充当所有这些现象的一般尺度，从而并非社会现实真正的多样性的结构整体。

但在安德森看来，阿尔都塞的多元性视角同样很难处理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扭曲的过程。“阿尔都塞声称，只有通过把历史时间定义为正在考察的社会总体性的特殊存在方式，才有可能赋予历史时间这个概念以内容，他独具特色地假定了‘社会总体性’等同于‘社会形态’，换句话说，各个国家的总体形成了历史研究的自然界限。但是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坚持生产方式的国际性，并坚持必须把每一个个别的社会形态的时间整合到在它们当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个生产方式复杂得多的一般历史中去。”<sup>②</sup>从这里，我们看出阿尔都塞的整体性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组织统领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组织化的生产关系使得不同的生产方式得以共存于一个整体之中，而这个整体是个复杂的多元整体。安德森的批评恰恰在于，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会突破封闭性的国门，对该国的总体进行影响和侵犯。一国之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也会对其他生产方式形成主导性的影响和统摄。

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各文明之间并非封闭的民族国家实体，而是相互冲撞和交融的。比如，他认为西欧和东欧各国的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轨迹。其原因应该不仅仅从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来探寻，还应该从各国在欧洲的“国际国家体系”<sup>③</sup>中的地位来找。“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但历史地看，民族文化发展的潜力

<sup>①</sup>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1979, pp. 96-97.

<sup>②</sup>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75-76.

<sup>③</sup>[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中译者序言”，第7页。

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有时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sup>①</sup>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安德森进一步批判了纯粹内生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国家社会观。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等假说,曾经都被提出来充作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安德森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sup>②</sup>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到“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他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sup>③</sup>安德森称赞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有助于理解宗教(对付自然灾害)与战争(保护和抢夺资源)在国家出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安德森认为所有区域性的历史应该在一种相关联的时间中被召唤在一起,这种相关的时间不是日期的空虚的坐标,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的完整运动。他强调各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碰撞、传播、接受、综合的具体情况,并且不应限于只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而应着重讨论国家形态和政治斗争在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中的关键作用。<sup>④</sup>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多维结构功能上的相互作用,并从各地区、国家间具体历史的联系和互动中深入理解社会形态发展过渡的轨迹。

①Perry Ander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New Left Review*, 1964(180), p. 55.

②[英]佩里·安德森:《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盛勤、闻钟译,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2000年4月。

③[英]佩里·安德森:《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盛勤、闻钟译,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2000年4月。

④参见郭方:《评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差异的动态总体观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前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从自然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的暴政下逐步获得解放,虽然这种解放的成果被统治阶级通过剥削的方式据为己有。人类社会最终将以对自然的驾驭为“自由王国”的标志,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的成果将被生产者自己占有,创造一个普遍繁荣富足的社会。

对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历史的实际进程否定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可能结局的设想,技术进步已成为一种退化,不再含有向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人和自然的最初决裂,以及后来人对自然逐渐取得优势的过程,未必对人类解放带来进展。为了取得对自然——人类本身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配,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分工和精神分工,这使人类遭受空前深重的压迫……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犹如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机器更为完善而已。”<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失去了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被剥削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意识,他们只会机械地选举自己的主子来统治自己。而且,工业技术的改进最终也有可能导致行星的自我毁灭:核武器和环境污染。所以,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方式不能再是对自然必然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支配,不再是通过使自然屈从于人而使人和自然等同。也就是说,要承认人与自然的区别和联系,承认人与自然的亲和力很脆弱,只有这样,“堕落的自然”才能获得最终的挽救,“人和自然最终将在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统一体中获得协调”<sup>②</sup>。

哈贝马斯则直接批评马克思在关于“人”的类概念和作为社会形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锴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态发展的历史观中,赋予物质生产以基本前提的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致命缺点。社会的相互作用是人的实践同样不能削减的一个方面。这种相互作用总是以符号传递的,从而构成交往活动的特殊领域——与物质生产的器械活动相对立。只要生产的目标是逐步控制外部自然,相互作用就会形成那些使内部自然——人类的需要和意向——适应社会生活的规范。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因为经济的或科学的进步并不一定保证文化的或政治的解放。从饥饿和痛苦中获得解放并不一定紧紧伴随着从奴役状态和堕落获得解放,因为在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发展联系。“精神生活的辩证法”有自己的自主性。

原本哈贝马斯强调精神自主性,或者生产与社会之间的非对称关系是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他逐渐转向了交往行动本体论。在写作《认识与人的旨趣》时,哈贝马斯就已宣称:“使我们超出自然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能知其特性的东西:语言。”<sup>①</sup>原始人类用工具劳动,表明这是一种人类以前的活动,而作为类的人类,其特性是发明了语言和只有语言才能建立的家庭。交往是支配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则,在旧石器时代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这两套“认知过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决定重大转变的是道德规范而不是经济的力量。无疑是这些道德规范引起或容许与文明发展相联系的经济关系的相继变革,而不是相反。在写作《交往与社会发展》时,哈贝马斯不但放弃了劳动本体论,还否定了生产劳动本身的积极意义。“这些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因为社会机体的新的有机原则意味着新社会一体化形式,而后者反过来又使实现有效的生产力或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成为可能,以及使提高社会的复杂程度成为可能。”<sup>②</sup>

阿尔都塞也对生产力动力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其遗著《论生

<sup>①</sup>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 314.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sup>②</sup>Jü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p. 120.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84页。

产》中,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是黑格尔的“内容”与“形式”辩证法的现代变体,或者通过异化观念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相适合和不相适合(或“矛盾”、“对抗”)的辩证法中表现出来。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矛盾(“相适合”)和矛盾(“不相适合”)的辩证法,以及生产力发展阶段 degrés(在黑格尔那里,是理念的发展环节 moments)的辩证法,不折不扣地属于黑格尔,因此要拒斥它。否则,将会陷入历史“宿命论”,必然会使“革命”成为多余。这是一种历史的迷乱,本质上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本人也要为此承担一些责任,因为他的有些著作极其含糊不清,其中首推1859年出版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文本后来一直都是第二国际和斯大林的圣经: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

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sup>①</sup>即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

阿尔都塞认为,另一个有名的文本是提出所谓“丧钟论”的《资本

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会由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于是，“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sup>①</sup>。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这样写道：国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②</sup>。而在《哲学的贫困》中则是那句众所周知的话：与手推磨相应的是封建制度，与蒸汽磨相应的是资本主义。即是说，生产力依照其“发展阶段”为自己生产出生产关系，即与那些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的的关系。一切生产力的革命，都会造成与先前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合，从而会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以使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之间获得新的（完全一致的）相适合。反过来，阿尔都塞也在《读〈资本论〉》中批评了人本主义的观点。后者往往只需要根据道德、宗教或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对马克思进行人道主义的、但却是非历史主义的解释，从而把全部认识还原为历史社会关系，把生产关系看作简单的人的关系。历史就变成了人的本质的转化形式，而人的本质则成为改变它的历史的真正主体。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被归结为历史化的“人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当代对传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观提出质疑的著名文本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齐泽克在书中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视为不合时宜的范式，一种普遍的历史进化主义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翻版，一种蛇蜕皮隐喻的另一种表述：生产力的大发展会绷紧穿在身上的“社会服装”，超出生产关系的框架；这一框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直到爆发社会革命，调整生产力与生关系之间的矛盾，用适用新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来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将社会发展的动力规定为一个自然的、自发的常量。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延宕的结果是完全相符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本人无意勾勒这种简单的进化论观念,《资本论》就是非常明显的文本佐证,特别是马克思对形式统摄和实质统摄(formal and real subsumption)的论述更是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是生产关系之形式驱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即驱动了内容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绝对冲突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发生。原因在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的再生产是静悄悄的循环运动,这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可能会恶化。而在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一致和矛盾性已经被包容到了它的概念之中,即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驱使资本主义永远扩张其生产,永远不停地发展其生产条件。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并不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性,但他却认为资本主义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恰恰利用和借助这种矛盾性来驱使自身永恒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是其自身生存条件的永恒革命化。这使得资本才是其自身的限制,而任何其他外部的限制都将被资本追逐生产力的冲动所突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以把可能的和得到强化的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过程的自在目的的话,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sup>①</sup>

安德森也对传统的生产力决定论的单一化理解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对于西欧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接受的信念相反: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形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能够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地变化和重组。换言之,在转变时代,生产关系的总的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力之前,而不是相反。”<sup>②</sup>即和齐泽克一样,安德森认为形式先于内容、决定内容、创设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0—74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内容。即使内容先行出现,也不会自动地产生与之相匹配的形式。

比如罗马时期发明了被马克思称之为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的水磨以及有轮收割机,但却得不到广泛应用,就是因为“单纯技术本身永远不是经济变革的原始推动力,个人的发明有可能在几个世纪里与世隔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因为可以将它们视为集体的技术应用的社会关系还未出现”<sup>①</sup>。零星出现的技术,“正是只有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巩固,才能使它们在一个普遍的规模上发挥作用……是生产模式本身的内部的动力,而不是作为其物质表现之一的一种新技术的出现,才是应当寻求农业进步的基本原动力”<sup>②</sup>。而一旦手工劳动与失去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失去了自由发明的社会基础。生产关系的核心还在于一旦生产关系发生变动,整个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比如对古希腊文明来说,广义的奴隶制就是其基础,任何人若想尝试废除它,用自由劳动代替它,整个社会就会发生错位。因此,奴隶制就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它对于整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极端重要的。

在安德森看来,哈贝马斯把在结构主义那里疑惑不解的、灰暗的或糟透了的东西变得明亮起来。但与结构主义一样,哈贝马斯也表现出来不断把语言提升为一切社交心理的最终缔造者和仲裁人的地位,揭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普遍的基础,从而抛弃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在安德森看来,维护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长期历史变革最深层的动力”的洞见是极为有必要的。<sup>③</sup>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要否认生产关系的矛盾,否认社会形式的具体类型的重要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头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内部的关系同等重要,并且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安德森认为:“所有社会变革机制的最根本因素是由生产力和生

①[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

③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81.

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并非仅仅由生产关系所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对立所引发,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重叠。因为生产力中有一个主要因素是人,而人同时是具体生产关系的载体。当然,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生产方式的危机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冲突,但在某个历史时刻,它们也许可以结合,也许无法结合。一方面,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在结构深度上吸收了所有并非有意识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这一危机的解决并非仅仅表现为冗长的战争,一般说法,真正的革命在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其是阶级斗争的真正本质所在。”<sup>①</sup>

换言之,结构性危机的最终解决,确实是要依靠社会政治层面的重新安排和新生产方式的诞生。但是,就历史的动力而言,恰恰是一个危机→危机的解决→危机→危机的解决的动态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产权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中介。“法律上的产权既不能脱离经济生产,也不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权利而孤立存在。它在任何生产方式中的绝对中心地位正是来自于它同这两者的联系。”<sup>②</sup>因此,社会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甚至自然界本身,都可以是人类发展的积极动力。“自然界当然不仅是饥荒与恐惧,而且也是肥沃与丰饶的背景,既导致生命的减少、衰灭,也促使生命的再生。同样,不同社会间的关系也未必一定就只能充满敌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或战争间隙,贸易给双方都带来好处。这样的‘积极性’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被忽视了。”<sup>③</sup>

在笔者看来,安德森认为“任何社会都拥有两种尺度,它是结构的,只能按照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也是过程的,只能按照过去的累加意义来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关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有机统一的唯一思想。它既是纯粹历史主义的(否认了所有超历史的本质),也是基本功能主义的(社会是有意义的总体),这一综合仍是独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55-56.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页。

<sup>③</sup>[英]佩里·安德森:《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盛勤、闻钟译,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2000年4月。

一无二”<sup>①</sup>。这些观点是有新意的,就如吉登斯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sup>②</sup>,是一种“过去与现在的总体理论(a integrated theory)”<sup>③</sup>。安德森在《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中为《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的目的作辩护时写道:“在一种卓越的、想象的历史与一种空洞的政治分析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我们试图去克服的。我们试图把历史与当前相联,重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这不可避免意味着一种‘总体化’的尝试。”<sup>④</sup>而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生产力作为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作为一定社会形式下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推动它发展的原动力不是它自身,而是一定社会形式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受一定的劳动组织方式,甚至是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而哈贝马斯所设想的交往行为本身在后工业社会也会成为生产力。因此,一定的生产关系确实会形成强大的生产力,也会变得停滞不前。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确实如齐泽克所理解的那样,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是以生产力为导向,持续自我更新的,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说来,总的是以一种重复再生产的缓慢方式呈现的。安德森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宏观地审视了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各种因素,但对社会主义如何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安德森并没有太多新的建议。

#### 四、抽象结构与经验事实

在哲学史上主要有三种抽象类型和方法:思辨哲学、经验主义和科学抽象。所谓思辨哲学就是从一个固定的、自明性的本质出发,以之作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III," *New Left Review*, 1962(17), p. 113.

<sup>②</sup>[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04页。

<sup>③</sup>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39.

<sup>④</sup>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 39.





为适用古往今来、五湖四海的普遍公式和药方，抽象地推演世间的一切，将整个社会历史装扮为思想外化的结果。这被阿尔都塞批评为简单的本质主义，黑格尔是这种总问题的典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之进行了明确的划界：“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sup>①</sup>经验主义主张“从多种多样的事物中抽出单纯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用一定的名称术语把它固定下来”<sup>②</sup>，是一种静态的、僵死的方法，很难触及相互之间真正的本质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经验主义的主张并不相同。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游离于科学和经验主义之间，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又把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也就是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种联系，与上述内在联系并列地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式在斯密那里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sup>③</sup>马克思在此提出并非方法论的“真实的抽象”这一概念，即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形式。这种方法既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不同于经验主义的归纳、类比，而是透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②孙伯鍙：《孙伯鍙哲学文存》第4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过事物的外在表象,深层把握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

譬如,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另一方面,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因此,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正如一般说来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会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才能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并且显示出例如像货币这样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这些规定所经历的历史变化。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sup>①</sup>换言之,不管是价值还是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的抽象,在资本主义就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其既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抽象,也不是纯粹的经验归纳,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一切现象之中的客观内在性。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成为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一切人和物的抽象存在。马克思对这一现实的总结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sup>②</sup>

当汤普森指责马克思的《资本论》始终停留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上时,他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抽象的历史基础和物质性存在的客观性。抽象在马克思那里是对一切经验抽象和归纳抽象的根本超越,它直指的是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模式。马克思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sup>①</sup>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讨论的抽象形式不是逻辑的抽象,而是真实的抽象;不是先验的逻辑,而是先验的现实原则;不是思维的虚构,而是客观的形式。它本来是人的产物,却反过来构成了资本家和工人每天生活的日常世界定则,形成了“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但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评无疑击中了阿尔都塞的要害。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一书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的命名戏仿: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类似蒲鲁东主义的一种抽象理论。除了一堆抽象的理论范畴,丝毫不会触碰到真实的社会历史事实,或者说后者在这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中消失了。这种稀奇古怪的幽灵或理论姿态上的异想天开,一旦他们闭上眼睛不加理睬,就会遁形得无影无踪。或者仅仅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之以“科学的标签”<sup>②</sup>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安德森认为阿尔都塞虽然反对黑格尔,无法对现代社会的本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是,他的优势同样在于理论分析,而“英国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统的批判理论。整个英国传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包括许多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许多领域都是非常经验主义的。在英国,需要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而且需要更为政治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理论”<sup>③</sup>。没有理论和方法,就不可能把握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形式和结构,就只会“稚气地收集……乱七八糟的零碎,它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4页。

②[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安德森访谈》,http://www.cul-studies.com。

们出自喜好毫无用处的趣闻轶事的编者,出自他们盲目的非理性的好奇”<sup>①</sup>,他们“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sup>②</sup>,而难以抓住“正像大厦是从周围堆积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sup>③</sup>的社会形式特征。

但安德森同样并非只看到抽象的社会形式,他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过于形式化而不考虑特殊性的做法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一方面,抽象的一般模型被建构或被假设……而不考虑它们对等的含义和内在关联。毫无疑问,对这些过程传统的二分法源于人们普遍相信:明确的必然性只存在于最广阔、最普遍的历史趋势中,超越了特定事件和机构所组成的多样的经验环境,这些实际的过程或形态很大程度上来自可能性的结果。科学法则……被视为仅能从普遍的范畴中获得:个体则被视为偶然的范畴。<sup>④</sup> 安德森并非完全反对汤普森,但这并不意味着汤普森所坚持的“把历史称为一门‘科学’的企图总是无益的并且容易引起混乱”的说法是对的。在安德森看来,过于看重特殊性,对个别事实过度陶醉、过于精雕细琢,缺乏起码的理论思辨能力,必然会沉迷于“玩弄实例”<sup>⑤</sup>,陷在个别事例的泥潭里不能自拔,陷入吴晓明教授所讲的“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真实形式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一书中,安德森拿气象学与历史学进行类比,虽然天气比历史更显得变化无常,但正是这种变化无常要求气象学家埋头于过去的气象事实与材料来进行更加概念化的工作,从而在变化中找出普遍的规律,最后形成相对牢固的气象学理论体系。正是依靠明确的概念和科学的理论,科学家才能准确有效

①[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②[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③[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⑤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31.

地预测未来天气的变化。<sup>①</sup> 对于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与分离,他写道:在历史解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不存在截然划分的直线,长期与短期、抽象与具体之间也不存在截然区分。多样性和复杂性始终是存在的,不可能被理论抽象的应用所掩盖,高度分析性的理论概念是为了将历史的复杂性提升到解释层面。概念指涉的是实体性的社会历史的复杂情况,它是结构性的,也是动态性的。<sup>②</sup> 其实,安德森早在1962年的《葡萄牙与极端殖民主义的终结》一文中便已指出自身论述所依凭的方法论,即“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将现有的材料统合为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整体,从而得出一个理论模型”<sup>③</sup>。确切地说,尽管历史是由无数偶然的歷史事件所构成的,但需要理论来分析、阐释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发不是空洞的形而上思辨哲学,而是建立在翔实的经验材料之上的。因此,理论和材料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关系,而可以是互补关系,“历史学科法庭所允许的诉求形式是双重的,‘证据的’和‘理论的’”<sup>④</sup>。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事实的重要,“事实上,理应一清二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中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潜在的极端重要性”<sup>⑤</sup>。一旦把历史考证和理论阐释熔为一炉,那么“理论就是历史,具有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严密性;历史同样也是理论,在描述所有历史事变时,都以一种它过去极力回避的理论方法”<sup>⑥</sup>。

熟读《资本论》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读者都应该清楚,安德森在此是对马克思关于研究和叙述方法的另一种表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对其作

①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9-10.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③Perry Anderson, "Portugal and the End of Ultra-Colonialism," *New Left Review*, 1962 (15), p. 83.

④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9-12.

⑤[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页。

⑥[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8页。

了精彩表述。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正好相反,前者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后者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和逻辑的一致需要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包裹中剥离出来。“思想过程对于历史材料来说,又是自律的,而不是顺从地摹写它。思想过程对历史基础的相对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方面一并存在。而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才出现结构的‘叙述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区别。”<sup>①</sup>马克思写道:“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观念主义的思想家总是自我生产范畴的普遍性,并将其同一性和统摄的力量置于物质现象和社会存在之上,而非与之持续地进行辩证互动。<sup>③</sup> 马克思早对此作出过深入批判,也从未认为存在过抽象而纯粹的某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种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sup>④</sup>。

当然,汤普森不会这么简单就认输,他曾试图用“内容”的丰富性来批判“形式”的单一性和僵化性。在他看来,寻找规律“这一模式实

①[德]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③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6.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质上具有一种内在的还原主义倾向，这在安德森的思想中是极为明显的”<sup>①</sup>。因此，“历史无法与隧道相比，快速列车通过隧道竞相把乘客送到阳光普照的平原。或者，假如可以的话，一代又一代的乘客在黑暗中出生和死亡，而列车仍行进于隧道中”<sup>②</sup>。安德森的“典型”和类型学因此就被汤普森指责过于简单化。因为“一种革命的理想类型，可以对其他革命进行评判。这种渴望整齐划一的柏拉图主义的头脑对于实际的历史不久就变得缺乏耐心。法国革命在西方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并通过其整个经验，提供了一种随后冲突的无法比拟的见解和预兆。尽管它是一种巨大的经验，但并不必然是一种典型的经验”<sup>③</sup>。汤普森认为，除了经验不可复制外，体验更加难以把握。因此，真实的世界就不仅仅是可客观量度的那一部分，“真实的世界的推进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经验总是不敲门就直接闯进来，宣告死亡、生存危机、壕沟战、失业、通货膨胀和大屠杀的发生与存在。当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没有饿死的人会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市场。当人民被投入监牢的时候，他们则会以新的方式思考法律。面对这种普遍经验，旧的观念体系崩溃了，新的问题式则会应运而生。可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那里，这种必然会影响到认识结果的问题是不被关注的，因为这种认识论只关注认识者，而这个认识的生产者又只关心认识的原料是否按时达到，至于原料是从哪里来的，他根本不予考虑”<sup>④</sup>。

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sup>⑤</sup>

①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90.

②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p. 358.

③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p. 257.

④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7-8.

⑤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3.

换言之,阿尔都塞的理性认识论只能认识“经验”范畴,而不处理“经验”自身,只能研究作为书本的《资本论》,而不能分析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最终堕入普鲁东主义的“唯心主义”窠臼,因为“在他这里,范畴已经成了凌驾于其物质对应物之上的第一性,而观念性的结构也成了高居社会存在之上的宰制者”<sup>①</sup>。当然,汤普森也不会傻到完全否认一切范畴或者是理论范畴,而是主张“适用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是历史性范畴。在详细阐释这些范畴时表现出来的坚决的连贯性(有时坚决到顽固了),以及在一个概念总体中对这些范畴的清晰表述,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解释体系形成了区别。这种总体不是已经完成的理论真理(或理论),也不是虚伪的模式,而是发展着的认识,虽然是临时的、近似性、尚有不少空白和杂质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发展既在理论中发生,又在实践中发生,它形成于对话,它的论证表述是在历史逻辑的范畴内实施的。这种逻辑的实际运作并不是循序渐进地出现在历史学家著作的每一页上的。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做了,那史学著作就将让人受不了。不过,在与经验的每一次遭遇中,在历史学家面对证据前定位自己的方式中,以及在提出来的问题中,这种逻辑都暗含其中”<sup>②</sup>。因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只能用来解释结构化了的停滞状态,缺乏能够解释冲突或变化等过程性事件的适当范畴,无力真正面对社会的变迁和具体的过程,也无力应对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需要”等重要范畴,也无法处理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等等。

汤普森随后指责马克思晚年执迷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放弃了对社会统一知识的探求,而在经济人的简单化视野上寻找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出路,全然不顾权力、意识、文化和规范性等并非政治经济学关心的对象。动态多样的社会也在《大纲》中变成了静态和非历史的结构。<sup>③</sup> 并且认为直到1860年后,因受达尔文《物

<sup>①</sup>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3.

<sup>②</sup>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49.

<sup>③</sup>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53.



种的起源》的影响，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部分修正了先前的观点，让一些真实的历史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原本真空般的抽象之中。但总体而言，仍未能给予特殊性和经验性以足够的重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写了多封信试图改正马克思的倾向，强调上层结构的相对自主性及历史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阿尔都塞却把马克思重新甩进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牢笼<sup>①</sup>，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与实际的社会形态、资本与资本主义混淆起来。

在汤普森看来，只有持总体式的社会统一知识观，才能充分重视悲剧艺术、佛教文化、温情的传统人伦关系、乌托邦思潮、新教伦理、马维尔的诗歌等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和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群体和阶级之间持续的重组、协商与折射。<sup>②</sup> 就如达尔文未能注意到不同物种之间的变异与相互影响一样，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未能注意到不同生产方式和历史过程之间的共同而一致的文化遗产。因此，人类经验<sup>③</sup>的真实传承就有了更多的文化性，“情感和道德意识”<sup>④</sup>便是在文化遗产中，历经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更为稳定地保留了下来。

《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确实主要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纯粹社会结构，有意避免与利益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情感和道德力量的复杂多样性。汤普森的反驳是有力的、有益的，但并不能真正驳倒安德森和马克思。因为就如前述，不管是安德森还是马克思本人，都从未主张过一种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理论，理论与现实之间，是持续的循环交往过程。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现实的、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经验的方法，大量地占有材料又不止于材料本身。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

---

①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60.

②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362.

③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356.

④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363.

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sup>①</sup>,而是一种不同于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的真正的想象力。范畴和想象力真正要把握的就是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人与人的主导性的基本现实关系,即“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sup>②</sup>。

针对汤普森对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路径变化的批判,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所做的是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具决定性的领域——经济生产——并奉献了他的所有热情和努力在资本主义的时代来探索和重建。对他而言,还存在其他科学的路径么?实际上,他的步骤是真正科学家的经典方针。”<sup>③</sup>换言之,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了一整套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经济理论,但却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学范畴,而是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学范畴,是区分一种历史结构和另外一种历史结构的重要依据。对此,安德森说道:“首先应当足够清楚的是,马克思并没有阐述过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生产方式概念,甚至是对它的一种正相反对的版本(adversary version)。”即马克思要批判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经验性,因此安德森说,对马克思而言,“这一概念的最初功能究竟是什么呢?设想一下社会经济形态和时代的多样性——就能提供给我们在人类进化中划分一种重要历史结构类型与另一种历史结构类型的方法”<sup>④</sup>。因为,对马克思而言,“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然而光这点理解还过于肤浅,因而它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也是历史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实践作用的传统格言所不自觉地提到的”<sup>⑤</sup>。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

③Pen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62.

④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64.

⑤[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因此,汤普森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汤普森指责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试图通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理论而“使我们返回到资产阶级对手强加给马克思的概念监狱(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中”。安德森对此为阿尔都塞作了辩护:“阿尔都塞著作的影响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者囚禁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严格等式中,而是使它们从中解放出来。”<sup>①</sup>阿尔都塞的所谓“断裂”决不是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停留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其重点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理论,这一重大的创新是迄今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所没有的,也从来没有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之前的文本之中,并且直到《大纲》时期,马克思才真正全面阐述了它的意义<sup>②</sup>,从而也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阐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并且,马克思在他表明要寻找秘密和基础之后,接着补充:“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sup>③</sup>

总而言之,安德森认为,“1848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运动并非‘远离’历史,而是深入了历史”<sup>④</sup>,即深入到了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历史的本质性中去了,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还充分注意到古希腊悲观在当代仍然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艺术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之所以判断现代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在于它的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和结构是资本主义式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

①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67-68.

②具体可参见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在《科学、阶级与社会》(*Science, Class, Society*, 1976)第365—377页中的讨论。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1—892页。

④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63.

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sup>①</sup>即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②</sup>因此,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从不会像汤普森所担心的那样,是抽象而空洞的,是生产出来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历史的抽象性之间并非矛盾的,而正是它们之间辩证的变动过程,构成了动态而丰富的历史。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 第二章

### 安德森对左翼思想的研究与批评

---

#### 一、对汤普森阶级文化心理主义的批评

在阶级分析中,对唯实论者而言,阶级是社会的实体结构;对唯名论者而言,阶级是理论家构建出来的虚假“概念”;对力图超越两分法的学者如萨特等来说,在冲突过程中形成的“群集”、“集团”等才值得研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则在于,社会历史的变化是结构性驱动,还是主体(阶级斗争)驱动的。不同的解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针锋相对的意见和流派。他们各自都能从《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支持。多布等人在汤普森之前就已经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汤普森则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了再发现。汤普森认为,阶级斗争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视角。他反复重申《共产党宣言》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sup>①</sup>,并且深度认可恩格斯的论述,即“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

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sup>①</sup>。汤普森始终强调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反对把阶级理解为既定的结构或事物,强调“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sup>②</sup>。因此,阶级是与主体相关的动态拉锯,而不是静态矩阵。这也并非没有文本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承认:“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sup>③</sup>

汤普森强调社会个体的自我标签、自我认同,阶级更多的是个阶级认同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写道:“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作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sup>④</sup>他指出:“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sup>⑤</sup>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唯一的定义。这里的关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9页。

②[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4页。

④[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页。

⑤[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3页。



关键词是“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确定其含义”。这多少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为小说而生》中的开篇所言:“生活并不是你过得怎么样,而是你回忆起来怎么样,以及为了复述它你怎么去回忆。”<sup>①</sup>在汤普森看来,“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sup>②</sup>。显然,汤普森侧重的是自为的主观心理态度,而不是自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因此他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总是跟实践联系的”<sup>③</sup>,以寻找可以打破已有疆域的可能性,为人们提供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汤普森在《莫里斯传》里,就试图将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因此,他们非常反对将三个维度的丰富阶级还原为单一的阶级结构。

总的说来,汤普森指责结构单一化和简单化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对异质性经验的强调。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处境,会产生不同的经验。不是总体控制着经验,而是异质性的经验构成了总体。经验不是空洞含混的,而是内涵丰富的具体。所谓经验,指的是主体通过其实践活动所建构出来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一个必要的中间项”。其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所有不同的实践在经验中相互交叉,同荣格一样,汤普森认为经验中包含着历史的记忆,是“全部历史进程的遗传因素”。

其次,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存在错位性。相同的结构性经验有不同的认知处理方式。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忽略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

①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②[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 E. P. 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的辩证关系。社会存在的变化带来变化的经验,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施加压力,提出新的问题,提供知识实践所需要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是被决定的。“经验,归根结底是从物质生活中生发出来,以阶级的方式结构化起来的,因此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sup>①</sup>与此同时,社会意识也不是反映存在的被动容器。意识,不论是非自我意识的文化,还是神话、科学、法律或明白表达的意识形态,都回头向存在形成冲击,当存在被思考时,思想本身也获得了生命。“悲惨经历会以一百种不同的形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对于农业雇工来说,失去了使用公地的权利和残存的乡村民主制;对于手艺人来说,失去了工匠的社会地位;对于织工来说,失去了生计和独立;对于儿童来说,失去了在家里工作、玩耍的机会;对于很多工资有所提高的工人团体来说,失去了安全感和闲暇,城市居住环境恶化。”<sup>②</sup>

意识的最大特征是“期待而非规则”,具有一种“特殊的弹性”,“必要的灵活性”,“机动的系数”,它总是“临时的,不完美的和近似的”。因此汤普森认为历史不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而是一个“无法掌控的人类实践”,其中,每一小时都是“一个形成的时刻,选择可能的时刻,前代人与后代人较量的时刻,对立(阶级)形成和斗争的时刻,或者是‘欺骗’迹象的时刻”<sup>③</sup>。主体是“永远困惑、永远复兴的行动者”。换言之,这个主体是矛盾的复合体,是戴着镣铐的自由人,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行动者。既被社会所规定,又时时准备与社会保持距离。因此,这样的主体并非完全忽视社会存在的资产阶级的自律的主体,或者说“自由的个体”,而是作为对于已确定的生产环境、人际关系进行体验的个体,作为需要和利益以及对手,然后在他们的意识和文化之内,用非常复杂的方式“处理”已有的社会经验,甚至

<sup>①</sup>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71.

<sup>②</sup>[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87页。

<sup>③</sup>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17.





彻底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sup>①</sup>

再次,文化是冲突而异质的。在汤普森看来,“我们应去重新考察那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赖以构成,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并获得表现的复杂和详尽的系统:家族关系、习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社会准则、权威和服从统治与抵抗的象征性方式、宗教信仰与千年王国的冲动、行为举止、法律、宪法和意识。简言之,所有这些包括了全部历史进程的遗传因素;所有这些在某一点上汇成人类共有的经验。而每一种经验对于总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sup>②</sup>。因此,“阶级并不只是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男女的经验也在发生变化。这种经验按照阶级的方式进行分类,分成社会生活和意识以及男女们的赞同、抵抗和选择”<sup>③</sup>。汤普森所强调的文化,并非王侯将相的贵族文化,而是与其相疏远的平民文化,因此他对威廉斯的不满之处就在于后者认为“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说遮蔽了“文化是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sup>④</sup>因此汤普森的“研究聚焦于通俗文化,尤其是以政治形式出现的‘人民’文化。……不太关心当代文化甚或20世纪文化,而把重点放在了英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过渡上,以及与此相关的民众斗争和诸种不顺从国教的传统上”<sup>⑤</sup>。这是一种被家长制和表面的服从礼仪的权力关系所遮蔽的反抗文化。这种反抗可能因为“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诫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

---

①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6-12, 70, 356.

②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170-171.

③[英]E. P.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④Edward P.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I," *New Left Review*, 1961(10), pp. 34-35.

⑤[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取暴利的不公正手段都是不道德的”<sup>①</sup>。因此,所谓“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sup>②</sup>。

比如汤普森 1965 年写的《英国特性》一文,就认为英国首先是一个新教国家,因此英国革命主要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教堂权威和教义的冲突。而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往往不表现为经济上的斗争,就如“阶级霸权,社会集团的霸权是通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如教堂、当局、学校等施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渗入趣味、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原则,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们的智力与道德含义中”。政治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政治行动和技巧的产物。而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应被理解为专政。<sup>③</sup>“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继承的文化和期望,‘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经历着各自的生产关系,体验着他们依然被社会规定的状况,并以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sup>④</sup>在汤普森看来,葛兰西突破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解,恢复了其更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弹性。但是,当汤普森强调文化及传统的时候,他只是强调文化作为非经济的要素的重要性,却没有注意到文化本身的阶级性或者政治性。因此,他甚至主张用前现代的贵族文化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兴起。

安德森对社会结构十分重视,并非就意味着他忽视主体的维度。在他看来,“结构和主体——运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结构,任何可预测的反对这些结构的主体——不仅对批判理论,而且对所有最具体的实践,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sup>⑤</sup>。“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结构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结构与主体这两者各自的地位的难题已不是

①[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②[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83.

④Edward 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1978(2), p. 150.

⑤[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难以确定的次要或局部问题了。实际上,它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sup>①</sup>他批评汤普森忽视乃至否定了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因为“为社会形态提供最根本的统一性是也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此外,它还决定各个阶级的客观地位,确定每一个阶级的成员。其结果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然而,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一系列因果关系中的纯粹原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而不是相反。只有在共产主义中,生产方式的这种决定作用才不能发挥作用,因为确切地讲,共产主义已经取消阶级了”<sup>②</sup>。

换言之,对安德森来说,生产方式比阶级斗争更长久,更具有指示性的特征。通过阅读安德森的论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方法论特征,即“在生产方式的结构变迁中发掘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深层原因,并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sup>③</sup>,将基本结构和微观领域充分有机结合起来。

马克思本人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亦不断强调结构的强制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主体不过是社会结构的人格化。他在《资本论》中并非不知道审美的主观和文化因素的存在,但他指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他不得不“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以至于他所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并非不研究人的内心活动,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

①[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②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55.

③[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1页。

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条信纲中的三十八条信纲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sup>①</sup>。

当社会生活的主要尺度已经不再是宗教文化的时候,或者说当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从经济的内部前提变成外部前提的时候,再主要纠缠于文化,本身就是个时代错误。偏重于政治经济学的安德森由此与汤普森形成了分野。20世纪70年代,汤普森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他与安德森之间的争论,他说:“我很看重文化,而安德森看重权力结构。我想,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不认为与历史有关,而是不同类型的历史意识。如果你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安德森很关注权力与结构,很少关心文化与经验的内在性质。”<sup>②</sup>当然,这样的指责安德森肯定不愿意接受,他早在1966年的《社会主义和伪经验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自己“著作的理论系谱完全不同于汤普森对它的想象。它来自于一战后西欧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与某些新的唯心主义形式处于同一时期,是在马克思主义自身转变中的一种辩证回应。这一杰出运动产生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按照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标准,它享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尺度”<sup>③</sup>,只是安德森从不把它当作唯一的尺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过分集中地强调经济方面,而忽略文化和主观意识的向度。因此,通过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构成的主体方面,汤普森的这些著作超越了原先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汤普森对文化的强调更多的是从积极,以及工人阶级自身“内在性”文化的视角去谈论的。其与葛兰西的理论有很大差异,后者强调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会普遍地渗入群众的意识当中,并对普通群众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控制已经到了顶峰,以至于被资本控制的工人阶级反而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②Henry Abelove et al. (eds.), *Visions of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6.

③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 31.

渴望着资本。<sup>①</sup>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方，资本通过学习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政治秩序有可能遏制和阻挡曾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爆发革命的主要杠杆的那种经济危机。这使无产阶级无法按照俄国样板来发起正面进攻。为了对这种政治秩序作斗争，必然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阵地战’”<sup>②</sup>。因此，葛兰西主要的工作是“去遮蔽”，但汤普森更强调“自澄明”。

应该说，汤普森对主观性或者说经验的内在性质的分析是出彩而吸引人的，但他对客观“自在性”的分析明显有缺陷，他把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仅仅描述为一种惰性而外在的生产关系，忽略了其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捕获主体的意识形态和符号秩序。安德森认为汤普森并没有注意到社会形式及结构本身并非仅仅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其亦是转化和形塑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强大力量，即真正的主体是社会主体。人道社会主义只从伦理上反对敌对世界，注定是无用的悲剧，因为没有力量的高贵只会导致灾祸。

首先，从文化和主体意识的视角来说，安德森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便明确指出，“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主导，不单单是通过武力或财富，而是通过一种社会权威，其最终的认可和表述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霸权”<sup>③</sup>。社会的诸多方面皆渗入了由统治集团所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从而保证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及秩序的稳定运作，因此不能仅仅将社会秩序、文化等因素当作阶级结构或经济关系中某个阶级的自然衍生物，而应将其视为本身便具有生产性的。<sup>④</sup>安德森的这一思想主要是受葛兰西影响，后者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会形成文化霸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下层文化的发展特征，甚至

---

①[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王晶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37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

③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39.

④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39.

控制着下层文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换言之,安德森认为下层阶级并不存在“纯粹内在”的自我意识,其文化特征具有被“入侵”性,并且表露出统治阶级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特征。<sup>①</sup> 如果民族文化“不是居于各阶级之上的一套共同价值,不是体现着特定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民族的”。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它体现着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但这种体现是不平等的。……民族文化总是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统治阶级对权力和交往的控制最终在记载文化的石碑竹简上刻下决定性的烙印。……在政治制约下的文化中,文明不仅是信仰体系,而且还是权力体系。国家权力和精英势力使得那些地位较低者逐渐驯服于体现了地位较高者的文化支配权和意识形态类型”<sup>②</sup>。

在《国民文化的构成》一书中,安德森对英国当代社会文化分析后指出,“虽然培根、洛克、休谟等离我们已然相去甚远,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在今天依然有着明显的影响。这既是民族文化精华历时性价值的一种反应,也是上层文化传承规律的外在表现。民族文化中精英阶层总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上对那些地位较低者施加驯化功能,这正是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sup>③</sup>。因此,“下层民众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并不只是来源于他们本身,在某一时期更是受上层文化的调控和引导”<sup>④</sup>。工人阶级的文化不仅受上层阶级的影响,甚至还受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因为“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但历史地看,民族文化发展的潜力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有时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导因素”<sup>⑤</sup>。

因此,当汤普森强调文化的时候,汤普森不是在接近阶级意识,而是在远离阶级意识。安德森赞赏柯亨所作的区分,即“一个人的阶级性仅仅只是由其所有关系网中的客观位置所构建的……其意识、文化

①Perry Ander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New Left Review*, 1964(18), pp. 3-4.

②[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70页。

③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Harmondworth: Penguin, 1969, p. 40.

④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National Culture*. Harmondworth: Penguin, 1969, p. 35.

⑤Perry Ander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 *New Left Review*, 1964(18), p. 55.

和政治并不进入对其阶级位置的界定中。事实上,对这些因素的排除是为了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特征,即阶级立场高于意识、文化和政治”<sup>①</sup>。只要对比一下汤普森的说法,我们就能感受到安德森的深刻性。汤普森说,“阶级不是机器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而是机器一旦发动所运行的方式——不是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而是不同利益间的冲突——运动本身,热情和喧嚷。阶级是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构成(通常会找到制度的表达),它无法被抽象或孤立地加以界定,只能按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加以界定;并且最终,这一界定只能以时间为媒介,即行为和反应、变化和冲突。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一种被松散界定的一群人,他们享有同样的利益聚合、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他们倾向于作为阶级而行动,倾向于以阶级的方式在与其他群体人们相关的行为和意识中来界定自己。但阶级本身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发生”<sup>②</sup>。

与此同时,安德森对于汤普森试图借助保守文化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做法嗤之以鼻,并严厉指出,就英国而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改造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未改变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独特性及其对社会运动的潜在影响,加之英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使英国工人运动难以发展壮大,同时也影响了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其对工人运动应有的导向作用”<sup>③</sup>。靠保守文化形成的不是阶级意识,而是种族主义或者皇权思想。“在英国,一个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造就了一个顺从于它的无产阶级,英国工人运动落入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旧贵族构建的陈腐的上层建筑之中。……英国工人运动在宪章运动后就偃旗息鼓了,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工人运动长久的休眠,欧洲最富于反抗性的工人阶级成了麻木不仁、温顺苟和的工人阶级。”<sup>④</sup>因此,工人运动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指导和战略导向。同时,安德森认

① See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40.

② 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357.

③ Perry Anderson, “The Notion of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 146.

④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131, 156.

为,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英国工人阶级难以形成坚强的阶级意识。而在这种情况下,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英国工人阶级自发觉醒上是行不通的”<sup>①</sup>。安德森毫无疑问感受到了资本主义不只是造成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劳资之间的冲突,还造成了工人本身的分化。

其次,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中,认为汤普森对人口分布、比例、劳动的状况等重大问题失察让人感到吃惊,“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sup>②</sup>。“整个历史过程中,各种由工匠、小私有者、农业劳动者、家庭工人和接受救济的穷人组成的各种群体逐渐被集合、分布或归入含有资本的劳动条件中。首先是对工资合同形式上的依赖,最终是对整合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真实依赖。”<sup>③</sup>因此,产业化的进程和范围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工人阶级唯物主义研究的主题。

安德森批评了汤普森等人的左翼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虽然从传统的英雄史观转为人民史观,但却因忽视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失于片面。安德森严肃地指出:“今天,当‘自下而上’写历史已成为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一个口号,并且在我们理解过去中

①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64(23), p. 20.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

③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33.



获得很大进展之时,无论如何必须记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自明之理,阶级之间的现世斗争最终通过社会政治领域的斗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领域来解决。换句话说,只要阶级继续存在,就唯有建设国家或破坏国家才能确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转变。一部‘自上而下的历史’即关于阶级统治的历史一点也不比‘自下而上的历史’逊色:没有它,后者最终只是单面的历史。”<sup>①</sup>他在有关雅各宾派的论述中也写道:“雅各宾分子不仅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使资产阶级成为主导阶级,而且他们做得更多,他们创造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使资产阶级成为民族中的霸权阶级和领导阶级。”<sup>②</sup>

除了文化霸权之外,武装夺取政权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武装冲突和内战,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主要发达国家中获胜,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是美国。然而,是否可以设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过渡仅仅是从一种私有产权转向另一种私有产权,从私有产权向集体产权过渡中所包含的这一更巨大的历史变迁,它必然会使对权力和财富的剥夺更加剧烈,它能够承担更少伤害的政治形式么?同样地,如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连续过渡产生了统治和表现类型的划时代的变革——从古代部落制到中世纪庄园制再到资产阶级议会制,而没有提及帝国的、绝对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那么,这一放弃了工人委员会和官僚国家的社会主义之路在未来可能不会这样做么?”<sup>③</sup>“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革命统一的唯一一人,但其策略公式并没有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这一最终的目标,最终陷入了改良主义,因而无法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未来提供一种政治解决方案。”<sup>④</sup>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⑤</sup>当然,这

①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86, p. 11.

②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 27.

③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195.

④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2.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也并非绝对化的,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演讲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sup>①</sup>

我们看到,面对困境,汤普森和安德森开出了各自不同的处方。前者依靠未被腐蚀的纯真经验性内容,即无论“霸权”多强大,也必有剩余和裂缝。汤普森说:“我无法接受西欧某些结构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圈中的这一流行观点,即霸权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统治——或是除知识分子以外的所有人——直达他们经验的门口,从一出生就在其心灵中植入了服从的范畴,这是他们无力摆脱,他们的经验也无法纠正的。”<sup>②</sup>实际情况是,以英国为例,“尽管我们无法忘记帝国主义这一突出阴影,但英国仍是一个相对人性的社会;某些仍远离社会主义世界的民主价值得到了巩固;在工资问题和一种更广泛的要求上,工人的讨价权力是巨大的”<sup>③</sup>。因此,“对人民重要的不是它是否是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它是一个残酷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可容忍的资本主义——是人们被丢弃在战争中,面对审讯和武断的逮捕,还是允许个人和组织的部分自由”<sup>④</sup>。

而安德森意识到了“霸权”在争夺纯真经验中的优势和强大性,光依靠“内容”自身的自发性是无望的,“那些异化得最彻底并且感到最绝望的人们也是那些最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们;那些对权力最自信和对目的最明确的人们也是那些最不愿意看到和走向绝望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②Edward 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1978(2), p. 164.

③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84.

④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arity of the English,"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92.



救的人们”<sup>①</sup>。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只要宣布放弃或没有认识到领导权的思想，那么阶级就不成为一个阶级，或者还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行会或各种行会的总和……正是对领导权思想的认识及其在阶级自身活动中对领导权的实施才把整个行会转变为阶级”<sup>②</sup>。

安德森说道：“一般来说，剥削阶级控制着民族文化中大多数艺术和智慧的成就，这是由于他们占据了不同于劳工的优越位置，他们有闲暇和知识，然而正是在劳工阶级中可能逐渐产生许多日常生活中非正规的习俗和实践，国家暴力和精英势力使得那些地位较低者逐渐驯服于体现了地位较高者的支配权的习惯做法和其中所包含的残忍。”<sup>③</sup>如果只依赖下层阶级自身自发性的文化，我们就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革命历史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因此，如果认为今天的民众运动必须首先总是优先运用它们的民族文化中从下层经验派生出来的资源，那将是错误的，这些经验中有可能沉淀着太多的失败，或者消极忍耐的记录太长，从而不能为今天情绪高昂的动员所利用”<sup>④</sup>。

这里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仅仅是利益之争的革命，因此光依靠被剥削带来的经验性的直观反抗，或者费边社式的利益斗争，是完成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业的。因为这一伟业的特殊性在于：“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阶级，就在于他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合作主义的框架，而是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作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被剥削人口的指南而行动……如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内把自己局限于特殊的合作利益，并努力改善其状况——有时是极令人满意的，但也无法忘记和推卸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即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sup>⑤</sup>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它首先“意味着一些更艰难、更明确的东

---

①Perry Anderson, "A Culture in Contraflow-1," *New Left Review*, 1990(180), p. 58.

②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 17.

③[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68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68页。

⑤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 18.

西：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解体，从生产方式上对有产阶级的没收”。而更为艰巨的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一种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的建立，其中，相关的生产者首次对其工作生活和政治政府实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sup>①</sup>。但这可行吗？具体如何实施？这些都是极为艰巨的理论任务。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理想与现实的策略相结合的任务，不能偏向任何一边。“无道德的策略是一种权谋的计算，它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毫无益处和作用。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确实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一种无价值的权力：像 Rakosi 或 Zachariadis 这样的人物就是最致命的标志。无策略的道德是一种仅仅配有反敌对世界的道德的人本社会主义，注定走向不必要的悲剧：无武力的贵族只能导致灾难，正如 Dubcek 和 Allende 所提醒我们的。”<sup>②</sup>汤普森的问题正在于，将“社会主义的传统目的让位于一种对‘民众’的永恒的和格言式的祈祷——确切来说是民粹主义的术语。这一悲伤的、假设的抽象反复出现，直到它开始主宰所有的政治讨论”<sup>③</sup>。结果是，它只能导致某种伤感的自我欺骗和不现实。<sup>④</sup>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镜像反映。

因此，安德森更侧重于结构性危机和由危机引发的阶级斗争，而汤普森把整个历史理解为阶级斗争史。安德森虽然也强调历史在当代的复兴导致不同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差异巨大，但对于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他更寄托于未来。对于两者的这些差异，我们可以从各自的引文中看出端倪。安德森认为主体的能动性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私人领域的婚丧嫁娶，房屋的维护清理，给新生婴儿取名等。在这些层面，个体确实有很大的自由权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第二是集体的公共主体性，比如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国内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等，集体的分析与劳作等等。第三个层面是普遍性

①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p. 194.

②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p. 206.

③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 34.

④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p. 35-36.



的理想层面,比如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对人类理想的描述。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恰恰属于第三种,它追求的是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普遍自由与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它不可能是经验性和历史的,而是宏观、系统和结构性的。<sup>①</sup>

汤普森则认为,“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警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在这片国土上,这些资源博大精深,其中有不少糟粕。不过,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曾敏锐地研究过它们的英国历史学家发现,它们并不……完全是封闭的和倒退的。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的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sup>②</sup>。在某种意义上,汤普森更看重微观、经验和情感层面的斗争与波动,而安德森则更注重宏观的社会关系结构。两者间的分歧,更多是侧重点的差异。

## 二、对结构主义的批评

安德森在《交锋地带》中,分析了斯蒂·克罗克斯与汤普森截然相反的主张,克罗克斯著作的主旨在于展示压迫和剥削的物质结构,就像凡·高的《吃土豆的人们》所呈现给人们的那样,研究者要做的仅仅是“艺术上的生动再现”。因此阶级不应该首先被定义为一种文化意识或政治自律的主观的“发生”(happening),而是客观形成的,是由剥削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集体的团结和集体利益的意识也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的。意识不是主观性的,而是客观结构的后果。就像哪

---

①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p. 19-20.

②Edward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IV.

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呈现的那样,反抗是不需要有意识的,或者说反抗的意识是客观的。因此阶级斗争甚至还存在于“双方都没有明晰的阶级意识、根本没有特别的政治斗争,以及或许没有丝毫斗争意识的地方”<sup>①</sup>。为了让这个解释比较有说服力,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所关注的每一社会的真正特点并非是生产劳动的生产方式,而是剩余价值的剥削。如果个人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话,这些角色中的剥削关系应该占主导地位。在古代男女不平等的时代,奴隶主的妻子、女儿首先是奴隶主,其次才是女性。并且,男女的不平等程度和所属阶级是密切相关的。最高阶级的女性由于没有财产权,因此与有财产权的男性差别就很大,而贫民和奴隶之间,原本就没有财产,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反而不会过于悬殊。安德森认为克罗克斯为了追求客观性,忽视了文化歧视与经济剥削之间的差异;内部的关系固然重要,外部的侵扰同样是内部斗争的重要因素。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品《野性的思维》,安德森认为,斯特劳斯的这部著作,“不仅包含了在任何意义上都完全是一种替代的人类学,而且以所有人的心灵都具有不变的属性和一切人类社会都具有相同的尊严为依据,连撵带轰结束了萨特的历史主义。……它以横扫一切之势,摧毁了萨特认为是辩证理性或历史的历时性的所有主张——列维-斯特劳斯把这些主张完全比作是与‘野蛮人’心灵相对的‘文明人’的神话。……人类科学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构筑人,而是要揭开人的秘密”<sup>②</sup>。

安德森在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探讨后,认为当结构主义把索绪尔对语言(language)与言语(speech)、共时性秩序(synchronic order)与历时性秩序(diachronic order)、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对立的差异应用到人类学领域时,作为一种运动的“结构主义”就诞生了。这种结构主义认为就像语言具有至高的稳定

①[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性一样，亲族系统和婚姻法则也是“一种语言”。结构主义把语言作为现代世界的总主子，认为“话语之外无他物”，“话语之前无他物”。在安德森看来，反倒是索绪尔本人警告不要从他的研究领域出发随便进行类比和肆意引申，因为家族制度或经济领域中的对象都是有意识的，并不像语言符号一样是无意识的。<sup>①</sup> 安德森认为，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与其他人类实践之间的差异。当结构主义把“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测定世界上语言以外的结构和主体的各种不同位置的理论依据时，其就必然成为特别失常的罗盘。在安德森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结构主义有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在各种社会习俗之中，语言结构的历史变动系数特别低。由于变动非常缓慢，是不自觉的，且极少有例外，因此语言结构在这个方面完全不同于经济、政治或宗教的结构，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的变动速度——一旦进入阶级社会——一般都是非常快的。

其次，在安德森看来，作为一种结构语言特有的不变性，却伴随着它内部的主体的同样突出的创造力。语言不变性的对应面是言语的灵活自由，因为言谈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约束。从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来说，言谈都是自由的，它们的“生产”无须花费任何东西，而且可以在意义的规则范围内，按照意愿来增加和随意地摆布。而由社会主体承担的一切其他主要社会实践却要受自然匮乏法则的制约：人、商品或劳动力，都不能随意和无限地生产出来。因此，在安德森的视界里，说话主体虽然是自己，实则无用，也就是它对结构的反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实质上等于零。即使其天才影响了整个文化的最伟大的作家，一般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微乎其微的。

最后，安德森认为结构主义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语言中的说话主体不言而喻是个人——不要都同时讲话：多数人同时讲话是听不清的，也就等于谁都没有讲话。相反，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结构领域中的有关主体首先都是集合体：民族、阶级、等级、群体、世代。正因为如此，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这些主体的力量才能够引起那些结构的深刻变化。在安德森看来,这对试图把语言学模式转换到更广泛的历史过程的结构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结构主义的做法不过是对语言缺乏现实基础的思辨式扩大。

再往后,阿尔都塞通过“同结构主义术语的‘调情’”,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结构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并反过来支配现实个体的思想进行了深度阐发。但阿尔都塞为了强调上述马克思的重要发现,甚至批判和反对马克思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提法。他不但不反对列维-斯特劳斯试图把主体从任何科学知识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反而更进一步,对阶级、群众的主体性过于轻视,最终除了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虚幻主体外,再无能动的原初主体。这个局限性导致了他的思想即使在鼎盛时期,仍然“本质构成上都决定性地依赖于既先于它而存在,又比它存在更长久的结构主义”,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各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阿尔都塞主义在本质构成上是依赖于结构主义的。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曾通过把主体从任何科学知识的领域中暂时分离开来的方式,力图揭开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棘手的难题的话,阿尔都塞不是反对这种做法,而是以完全取消主体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使其变得更为激进。<sup>①</sup>

阿尔都塞在《〈资本论〉的对象》一文中说:“真正的‘主体’(即构成过程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的社会关系)。但是,由于这一些‘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主体的范畴。如果任何人偶然想要把这些生产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还原为‘人的关系’,他就是在亵渎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少数模糊不清的提法持真正的批判态度,我们就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可以看到,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的关系。”<sup>①</sup>阿尔都塞在后来的自我批评中进行了一些反思和矫正,以确保主体的反抗与行动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被取消,而是对其认识更加谨慎与细微了。“如果说‘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问题消失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行动的问题消失了……这也并不意味着革命政党的问题消失了……但是它的确意味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革命政党的存在、性质、实践和目标,不是由‘超越’的无上的权威即‘人’的自由决定的,而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sup>②</sup>在这里,阿尔都塞对超验主体仍然持拒绝的态度。可以说,阿尔都塞成也“结构”,败也“结构”。对此,安德森严厉批判道:“如果结构单独在一个超越所有主体的世界中得到公认,那么什么能确保它们的客观性呢?极端的结构主义也决不会比它所宣告的人类的毁灭再刺耳了。”<sup>③</sup>

而与结构主义有着共同血统和渊源的后结构主义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新话语”派,虽然对结构主义进行了过分的挑剔和苛责,但仍然一切都从结构、形状或关系开始,由于同时“抛弃了所有涉及中心、主体、起源或绝对本源的关联”<sup>④</sup>,其仍然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sup>⑤</sup>。“新话语”派在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即结构与主体的关系上并没有高人一筹。一旦被当作主体隐喻的“所指”的变动不居性成为主流,无情地谴责真理的虚幻性和意义的固定性,就会造

---

①[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②[法]阿图塞(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65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④[法]雅克·德里达:《写作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6页。

⑤[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成“没有谬误,没有真理,也没有起源”<sup>①</sup>的局面。对神话的解释本身将变为一种神话,或者神话经过解释不再是神话,都是无所谓的“延异”。换句话说,“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没有差别的,或者说差别是不重要的。主体变成了超出真理和谬误范围的玩弄意指。<sup>②</sup>对此,安德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僵局,尽管结构主义曾许诺要超越它们,但在这一竞争领域中却从未在细节上得到解决。把语言模式当作解开‘所有神话的钥匙’,远未阐明或解释结构与主体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由结构的夸张的绝对主义发展为对分裂的主体的盲目崇拜,但并未发展关于结构与主体的关系的理论。”<sup>③</sup>重新确定主体性真理地位的,要等到巴迪欧后,才逐渐得到再度弘扬。

在安德森看来,对于人类行动者塑造全新集体生活可能性的强烈意识,汤普森更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时代的政治品性——但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蔑视了千年必然王国中自我决定的否定性向度。<sup>④</sup>在安德森看来,偏向结构或主体的两种极端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历史唯物主义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或解释原则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安德森之前,以及与安德森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其实都对结构与主体的对立和矛盾进行过阐释和探讨。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评论法国结构主义时,指出其忽视了主体与结构的辩证关系,“专心致志于结构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sup>⑤</sup>,在皮亚杰看来,结构是在生成的、开放的和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不断转换的。因此,要“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

①[法]雅克·德里达:《写作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④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p. 58.

⑤[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4、85页。



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sup>①</sup>。

安德森认为，“结构和主体作为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是相互依赖的，对主体过多的非难在一定时候必然也会伤害结构。这种作用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主观性的无限膨胀”<sup>②</sup>。正如阿多诺曾预见到的一样，“真理的客观性确实需要主体。一旦与主体断绝，它便成了纯粹的主观性的牺牲品”<sup>③</sup>。安德森认为，结构中的主体是可以破坏旧结构，建设新结构的主体，阿尔都塞强调了历史中结构的必然性和绝对力量，看起来好像更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它是以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端漠视、遮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削弱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为代价的。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sup>④</sup>。“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

①[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③Theodor W. Adorno,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 72. 但阿多诺坚持认为：“双方各自所占的比重的问题并非总是固定不变的。”(p. 156)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sup>①</sup>

但另一方面,安德森强调,虽然马克思注重客观结构的分析,但不仅仅停留于客观条件,比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谈到19世纪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sup>②</sup>马克思由此表明,阶级不只是与经济利益导致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冲突有关,阶级要形成,还要有与之相互敌对的另一个阶级的存在,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并组织成政治性的组织。特别是最后一项,就旨在强调自为能动性的方面。乔瑞金教授就此分析为:生产关系是决定阶级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共同关系”和“政治组织”等要素是阶级形成的主观要素;与之“相互敌对”的另一个阶级是必备要素;数量和规模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要素。以上这些阶级形成的要素中,“经济条件”最为关键,也是唯物主义原则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根本的体现,但其他三个要素也必不可少,这四种要素加在一起才使阶级形成成为可能。<sup>③</sup>

在“差异的动态总体观”一节中,已经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关系,此处将进一步深化。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涉及的是内在结构实体,一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系统综合序列。而在《共产党宣言》中涉及的则是为控制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而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主体力量,一般称之为社会综合领域。这种很有说服力的分歧和对立的例子,则可以“从罗伯特·布伦纳和盖伊·博伊斯对早期现代欧洲封建主义过渡到农业资本主义的相悖的解释中看出来:一个基本上依据中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③乔瑞金等:《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71页。

纪后期农村阶级力量的变化无常的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另一个则依据封建经济中庄园租金率趋于下降的必然逻辑去说明”<sup>①</sup>。而先前已然批判过的年鉴学派,则试图超越二者,进行“客观”研究,对结构性动力还是主体性动力漠不关心,把它等同于表面的事件。而不管是以科耶夫、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等为奠基人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其本身和后结构主义一样,实际上是一个被突出强调,甚至加剧了的左翼主观本体论。<sup>②</sup>

因此,在安德森看来,结构与主体同时是马克思讨论的重要内容,他一方面认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sup>③</sup>;另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人反抗和超越一定的客观结构的能动性和可能性,主张“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④</sup>。以列宁为代表的这一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强调阶级的客观性,比如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sup>⑤</sup>然而,列宁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组织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在组织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阶级主体性的使命,同样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列宁的身上:“在列宁之前,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实际上从未加以考察过。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

①[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0—41页。具体可参见《布伦纳辩论》中的交锋,以及博伊斯的《封建制度的危机》一书。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⑤《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方式……将宣传和鼓动相结合、领导罢工和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组织、处理民族自决问题、阐明国内和国际的危机、对付各种偏向、利用议会工作、准备起义袭击等特殊方式——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往往简单地被看作‘实际’的手段，而在实际上代表了对未知领域在认识上的明确进展。”<sup>①</sup>

在安德森看来，列宁以《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为代表的百来篇著作或文章，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科学，而在列宁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不成体系的。“在列宁身上，政治思想和行动空前绝后地迅速合为一体。从《四月提纲》经《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直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论粮食税》，这些年代里的列宁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创立了新的准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个原则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不久以后‘列宁主义’的名称就被使用了。”<sup>②</sup>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sup>③</sup>因此，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辩证互动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sup>④</sup>，是影响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

不管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还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也包括在与美国和中国学者的访谈中，安德森始终肯定汤普森的贡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献和成就,但却持续批评他缺乏系统分析和把握的维度。最终的出路就并非在阿尔都塞所代表的结构、汤普森所代表的能动性之间非此即彼地二选一。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两者相互依赖,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历史既不是阿尔都塞“无目标和主体的过程”,即历史变迁不仅仅是结构性矛盾自身日益积累的结果,人们在此过程中也不仅仅是结构关系和冲突的承担者,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理念也不只是结构性意识形态的纯粹幻觉;同时,历史也并非汤普森对反面的极度坚持:历史并非是人本身不断调整相互的关系而创造或者是再创造他们自身的生活的,结构或者说生产方式并不只代表了人类实践与斗争中持续被推翻和克服的限度和障碍,人们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的行动和想法,还受到结构的统摄和形塑。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人与人之间、人与这些客观条件之间永恒的斗争与冲突。

论争的意义在于,安德森在阿尔都塞的基础上,经过反思接受了汤普森的合理性建议。“事实上,他意识到了这一模式的不充分性,这可以在他对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在政治现象处理的真正见解和精妙之处看到”<sup>①</sup>,并更倾向于威廉斯的折中主张,即“必须把‘决定论’重估为有限要素的排列和压力的释放,远离一种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重估为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实践,远离一种反映的、再现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估‘基础’,使它远离一种固定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概念,并朝向包含了基本矛盾和变化的处于动态过程的现实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sup>②</sup>。

用安德森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各种实践都必然依赖各种条件,这是交互的过程。“在无主体的自然—人类过程”和“持续被阻碍、永远再复兴的无主人的能动性实践”的对抗公式,都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思

---

①Edward P.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 1965, pp. 356-357.

②Raymond Williams,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New Left Review*, 1973(82), p. 6.

辨特征,而无益于帮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处理我们在个体的、集体的、人类的各类活动中的地位 and 角色。真正的历史是大众解放的历史,是底层百姓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断通过斗争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的历史。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评述

佩里·安德森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思想史研究的先驱,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特点作了宏观的透视和考察,他在该书中所阐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梳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对于深化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安德森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是几代人更替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一阐述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主流向西欧转移的原因。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典传统”,其发展过程被概括为世代的更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始人,马克思主要阐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其他著作中则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

安德森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出现了四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们是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安德森对他们的概括是“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另一方面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接触的领





域”<sup>①</sup>。在下述背景下,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出现明显的经济高涨,在国内已经形成垄断,在国外加速帝国主义扩张,大国之间出现军事冲突,产生了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列宁、卢森堡、希法亭、托洛茨基、鲍威尔、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布哈林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领导人,因此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其理论主要关注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出现了下列代表作:考茨基的《土地问题》、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等,这些著作对垄断和帝国主义的产生作出了系统的经济分析。同时,系统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成为他们关注的另一个主题,列宁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比如《国家与革命》、《怎么办?》等,并创立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原则。

1924年列宁逝世后,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另一方面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一切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已经不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传统,在东欧和俄国已经完全消失。在西欧则出现了另一种无论就学术结构还是地域结构而言都完全不同于经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安德森看来,西方左翼运动的失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社会历史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是产生于政治上的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带有一种共同的灰色的悲观主义情绪,正如本雅明说:“人是这样描绘历史这个天使的。他的脸向过去。在我们察觉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空难,不断把一个又一个残骸堆积起来,扔在脚前。”<sup>②</sup>从学术传承来说,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手稿和遗稿的重新发现、整理

---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与出版,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与经典传统有很大差异的可贵探索。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在安德森那里本身并不指精确的空间或时间,他是从“世代性”和“地域性”的双重视角来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而重点又放在了“世代性”或者说“同构性”上。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在安德森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sup>①</sup>,理论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sup>②</sup>,这正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所开创的路径相反:由研究黑格尔法哲学问题转向政治经济学。

具体而言,安德森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些思潮和学派缺乏国际视野和相互交流,“随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在苏联的实现,继之以共产国际的不断官僚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的主要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这种探讨不仅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而且也越来越不具有国际性。理论逐渐退缩到国家范围以内,由于不太关心或不了解而相互隔绝”<sup>③</sup>。“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sup>④</sup>。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页。

之间丧失了建立有力联系的可能性”<sup>①</sup>。

也就是说,在安德森看来,除了偶然、粗率而肤浅的评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找不出在某一思想家或流派与另一思想家或流派之间,发生全面的理论交锋或冲突的事例,更不用说让理论的交锋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全面的影响了。而这种地方主义的态度,阻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整个面貌取得有条理的、明晰的认知。安德森在《西方左派图绘》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态度:“纯粹的一国战略都已经消失了,只有当这个核心问题被解决之后,西欧左派才能获得新的轮廓线。”<sup>②</sup>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着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一方面,20世纪西方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活力,并持续引领世界经济的走向。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代表性思想亦重新获得了活力,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保持了绝对的优势:它仍然保有世界上为数最多、训练最佳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效忠,他们的创作活动继续以一些主要的民族形式大量存在于各个领域。“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地带的帝国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呈现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已经构成了可怕的理论挑战。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也使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上建立起来。”<sup>③</sup>

第三,思想来源更加资产阶级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思想渊源,一方面在水平轴上受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受到韦伯、齐美尔、克罗奇、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影响),在安德森看来,这些思想家在这之前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时常公开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学者;另一方面无一例外地建立起一种上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渊源的自发机制,即通过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倒退到了马克思以前: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马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克思以前的哲学研究,并使之“合法化”。比如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异化”、“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的思想是来自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则试图对作为马克思著作的准备和前提的黑格尔思想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阿多诺则强调《精神现象学》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性;意大利的德拉·奥尔佩学派则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略,直到休谟这一渊源来解释马克思;科莱蒂则认为马克思的真正哲学前辈是康德和卢梭;阿尔都塞则把斯宾诺莎规定为马克思的理论先祖;葛兰西用马基雅维利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论,把“狱中札记”写成同克罗齐的连续性对话;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充斥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概念;萨特对福楼拜的研究充满了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共鸣,甚至他本人和马尔库塞就是这两位学生的学生,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sup>①</sup>

第四,深受《手稿》的影响。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成为决定性的事件,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并永久地改变了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些手稿的发表,被视为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成中具有关键性地位的重要标志,甚至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的前提和出发点。

第五,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文化和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结构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而且在所关注的主题上也发生了根本转移。研究主题几乎全部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sup>②</sup>,更具体点说是文化。而在文化领域内,最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聪明才智的,首先是艺术。比如卢卡奇用毕生大部分精力钻研文学,写了大量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研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究,而阿多诺、列斐弗尔以及德拉·沃尔佩等人均撰写了大量的美学理论专著,马尔库塞则直接把美学定为自由社会的中心范畴。他们都自始至终地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作为通往具体世界的最便捷的桥梁。

具体说来,阿多诺写了十几本论音乐的著作,并有一部导论性的《美学理论》;列斐弗尔著有《美学文集》;德拉·沃尔佩除了电影和诗歌外,还写了一部《情趣批判》;本雅明是布莱希特的朋友,又是他作品的研究者;萨特是非常有名的文艺理论家,西方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和文学家。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这样自始至终地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自启蒙时代以来,美学便是哲学通往具体世界的更便捷的桥梁,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有一种经久不衰的特殊吸引力。”<sup>①</sup>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著作相比,美学著作都要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这种理论主题的转换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这种创新和贡献首先体现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上。这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西欧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大力量及其复杂性,即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统治权,还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这就使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采取俄国革命的模式,只能采取长期的“阵地战”方式。

第六,与传统的工人运动相分离。“在这个改变了的世界上,革命的理论全起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了今天可以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sup>②</sup>“其主要特征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sup>③</sup>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用密码式的语言来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使之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不论是正式参加工人阶级政党(卢卡奇、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退出工人阶级政党(列斐弗尔、科莱蒂)、与工人阶级政党进行友好的对话(萨特)或是明确地断绝与工人阶级正常的任何联系(阿多诺、马尔库塞),都同样不可能将马克思主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义的理论为群众斗争相结合。”<sup>①</sup>他们虽然并未直接宣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或最终目的是认识论,但却一致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解释世界。安德森举证说,这从其代表作的题目就可见一斑了。比如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卢卡奇的《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还有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德拉·沃尔佩的《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逻辑学》,以及萨特的《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等。而且正如前述,他们所使用的术语艰深晦涩,进一步促使其理论远远脱离政治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与马克思总是设法把自己的思想以尽量简明易懂的方式提出来的做法明显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陷入形而上的玄思,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sup>②</sup>。当然,安德森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创始人那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是“不同寻常”的:“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相合。”<sup>③</sup>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面临的,则是传统工人阶级的日益弱化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

第七,否定进步史观。在安德森看来,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前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从自然必然性的暴政下逐步获得解放,虽然这种解放的成果被统治阶级通过剥削的方式据为己有,但当人类社会以“自由王国”为标志,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的成果,必将被生产者自己占有,并最终会创造出一个普遍繁荣富足的社会。

以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强烈

---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的质疑,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实际进程否定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可能结局的设想,技术进步已成为一种退化,不再含有向另一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人和自然的最初决裂,以及后来人对自然逐渐取得优势的过程,未必对人类解放带来进展。为了取得对自然——人类本身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支配,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分工和精神分工,这使人类遭受空前深重的压迫……降伏自然的同时,也使阶级固定下来,因而使大部分人从属于犹如不可改变的第二自然一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社会秩序。迄今为止,技术进步只是使得专制机器更为完善而已。”<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失去了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被剥削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意识,他们只会机械地选举自己的主子来统治自己。而且,工业技术的改进最终也有可能导致行星的自我毁灭:核武器和环境污染。所以,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方式不能再是对自然必然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支配,不再是通过使自然屈从于人而是使人和自然等同。也就是说,要承认人与自然的区别和联系,承认人与自然的亲和力很脆弱,只有这样,“堕落的自然”才能获得最终的挽救,“人和自然最终将在主观和客观的和谐统一中获得协调”。<sup>②</sup>

第八,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常常以不同历史制度下人类社会的变易性,以及解放而不是压抑的人类的完善性为根据,去反对永恒的、没有感应能力的人性观念。而以诺姆·乔姆斯基和巴林顿·穆尔为代表的新生代,却提出了关于人类的自发性或创造性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社会政治最终必然植根于某种人性或人的需要的观念,因为人类不只是随意可塑的有机体,人的基本性能是需要创造性地自我表现,需要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 and 思想的一切方面,而不是国家权威或行为技术专家可以随意控制的对象。

在安德森看来,自然与历史的融合是结构与主体关系之后,对历史

---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唯物主义提出的更大难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妇女问题、生态学问题和战争问题。这些像人类学一样的普遍问题都关涉如何诠释自然与历史的关系,这些运动对外在和内在的自然常常要求一种超自然的稳定性和同一性,所以自然与历史的结合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无法回避的问题。安德森认为,解决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问题刻不容缓,庆幸的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敏锐、激进而不乏深刻,却缺少经典历史唯物主义那种严谨、宏大的分析力,没有提供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缺乏精彩的政治理论研究,虽然葛兰西提供了一些政治策略性的分析,如霸权理论、阵地战观念等,却只是一个例外,并且远没有列宁、考茨基、卢森堡等人的丰富精彩,更别提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极为重要之作了。其他人则逐渐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以及他们继承人的信心和乐观主义,充满了“悲观主义”的基调。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著作充满了忧郁的情调,对于人类最终掌握自然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王国的思想提出了质疑;马尔库塞则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和“单向度”化了;阿尔都塞则认为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依然会存在虚幻的意识形态;萨特从他的“匮乏”理论出发,认为专制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安德森指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缺乏政治理论,但仍然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丰富遗产和知识活力,并通过后来的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晚期资本主义》,米歇尔·阿利叶特(Michel Aglietta)的《资本主义操控理论》,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以及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的作品,得到了补充和更新。<sup>①</sup>

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还持续关注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英国新左翼。在他看来,英国新左翼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是出于对经济统治、经济化约论和苏联官方理论——这些理论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





都带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强烈拒绝。霍尔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更为开放，也更具同情心，主张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严肃地对待摇滚音乐、电视剧等“下层文化”，试图将大众文化置于政治架构的分析之中。英国新左翼大众主义的路线与欧洲大陆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恰好形成对立，后者对大众文化具有更深的敌意。安德森对两者都有所保留，认为如果坚持对所有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包括那些垃圾电影的话，其批判性的视野就会完全丧失，因此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堕落为庸俗的大众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因对大众文化抱有敌意，对文化工业持有基本批判，因此常常无法逼近地理解大众文化。不过英国新左翼的其他学者对英国浪漫主义及其悠久的敌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文学传统更感兴趣。比如以布雷克、华兹华斯、雪莱、马修·阿诺德、柯勒律治等为代表的19世纪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包含了浪漫主义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它们是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平衡：既逼近地了解，又保持批判性。但安德森认为建筑、城市空间等问题也迫切需要积极地介入和参与，刺激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识，包括设计新的人们所需要的建筑。安德森认为，总的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取向，而是试图把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理论研究和审美研究结合在一起，努力避免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二元极化。<sup>①</sup>

总的说来，首先，我们得承认，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有着高超的把控能力和突出贡献。但由于安德森对政治经济结构的过于看重，未能充分意识到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斗争在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就像布莱克利奇所评价的那样：“无论如何批判，我们也许会看到，历史在当前形势下发生转变的参数要比安德森的评价所允许的更为广泛。”<sup>②</sup>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鄙视性地批评，“谈方法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

<sup>②</sup>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 2004, p. 171.

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sup>①</sup>,不能不说是一种多少显得有些草率的偏见。

其次,由于安德森过于看重“宏观”的分析和把握,或者说重点放在了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上,就对他们之间的差异未能准确而细致地把捉,使得具有种种差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被界定为一种共同的学术传统。这一简单化的统一做法势必抹杀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异,甚至对立。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对此已明确指出,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研究路径必然会取消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和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显著对立。<sup>②</sup>这是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结概括时的问题所在。德沃金精妙地分析了这一缺陷:安德森只是把自己当一个文化的局外人,把对方看作是一群相互联系的思想家,导致对方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状态。换言之,安德森从没把自己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员,他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外部,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sup>③</sup>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②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0.

③[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190页。

## 第三章

### 安德森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分析与批判

---

#### 一、后工业社会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在安德森看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打败了它的对手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在经济上,资本主义不但重获活力,还形成了“复杂生产和利润相联合的机制”,以华尔街为首的全球资本开始扫荡全球;在军事上,美国霸权到处扩张,展示存在。在安德森看来,20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者成长起来的那个完整地平线实际上已被抹去,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界标也在同等程度上被抹去了。倍倍尔、伯恩斯坦、卢森堡、考茨基、卢卡奇、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已成为像阿里乌派主教一样遥远的名字,多伊彻已杳无踪迹,曼德尔的名字恍如隔世。同时,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都已显得过时。<sup>①</sup>

从劳动者的变化来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在总量上所占据的比例

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倒过来,下降到从事经济活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的水平,在各个方面都被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超过,曾经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在当前不是被资本所驯服,便是逐渐消弱。哪怕在工人阶级内部,差距也在稳步拉大,在里根时代繁荣起来的技术部门熟练工人的物质境况,在安德森看来也从来没有变得如此有利于生活过。这种政治经济的特点,既妨碍了西方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也妨碍了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出现。所以,工人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温和得多的社会民主传统都在福利国家制度的滋养下衰落了。

此外,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否一直与民族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运动始终都与民族自决运动密切相关。共产主义传统,或者说革命传统,主张以武力推翻资本主义,一度在欧洲相对贫穷的国家和亚洲盛行。可以说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相呼应,特别是在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运动始终与社会主义运动持久地、一贯地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在二战期间得以日益巩固,亚洲、美洲和非洲均出现了这一情形。在安德森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与民族解放运动难分难解,是两者联合的典型。但安德森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兴起的民族解放和反殖民运动也已经衰落,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这导致依托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运动一下失去了方向感,原本“左翼一向是和民族国家的框架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民族国家框架大大弱化了”,而“跨国资本是一个比国家帝国主义困难得多的敌人”。<sup>①</sup>

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也失去了方向,他们欢迎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这个全球化的胜利很难被界定为西方传统的胜利,这个传统却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强烈认同的。这里面就包含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史的悖论:资本主义试图将自己扩展到全世界,而在这一过程中,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97页。

资本主义的重心开始偏离欧美的中心。

其实还包含第三重的失去方向，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原本是十分渴望全球经济的——政治上也日益发展的——一体化的，但结果却导致了当代最新形式的紧张、冲突，即文化和文明冲突，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文化和文明，而自由主义对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等讨论则感到极不舒服，因此，他们也感到丧失了方向感。<sup>①</sup>

安德森主张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即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活力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类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从来都不是马克思或者列宁任何一部重要著作所阐述的对象，马克思生前没有见到这种国家的实现；列宁的敌人则完全是沙皇俄国那样类型的国家。”<sup>②</sup>在安德森看来，左翼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它自我适应不断调节的能力，即通过把竞争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机制，能够迸发出非同寻常的生产能力。<sup>③</sup>但安德森提醒，不能因这种暂时的守势和挫折，就从过分的乐观主义转为彻底的悲观主义，悲观主义的潜台词是：资本主义胜局已定，必须用资本主义来维持我们的和平。这种反应的特征是面对令人气馁的实力差距，以假想的错觉代替真实的力量，并最终错失良机。就像爱伦·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一书的“再版导言”中讲的那样，早期乐观主义往往因为挫折转而过高估计对手，认为资本主义无可替代，以致一直具有强烈反抗性冲动的左派，却在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缺点与矛盾冲突最为暴露无遗的当口，毫无准备地向资本主义投降了。

安德森给《新左派评论》定调：“应永远同情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无论它们的影响范围是多么有限，但是它可以支持任何当地的运动和有限的改革，而不伪装这些运动和改革能够改变这一制度的本质。它能够和应当做的是，既不对该制度正转向稳定的进步方向的假象表

①[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③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载《读书》，2005年第6期，第40页。

示信任,也不维护急切要充当反动势力盾牌的遵奉者的神话。”<sup>①</sup>“在这种新形势下,立场应当是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不妥协有两种含义:拒绝与现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枯燥乏味的最高纲领主义不复再来。”<sup>②</sup>

在安德森看来,当前“左派的首要任务是观察它(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sup>③</sup>。安德森认为这些观察中,左翼在思想上对新时代的反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罗伯特·布伦纳和乔万尼·阿瑞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阐释,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领域、T. J. 克拉克在视觉艺术、大卫·哈维在地理空间和《资本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等。<sup>④</sup>在安德森看来,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更广泛的、较少甚至没有马克思主义渊源的分子圈子,如哈贝马斯、德里达、布罗代尔等学者。他们将大胆的知识进取心、广博的学科综合力与政治领域自身的小心翼翼和惯常承诺进行结合,更新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仍然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丰富遗产和知识活力。

在安德森看来,新社会运动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和后工业都市化进程的加速——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治理的主要议题和内容——而形成的。新社会运动认同的本质特征在于参与主体的白领化、年轻化和知识化以及组织方式的科技化和信息化,诉求目标的非物质化、文化化和情感化等,与传统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结合与交叉情况。它们在事实上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但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构成主体也不是工人阶级,其成员也不再是底层的劳苦百姓,而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诉求也往往并非是物质利益和政治统治权。新社会运动具有双重意义:传统工人阶级运动消失;新的能够为“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

①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1).

②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1).

③参见卫宏:《退却还是行动?——西方左翼关于社会主义命运的争论》,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期。

④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的重建与西方左翼的发展》, <http://www.ptext.cn/home4.php?id=355>。

义民主”提供最“具体可行的前景”力量正在生成。新社会运动大致包括维权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反歧视运动、人权运动等。它们提出环境保护、性别、宗教信仰和民族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在事实上形成对现有框架体系的冲击。从其起点 1968 年学生运动便可窥之一二。新社会运动被安德森称之为传统社会运动“终结的开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也认为，新社会运动是通向未来的车轮。<sup>①</sup>

具体说来，安德森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新社会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新社会运动使得自然与历史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安德森因此称之为“新自然主义”，“自然与历史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向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另一个较之结构与主体关系更大的难题”。<sup>②</sup>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传统政治社会运动的挑战者，新社会运动已经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灿然崛起。“未来更强大的文化挑战将来自自然主义，这种迹象现在已遍布我们周围——它们的各种变化或许正笼罩着地平线。”<sup>③</sup>因为它更加持久并且更具有文化力量，比如性别政治，安德森认为性别统治结构比阶级的剥削结构在文化背景上更久远、更深刻，它们在政治上也将引起更少集体的抵抗。因为性别的区分是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融合，并不像作为历史现象的阶级区别那样可以被废除。“在资本家和工人消失很久很久以后，女人和男人还将存在。”<sup>④</sup>此外，两性生理上的差别使得男女必须相互依赖，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他们就永远如此：性别的取消是不可能的，要两者分开也是不可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互惠互惠的多样社会形式，构成了永恒的人类历史。哪怕是在不平等的风俗习惯本身中，牢固形成的感情和支持的纽带还通常由物质条件方面大致的共同平等所维系，哪怕他们原来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14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各属于不同的阶级。

其次,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交叉。“妇女虽然可以从经济上分为不同的阶级,但在本阶级内又一半属于男人,另一半才属于她们自己,其力量一般来说是更微小的、分散的,她们努力的重点往往是作为一般的性的某个特定的配偶。”<sup>①</sup>妇女解放运动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sup>②</sup>。安德森曾经把维护妇女的基本权利视为打开社会主义发展大门的最重要杠杆。因为妇女受压迫不是物质力量的附带现象,其根源主要在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因此女权运动就会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运动,其所提出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全新的社会文化图景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sup>③</sup>它“把消除社会冲突作为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则;因此它必然诉诸道德的改变去代替政治的变革”<sup>④</sup>。

新社会运动的第三个特征是直觉式的普遍主义。新社会运动被认为是超越了资本和劳动斗争的普遍人类利益,在目前阶段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而阶级政治往往被指责缺乏可以与当今人类前途面临的危险状况作斗争的道德力量,这种缺陷是植根于它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理论的性质本身:使敌对的力量彼此无休止地相互争斗,而不是拯救整个人类,就像“血淋淋的20世纪蹒跚走向尽头”那样。但安德森认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下,完全超越对立和斗争的纯粹人类问题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其往往有伦理意义而无组织性政治力量。阶级斗争则既和人类解放有关,有不失实体性的依托力量。

第四,新社会运动的普世目标与实现这种目标的主体是分离的,只有劳动者——现代帝国主义社会中丧失生产资料的、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才是在各方面都是受损害的群体

①[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29页。

②[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56页。

③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Towards Socialism*, with Robin Blackburn (eds.). London: Collins, 1966, pp. 277-278.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和真正的反抗力量。安德森认为,虽然“这种(新社会运动与现存秩序)冲突的潜在后果超出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但它的实际根源仍紧紧盘结于这种对立之中”<sup>①</sup>。“只有作为任何工业社会直接生产者的现代集体劳动者的工人,才具有那样的作用——因为工人独特的阶级职能,或他们在整个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地位,只有他们才能使这个生产过程瘫痪,或对之加以改造;就像只有他们,由于其潜在的凝聚力,人数众多,而能够形成有组织的决心与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决战的队伍的中坚力量。”<sup>②</sup>但是,“不消灭阶级就不可能实现性平等,正如不粉碎资本就不可能消除核战争一样。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就其实际命运而言不能长期与工人运动的力量相脱离”<sup>③</sup>。然而,安德森明显已经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动员组织方式失去信心,“当前马克思主义必须寻找能够改变现存客体结构的有效策略的主体力量”<sup>④</sup>。

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的兴起,更让佩里·安德森对传统的工人运动失去了信心。他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当今的经济危机已经很难引发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主要原因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被彻底瓦解了。几乎在所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去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大量重工业劳动力转向了其他行业如服务业;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外包到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在各地区,这些劳动力还经历了明显的‘女性化’过程(feminization)——尤其大量女性涌入服务等行业,组成了劳动力中很重要的部分。值得指出的是,和20世纪女性主义(feminism)不同,她们并不是对政治权利有所诉求的一个群体,仅仅只是对全体劳动力比例起到了调整的作用。而这部分新的劳动力对于传

---

①[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统的、有组织的劳工斗争同样没有相关的记忆。”<sup>①</sup>

第五,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是共谋关系。在安德森看来,劳资关系界限的模糊化,导致整个世界由此浮现出一股强大的“泛资本主义”力量(pan-capitalism)。传统劳动力无论在数量、组织上都大幅减少,他们的斗争精神自然分崩离析。最让人焦虑的是,上至上层意识形态,下至理想主义的反叛力量,都没有提出替代性的方案。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人权组织、反贫困与无家可归者运动、反文化贫困运动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是真实的和受到欢迎的,并成为战后30年中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成分。但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运动,都是在有组织的阶级利益与制度之外开始的,可以与资本主义和谐共处的,他们不会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与资产阶级决裂。<sup>②</sup>

不过这并非是无意义的,安德森在《更新》一文中说道:“发达世界中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真实而受欢迎的,它是过去30年中这些社会中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sup>③</sup>它虽然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危机重重。“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念,即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概念,在这里终结了。”<sup>④</sup>

这些运动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给它们以特殊力量的东西,也使得它们拒绝成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社会改造的承担者。这些运动并没有反映一种新的集体身份认同……它们并不构成存在于资本主义秩序和对于和平与生存的威胁之间联系的基础。<sup>⑤</sup>就像马克思所说,真正的人类和社会良知只能从领导革命的先进阶级中寻找,因为在发动革命时“这个阶级与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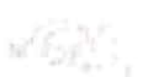
①王琛:《艰难时世:危机中生存的世界与中国——佩里·安德森访问记》,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的重建与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http://www.ptext.cn/home4.php?id=355。

③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2000(1), p. 16.

④[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66页。

⑤参见吴季:《书评〈新社会主义〉》(爱伦·伍德著),http://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n5。



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sup>①</sup>。

我们不难看出，安德森对作为人类解放运动之一的妇女解放、国际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关注，是与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分相呼应的。“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sup>②</sup>，而新社会运动是政治解放从宏观到微观的继续。通过对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的、普遍的微观权力的批判才能巩固“政治解放”的成果。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人类解放尚未开始，它必须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起点，论证人类解放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成为马克思政治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称为马克思全部政治思想的主体。这一人类解放目标，是一种超政治、超经济性质的目标。”<sup>③</sup>总之，安德森的思考启示我们，没有“人类解放”作为后援，“政治解放”就会失去它的彻底性，整个社会甚至很容易退回到“政治解放”前的状态中去。<sup>④</sup>

## 二、当代世界霸权的“三重”特征

安德森对霸权的关注，早在1976年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就开始了。后来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安德森也给予葛兰西特殊的关注，就他的霸权理论进行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使得“十月革命”的策略不可能行得通，因为他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高压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其治下民众的赞同程度来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

②〔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5页。

③郁建兴：《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④参见俞吾金：《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内在张力》，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页。

成的。确保赞同的控制机制,也不是由国家暴力机关来完成的,而是存在于遍布各处的文化机构网中,通过诸如学校、教堂、报刊、政党、协会等等来传播和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理念。它通过阶级结盟的方式结成不同的社会集团,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

不过,安德森认为葛兰西的论述主要针对的是一国之内的霸权情况。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带来了霸权的新结构,即从原来国内、国际霸权,扩张了超国家的第三霸权。安德森试图指出这三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在《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军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题为《霸权之后》的作品中的主题。在基欧汉看来,当代“大国之间对领导权的传统争夺方式正在消逝。在传统的斗争方式中,胜利者占据国际秩序的霸权巅峰,支配所有其他国家,决定全球体系的方向,比如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常常被认为是处于这个如日中天的位置……但这种意义上的霸权已经过时,在当代世界,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个争夺军事和领土优势的零和博弈,它们从根本上已经成为一个正和的经济交换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就关税和管制相互协商,以达成互惠的交易,这些交易时间长了,稳定下来,就成为他所说的‘国际政体’。这个政体是和平的和基于合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美国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交换和合作基础之上的新的多边秩序的合伙人之一,尽管是比较大的一个”<sup>①</sup>。在安德森看来,博比奥也持类似的主张,认为20世纪古典的国际关系确实是以战争为主的,战争是竞争性主权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状态。但随着国际联盟的来临,以及后来联合国的出现,契约社会开始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

与之不同的是,汪晖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主张:当代的世界秩序并非是个“合意”的平等交换体系,展现的恰恰是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一个可怕的霸权结构,这个结构结合了三个不同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或者层面:第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霸权,处于任何给定的社会之中;第二个是国际层面的霸权,处于国际体系之中;第三个是超国家层面的霸权,它穿越了国家的界限,涵盖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

问题的关键是,霸权和合意之间的差异何在?佩里·安德森先是考证了霸权这一概念在各种文化中的含义。在他看来,在西方世界,“霸权”这一术语最先来自古希腊,但是它的现代用法源于20世纪初沙皇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辩论,用来指称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的共同斗争中,能够和应当对其他社会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实施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获得,并非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目标的清晰、说服的技艺和组织的效能来赢得。列宁则将其与外在性的暴力统治结合起来对比分析,指出对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等敌人要专政,手段是强力(force)的统治。而霸权的对象则是工人阶级和联盟阶级,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通过矛盾性的合意(consent)而进行霸权统治,霸权的观念是革命斗争中合意维度的工具。

在安德森看来,列宁1917年通过这个划分,成功地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首先,对地主和资产阶级权力进行强力镇压。其次,通过“面包、土地、和平”将农民自愿地团结到自己的身边,召唤到革命的目标之下。可以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深受列宁影响,只是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领导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商业地主和产业资本家这两个在俄国被镇压的对象,现在形成了合意的联盟,共同镇压真正大众——农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达,不过手段不再是单一的强力,同时还包括合意。葛兰西因此将列宁用于同盟者之间关系的用法,扩展到了敌对阶级之间:统治者所配备的不仅是军事暴力的决定性权力,而且首先是获得被支配者对他们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将自身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内化到被统治者的内心和灵魂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早在1976年就写过一篇分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文章。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也就是国家本身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而不仅仅是暴力性的。他指出:“代议制国家的一

般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首要的意识形态核心。其特殊存在剥夺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交往方式和其他文化控制机制的社会主义理想,因而解决了核心的意识形态作用……议会制,作为每四年一届或五年一届的人民意志的统治表述,反映了国家回归人民的虚假的统一,好像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sup>①</sup>它的具体操作和手段是“使绝大多数人提升到一个既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这一水平或标准相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也相应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教育功能的学校和作为一种具有消极压制教育功能的法庭都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它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机器。”<sup>②</sup>与此同时,国家还对非国家的社会和私人领域进行监控和引导,就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波拿巴主义所分析的那样,“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sup>③</sup>;在此,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了当下很热的生命政治理论的端倪。

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经济系统以及复杂深厚的历史都会完全创造出一个只属于它自己的社会文化世界。但是葛兰西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缺乏对经济剥削问题的深入研究。安德森明确指出了葛兰西在这个方面的缺陷:“显然,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所遭受的整个经济剥削方式都无法归为压迫或同意——武力或文化说服的任何一种政治范畴。同样,无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一正式二分法作为初始工具多么必要,都无法产生出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同的制度,以及其与资本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认识。”<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在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的争论和交锋中,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

---

①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 28.

②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p. 32-34.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4页。

④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p. 25-26.



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这一事实总是被排除在他们所设想的各种公平、正义等原则和程序的政治或哲学议程之外。实际上，在安德森的权力视野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就是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所竭力掩盖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和基础。<sup>①</sup>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剥削之外的霸权结构的重要性，在安德森看来，“否认当代资产阶级权力体制中文化的‘优势’或主导作用就忽视了西方议会制与俄国绝对制之间的显著差异，并把西方议会制还原为一种神话……与此同时，忘记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中最终暴力的‘根本的’或规定性的作用就会回到改良主义，即选举的大多数能够通过议会制和平实现社会主义”<sup>②</sup>。强调霸权概念主要适用于西方，这是葛兰西的重大贡献。但却存在对葛兰西的种种误读，比如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成为霸权性的（这就是夺取权力自身的一个主要条件）；之后，当它实施和维持权力时，它就变成了统治性的并且继续是霸权性的。”<sup>③</sup>对葛兰西这句话的通常解释是，先要掌握文化霸权，然后才能夺取国家的政治统治权。这种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理解，就像科拉柯夫斯基所理解的那样：“无论如何，在葛兰西的学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工人们只有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sup>④</sup>然而在安德森看来，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动态结构关系，而不是普遍性的结论。因为葛兰西本人已经对此作出明确的说明，不能将市民社会和霸权理论放到任何地区和国家。因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

①乔瑞金、李瑞艳：《对安德森“类型学”权力思想的几点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 42.

③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100), p. 45.

④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家动荡时,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就显露出来了。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sup>①</sup>。当然,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的问题在于过于弱化了国家的作用,似乎其只是可有可无的表面现象。

除了葛兰西之外,安德森认为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 1938 年年底出版的《霸权:论居于领导地位国家之书》(*Die Hegemonie. Ein Buch von führenden Staaten*) 进一步深入探讨了霸权的概念并使之成熟化。特里佩尔将原本侧重于特定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关系的理论,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来处理。“居于领导地位国家”在古代用来指称城邦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城邦,在现代社会则主要指曾经称霸世界的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等霸权势力。特里佩尔虽然未受葛兰西影响,却完成了同葛兰西一样的重要知识创新。和葛兰西非常相似的是,特里佩尔强调任何霸权所涉及的主要是同盟关系内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在霸权关系中被统治者模仿学习霸主的现象。和强力不同,霸权是通过示范效应来完成统治的。

安德森认为,这构成了与施米特和葛兰西的双重差异。特里佩尔“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国家内群体或个人对于群体的关系,从而招致了卡尔·施米特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的话,施米特会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为施米特将霸权概念仅仅用于国际关系。但是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特里佩尔和葛兰西存在尖锐的分歧,对特里佩尔来说,霸权是一种权力,它处于支配(*domination*)和影响(*influence*)之间,霸权比影响更强,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对葛兰西来说,霸权相对于支配来说,是一种更强的和更稳定的权力形式”<sup>②</sup>。安德森借特里佩尔表达了葛兰西在国家间关系上过于唯心主义化的不满,因为就西方而言,国家间弱肉强食的状态作为一种威胁无处不在,用霍布斯的话说,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中止:“非常明显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国际关

<sup>①</sup>See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1976 (100), p. 10.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系中,强力总是压倒合意。”但霸权和支配之间的边界从根本上又是变动不居的。“对于任何霸权来说,总是存在向支配转变的诱惑或者倾向,将支配作为权力的最高形式。”当然,安德森承认在国内和国际霸权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国内问题不存在基于领土的主权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作为强制和合意必要的结合,总是很难同时获得。和国内领域相比,在国际领域,霸权即便在获得之后,也更为松散,更具有隐喻意义。<sup>①</sup> 所以葛兰西从国内阶级关系的视角认为霸权是更为稳定的权力关系也不无道理。

安德森认为中国古代拥有西方无出其右的霸权思想:对孟子来说,霸道不是通过合意的统治,而是通过暴力的统治,和通过仁义的统治有天壤之别。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荀子作了进一步划分:“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通俗来说,就是要称王天下的和别国争夺民众,要称霸诸侯的和别国争夺同盟国,只图逞强的和别国争夺土地。和别国争夺民众的可以使诸侯成为自己的臣子,和别国争夺同盟国的可以使诸侯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别国争夺土地的就会使诸侯成为自己的敌人。使诸侯臣服的能称王天下,同诸侯友好的能称霸诸侯,和诸侯为敌的就危险了。

安德森批评荀子仍然落在儒家的窠臼之中,因为他认为成王的前提是“修礼者王”,而“霸”只是“为政者强”,比“强”好不到哪里去,而“强”的赤裸裸的暴力则会自我毁灭。其王者的“修礼”是最高形式,霸道是中间的形式,暴力是最低形式的理论,和特里佩尔的强制的支配是最高形式,霸权是中间的形式,而影响是最低形式正好相反。安德森认为尽管从视野上来说,荀子通常更为现实一点,但从他的儒家前辈那里继承来的王者的理想形象,使他仍然无法和他的前辈决裂。而韩非子因综合了暴力和意识形态、强制和合意,成为一个单一的环环相扣的体系的“主道”观,即法律的物质权威——强制和灌输,而不是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 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礼的魔术般的效果,才获得臣民的服从的思想,使其成了安德森眼中古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安德森认为由毛泽东创建的传统中,霸权指向的并不是国家内的权力关系,而是指向国家间的关系,而国际关系正是合意要比强制更为脆弱的领域,霸道常常压倒王道。

但王霸之间往往不是分离和非此即彼的,而是相互支撑甚至是合为一体的。阿瑞吉这个安德森亦师亦友的左翼研究者,就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认为“支配应当被设想为首先依赖于强力,而霸权则是附加到支配性群体之上的额外权力,它的获取,有赖于一种能力——它安排各种问题,使得冲突在一个‘普遍的’层面上得以展开”<sup>①</sup>。即霸权的首要特征是“普遍性”,在国际关系领域“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其针对于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扩张,符合所有国家中的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因此形成了现代世界强权资本和领土扩张的双重逻辑:从结构上说,它带来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的新的结合。在企业层面,特别是全球跨国公司的维度上展开资本积累和剥削;在国家层面,继续进行领土扩张。两者彼此独立,却形成相互嵌入的动力机制。安德森对此深表赞同。

而汪晖的重要性则在于,在内格里和合特以及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世界市场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霸权:“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霸权还必须在国际市场领域中加以界定……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sup>②</sup>即汪晖认为消费主义是第三种霸权——全球资本——的关键。

但安德森指出,这个所谓的第三霸权,其“结构仍然是双重的。消

①[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费——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领域。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生产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枯燥无味的压迫’之中，资本主义的霸权才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闲中被重新生产出来。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压迫无情地迫使人们适应既有的社会关系，抑制他们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补充，正是这个双重的存在结构，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国家霸权结构”<sup>①</sup>。

此外，安德森认为“三重”霸权之间不是相互割裂和静止的关系，而是有机的动态综合体。他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案例，来讨论多重性的维度是如何被结合到一个事件之中的：“这个奖包括100万美元的现金和无数其他的公众宣传，它完全属于超国家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消费。在国家层面，这个奖项在这位现任领导人声誉开始衰落时，对其形象进行打磨抛光。在国际层面，它提醒世界，美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来操作的。”并讽刺性地指出：“一位领导侵占伊拉克的军队，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级，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总统因为其为人类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荣誉——真是具有21世纪特色的仁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评论基辛格获奖时指出，诺贝尔和平奖的真正名字是诺贝尔战争奖，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经用来描写他所属的征服世界的城市霸权的言辞，正可以用来讽刺性地描绘美国对其他世界的“正义性蹂躏”：“蹂躏，屠杀，篡夺，他们谎称为帝国；他们制造出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sup>②</sup>

---

①[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霸权之后？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海裔译，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 三、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霸权

美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宗教传统的国家,美国社会普遍的拜物性和显著的宗教性一直是令宗教学者颇感困惑的一大悖论。

一方面,美国是唯一在货币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的国家,它的国歌里祈求上帝保佑,它的历任总统总是一边阅读《圣经》,一边修改讲话稿,在就职时还要手按《圣经》起誓。上至总统,下至黎民都相信为神所召,负有神圣的使命: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彻底扫除反基督势力,并以被称作“十字军骑士”为荣。不只国会常常请牧师主持祷告,甚至军队里也有牧师、神甫,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座位上方镌刻着《圣经》十诫,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许多儿童每天早上在教室里背诵祖国是一个“上帝治下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的爱国宣言。美国政治学者赫茨克(Hertzke)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sup>①</sup>这些现象一直在挑战向来支配现代学术研究的所谓世俗化范式。<sup>②</sup>

另一方面,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认为这个看似宗教性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道教会与国家(机器)的分离之墙”。它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在欧洲理性思潮启蒙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深刻理解并接受《新约》中“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这一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是新教徒,也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然神论的信徒。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将美国人调侃为“操劳物质的理想主义者”<sup>③</sup>。复

<sup>①</sup>[美]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sup>②</sup>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sup>③</sup>[美]卢瑟·S.利德基:《美国性格探索》,载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5、28页。

且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教授将其总结为“一个国家，两种精神”<sup>①</sup>，或如丹尼尔·贝尔那样，直接称其为“精神分裂的民族”<sup>②</sup>。

我们在美国著名文学史家范·韦克·布鲁克斯那里找到了分裂论的经典表述：我们发现，美国精神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并行但很少汇合的主导潮流：一种是明流，另一种是暗流，两者都同样是非社会性的。一方面，超验主义的潮流起源于清教徒的虔诚，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产生了美国主要作家的那种过分讲究的雅致和超然态度，导致了大多数当代美国文化最终的非现实性；另一方面，一心赚钱的机会主义潮流则起源于清教徒生活的实践性反转，在富兰克林身上成为一种哲学，中经美国的幽默小说家，最终形成了我们当代商业社会中的氛围。<sup>③</sup>

上述将美国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置于对立面的看法，曾经是学界的主流。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漫长岁月中，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外交政策不应涉及宗教，此种忽视外交中的道德和文化因素的观念，显然受到世俗现实主义的影响，被批评为“启蒙主义偏见”<sup>④</sup>。这种“启蒙主义偏见”使得人们认为“美国宗教在最近数十年中事实上——尽管缓慢但却明白无误——已经衰退”，“悄然而至的世俗主义”（creeping secularism）是“当今美国生活的基本事实”，或者直接继承“上帝已死”的启蒙口号。<sup>⑤</sup>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受宗教信仰的激励和驱动，

①徐以骅：《美国宗教的“路线图”》，载《美国问题研究》，2004年，第377页。

②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参见徐以骅：《美国宗教的“路线图”》，载《美国问题研究》，2004年，第376页。

③Van Wyck Brooks, *America's Coming-of-Ag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1958; orig. ed., 1915, p. 5. Quoted from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 56. 译文参考张孟媛：《美国清教研究百年述评》，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

④Mark R. Amstutz, "Faith-Based NGOs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 U. S.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Elliott Abram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 175. 参见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⑤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4页。

但所推行的仍然主要是基于现实主义而非宗教理念的外交。托马斯·F. 法尔甚至愤愤然地把美国国务院描述成“美国最昭然若揭的世俗机构之一”。<sup>①</sup>

但相反的意见则认为美国的教会团体一直参与塑造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对外事务。神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总是紧密相连的。宗教对美国政治有无所不在的有形和无形的影响,甚至是美国的“国魂”。“宗教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从摇篮到坟墓伴随着人们;也就是说,它贯穿于人们的生命历程,并且还持续到生命结束之后。”<sup>②</sup>美国政府一直把宗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艾布拉姆斯主编的《信仰的影响:宗教团体与美国外交政策》<sup>③</sup>对此作出了经典描述。而美国总统也常口不离宗教,言必称上帝,甚至认为“现代福音主义文化”已是白宫决策的“支配性信条”。<sup>④</sup>

约翰·F. 威尔逊对这种认为任何一个因素似乎仅凭自身便可左右某一发展进程的思想展开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观念。宗教与其他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协力的状态。“把宗教世界理解为是与现世和日常世界截然分离的,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后果,就是假定特定行动、行为或思想所指涉的非圣即俗。这种非此即彼的公式(either/or formulations)……未把宗教理解为相互作用的诸多因素之一。”<sup>⑤</sup>结果是要么被贬低为无关紧要,要么被抬高为决定一切。

因此,更多的学者指出,如同美国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货币上一样,美国的新教理念完成了宗教的超验信仰与世俗的权力财富追求的完美统一。比如佩里·米勒便指出:“它(清教)

---

①转引自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12—13页。

②[美]约翰·F. 威尔逊:《当代美国的宗教》,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③Elliot Abrams(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④Jeffrey Hayne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the USA, India and Iran: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8(29), p. 150.

⑤[美]约翰·F. 威尔逊:《当代美国的宗教》,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在美国思想中的角色几乎一直都是主导性的,因为清教徒的后代们至少把先辈们的思维习惯贯彻到各式各样的追求之中,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范围之内并在许多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sup>①</sup>因为清教创造了美国文化所必需的一整套系统的概念综合,以致“不对清教作一些了解,就无法了解美国”<sup>②</sup>。怀特海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的“上帝不应被看成是对所有形而上学原则例外的……他是这些形而上学原则的主要例证”。上帝不过是现实因果链条的基本原则。换言之,这种信仰和理智不是分离和对抗的,而是相互补充,甚至是合一的。《宗教与安全:国际关系的新关联》<sup>③</sup>一书便认为“道德规则和现实政策”是相互支撑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强权和万能之主:关于美国、上帝与世界事务的反思》一书亦持类似的立场。

上帝和凯撒之间并不存在分明的界限,政教分离并没有否认政治王国中有一个宗教面向。奥巴马的讲话总是很自然地插入宗教内容:“今天同你们一道跪下祈祷;明天同你们站在一起。”<sup>④</sup>布什公开宣称上帝作为他生命的指北针,一直在他身边召唤他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这是一种命定……因此我要全然倚靠那位一直保护我、祝福我的上帝。”<sup>⑤</sup>确如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名言所说:“宗教是美国的灵魂。”法国政治学家阿里克希·托克维尔评价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sup>⑥</sup>

美国宗教与现实政治的纠缠和相互支持,还可以从最彻底的福音

---

①Perry Miller (ed.), *The American Puritans: Their Prose and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ix.

②Perry Miller & Thomas H. Johnson (eds.), *The Puritans*.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63, p. ix.

③Chris Seiple & Dennis R. Hoover (eds.), *Religion & Security: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Handbooks, 2012.

④参见奥巴马2011年1月12日为枪击案受害者所作的“疗伤”演讲。

⑤[美]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林淑贞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⑥[法]阿里克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8页。

派人士与现代科技之间的关系中看出些征兆来。他们往往通过掌握庞大的传媒和出版系统,并大量使用电子和电视平台来宣传其社会和道德主张,形成当代科技和古老宗教的奇妙结合。因此,这种公民宗教或文化宗教是有别于教会宗教或卢梭提倡的神权政治的,后者的特点是教条性、外在性和等级性,即人们不加论证地加以接受的某种信念。公民宗教的性质是公众性、内在性和平等性,如托克维尔所说:“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sup>①</sup>它是一种文化的、神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派的复合模式,从而可能超越宪法原则之“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之墙,巧妙地将“基督至上”、“上帝至上”与“美国至上”、“利益至上”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共同的精神因素,使得公民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政与教的独特纽带。它与基督教之间形成了形式上的政教分离与实际上的伙伴关系:一种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利益至上。它是雅努斯一头两面的完美结合,是看似相反的杰弗逊和艾森豪威尔的合体。前者的名言是:“邻居说有20个神或没有神对我而言都无伤大雅,我的口袋既没少了钱,我也没缺胳膊少腿。”后者的名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仰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至于是哪一种信念我倒不在乎。”

它否认教皇和神父代表上帝指点迷津的权威,秉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独自直面上帝和追求世俗幸福,不过只有经过一番巨大努力,在物质财富上取得成功的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才是广为推崇的最重要形式。它坚信“自我成就(self-made)”、充分的自由竞争、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life)、个人奋斗和个人开拓的进取精神。久而久之,自由竞争、锐意进取、积极行动、注重实效的勤劳致富观念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的天职观。“美国人不仅是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是把他们从信奉宗教当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放在现世。”<sup>②</sup>这被称

<sup>①</sup>[法]阿里克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27页。

<sup>②</sup>[法]阿里克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58页。





为千禧年主义的资本主义。托克维尔指称美国人是“虔诚的冒险者”，即“病态般的热衷于”积累财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也说过，美国人“总是用量化的办法解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确信更多就是更好。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美国精神其实是近似霍布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观的当代复活。同时集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大传统：新教的道德伦理、古典经济学法则以及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样说道：“只有牺牲长在它身边的早期蓓蕾，美国的漂亮玫瑰才能绽出它美丽的花朵，经济生活也是这个道理。这只是自然规律上帝法规的杰作。”<sup>①</sup>这种不设教会、不定教义、不拘形式、没有繁文缛节的宗教，被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称之为“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sup>②</sup>，即全体公民都共同奉行的一整套社会价值体系。

因此，主张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的实质是寻求经济权力的垄断和集中。就如施米特在其传世之作《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所分析的那样：基督教教义对自然权利和人神契约的宣扬，把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变成了“权利神授”，强化了市场经济以产权明晰、经济自由和平等交易等为内核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精髓；在市场交易之外，基督教塑造着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道德基础，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美好境界——道德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本质在于共产主义不只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其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否定被视为比法西斯主义还极端的思想。

具体而言，美国人在外交政策上坚信自己是上帝的恩宠者，“天定

---

①Mary B. Norton et al.,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2, p. 476. 译文参考王淑丽：《急变与渐进：19世纪晚期自由放任主义在美国由盛及衰的历史思考》，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②[美]罗伯特·贝拉：《美国的公民宗教》，陈勇译，载《原道》，2006年，第123页。

命运”(Manifest Destiny)地要行侠于世界,将自由之光和美式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如果一定要称此为霸权,其也是善意的霸权。这便是美国“公民宗教”的逻辑起点。早在建国伊始,美国国父之一潘恩就曾相信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认为“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因此,公民宗教只是“国家宗教”(national religion)的别名。<sup>①</sup>“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一般地说是助长了现代帝国主义,特殊地说则是助长了核威慑论。”<sup>②</sup>上帝是普遍的,却又总是只选一小部分人做选民。总之,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

对于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背后复杂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佩里·安德森 2015 年的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从“帝国”(imperium)和“幕僚”(consilium)的双重视角出发,根据时间、空间和政治脉络,全面梳理了美国的“帝国”外交政治及其所依靠的思想资源。美国不只具有举世无双的经济和地理优越性,还有极其独特的主观文化和政治精神追求,共同促使美国很快成长为世界级的霸主:两个大洋的保护,加上彻底摆脱欧洲封建桎梏的移民经济特征,使得美国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最纯粹的形式。同时,内嵌的新教伦理天职召唤的民族荣耀观,以及天赋人权的自由宪政共和观,共同为美国迅速的物质繁荣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从国家主义到帝国主义的无缝对接。

在安德森看来,就像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既极端神圣,又极端世俗的结合一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交织着理想的普遍主义和现实的例外论。一方面,“如果没有对超自然价值的信仰,美国将不再是美国”<sup>③</sup>。这种神圣感和普遍主义的精神要求将人类视作平等无差的存在,但美国的普遍主义精神又同时会转化为美国的特殊利益,比如书中

---

<sup>①</sup>除“公民宗教”和“国家宗教”外,还有“共和国宗教”、“民间宗教”、“大众宗教”、“市民宗教”等不同说法。

<sup>②</sup>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sup>③</sup>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36.



提到的斯蒂芬森在《命定论》<sup>①</sup>一书中的观点：17世纪以来美国人思想意识中的天定命运论使得美国人对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些人自由不离口，《圣经》举在手，心怀种族优越感。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他将美国之路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之路，要求美国商人把自由、正义的人性原则带到所到之处，帮助其他国家走上美国之路是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sup>②</sup>因为如果没有了上帝，他将像被遗弃在荒地的盲人一样失去方向。他说：“我确实信仰上帝，信仰上帝为伟大的美国奠基，因为他为每个人种下了自由的愿景。”

因此，美国将对他国的入侵视为执行上帝的责任和拯救世界。施特劳斯等更将美国的扩张视为“神恩钦准”的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是“替天行道”，“作为仁慈的霸权或慈父般的权威”来改变目前混乱、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盎格鲁-撒克逊强调种族的优越性，强调美国要肩负起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伟大使命。“肩负着拯救美洲大陆和世界的神圣职责”<sup>③</sup>的“昭昭天命”就此被用来为帝国的扩张行为作辩护。时至今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大抉择》一书中，仍坚信美国就是《圣经·马太福音》书中所预表的那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

政治平等主义这个高贵观念的背后是无痛帝国主义（painless imperialism）。因此，佩里·安德森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是多重性的交织。绝不像老欧洲那样，头脑简单地仅仅停留于领土和财富上，同时还是道德和政治的扩张，是文化攻势、经济压力、军事干涉、政治颠覆，甚至地毯式轰炸的有机结合。在威尔逊总统眼中，弥赛亚式的救世主、宗教、资本主义、民主、和平和美国的力量是同一回事。美国的原则是，美国的商业与自由、正义的人性原则是相通的，美国商业走到哪里，就要

---

①Anders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②Campaign Address in Jersey City, May 26, 1912,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24, Princeton, 1977, p. 443. Quoted from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18.

③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将美式信仰、自由和民主带到哪里。这也是为什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坚持美国的理想主义价值和美国的现实利益并不冲突的原因。

正如安德森在“幕僚”部分所分析的那样,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派的国际主义等各派思想家的表述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都在讨论美国领导权的核心价值:国家的特殊利益如何通过普世的话语来表达,即美国“例外论”与中国“特殊论”不同,前者是外向型的,通常是透过所谓普世主义或霸权主义来加以表达的,而后者是内敛型的。在安德森看来,美国有些幕僚“装”得过了头,过分强调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成分,从而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过度神秘化和理想化。实质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如斯派克曼所说:“权力之争就是生存之争。”<sup>①</sup>克里斯托弗·莱恩就在《和平的幻象》中认为:“仁慈的霸权就像独角兽,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动物。”<sup>②</sup>有的是罗斯福所代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威尔逊所代表的导修和宗教道德(preceptorial and religious moralism)的传统。<sup>③</sup>两者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相呼应的,既非远离,更非冲突,从而完成了高生产率与宗教信仰的完美结合。

一旦自由民主的精神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他们便会抛弃自由民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崇拜过墨索里尼,帮助佛朗哥上台,与贝当签订过协议。总之,“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sup>④</sup>,根据情况不同,可以使用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赤裸裸的强迫等手段。但即使是这个被认为最强调世俗权利而反对宗教权利的罗斯福总统,也曾在第四次就职演说中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万能上帝已经以多种方式保佑了我们的

---

①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pp. 18, 20. Quoted from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48.

②Christopher Layne, *Peace of Illusions*, p. 142. Quoted from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161.

③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123.

④玛雅:《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



国家,已经给我们的人民以炽热的心和强健的臂膀,使他们为自由和真理而斗争,已经给我们一种信仰,那就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成为人类的希望。”<sup>①</sup>

安德森也据此赞赏了福山的诚实转变。福山在其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试图让世人相信,美国不仅是自由而民主的“普遍而均质”国家的模型,而且是黑格尔“欲望背后的欲望”承认理论的典范:经济人总是被全然非经济的动机——为承认而斗争,这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所驱动。但在《十字路口的美国》<sup>②</sup>一书中,福山承认更高的生活水平也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安德森在书中先是评述了此书的结构与章法。福山主要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了当前新保守主义的源头:一群大多数是犹太人的纽约知识分子——这些人早年是社会主义者——在冷战时期先是团结在美国国旗下;随后当美国在越南打击共产主义之时,他们则坚定地站在了“新左派”(New Left)一边;没过多久,他们超出其自身领域而涉足社会议程:他们在由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主编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上逐步开展对福利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时,他们从身在芝加哥的列奥·施特劳斯那里汲取了哲学养分,并从阿兰·布鲁姆及其弟子们那儿获得了文化活力,从而在道德上对20世纪60年代的松垮态势提出反对。安德森认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混合体,即将小政府、宗教虔诚、美国民族主义信仰的最终汇合,正是这种汇合造就了一股支持里根总统崛起的政治潮流。但安德森认为,让人意外的是,福山一反常态,指出冷战的胜利使得美国有些冲昏头脑和忘乎所以,开始相信美国在其他地方也会以相当的速度将暴政推翻,把自由播撒。正是这种幻觉导致了伊拉克战争,但毫无必要地诉诸单边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增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反倒被大大地削弱,使得美国被世界舆论所孤立。

在书的余下部分,福山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对外政策,旨在使美国

---

①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1789 to Richard Milhous Nixon 1973*, p. 176.

②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恢复到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这种政策叫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 (realistic Wilsonianism)。只想简单鲁莽地打击对手是不行的,更要学会借助相应的机构、团结盟友,并且进行一套行之有效的理想包装。即保留新保守主义信条的精华部分,同时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其他各文化难以驾驭的性质和美国自身实力的限度,并将上述两者进行调和,从而把先发制人作为最后手段予以保留,把推广全球民主作为最终目标。充分与盟友们进行磋商,更多依靠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福山的结论是:“美国行使其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不是通过运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

安德森批评福山给人的感觉是反战的,或者说是同情左翼的,但实际上,他很早就倡导“一种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性相结合的里根主义政策”,用以“在海外推广政治和经济自由”,甚至力陈“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将萨达姆政权搞倒”的必要性。在安德森看来,福山所担忧的盟友离心离德大可不必。“因为激怒欧洲人的是美国对外交细节的漠不关心,另外就是可以接受的恶行未能对道貌岸然的德性表示足够的敬意。欧洲实际上一直依从于美国的意志但同时却遮遮掩掩,欧洲的精英和民众们对这种掩饰的面纱依依不舍,一旦某个政府抛弃了此面纱,他们便愤恨不已。因此,针对这种忸怩作态而非真情实意的鸣冤叫屈,只要美国重新保持礼节便可予以抚息。重归克林顿路线无疑将带来旧世界和新世界快速而深切的重新联合。”<sup>①</sup>安德森认为福山判定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处于丧失国际正当性的危险之中,并对此深表忧虑是大可不必或者说是极其虚伪的。因为,“真正威胁美国的不是欧盟的肯认和联合国的决议——美国从不缺这类橡皮图章——而是伊拉克的内部叛乱”<sup>②</sup>。

不过安德森认为福山的观点有一个迟来的洞见。即在苏东剧变之后,所谓“历史终结本身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高贵的张力的减弱,甚至可能带来一种无聊沉闷的状态。可以预见的是,人类将开始怀念充满

①[英]佩里·安德森:《内部人》,载《读书》,2006年第8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内部人》,载《读书》,2006年第8期。



危险的英雄时代”<sup>①</sup>。美国这个“普世同质化的国家”一旦失去敌人，便会失去自身的活力。福山的同路人施特劳斯深刻洞见到这一困境，因此他反对从黑格尔的自由平等观念中推论出的结果预示着一场夷平化的全球僭政，他希望通过信仰某种特定政体和自然等级制的方式来保持内部的永续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是历史的终结这个主张本身。

安德森认为，单边主义的背景是：一方面，由于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再被迫克制自我以服从美国的命令；但另一方面，苏联的消失也大大扩充了美国的全球势力范围。因此在客观上，美国的霸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已不再不可缺少，而在主观上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强权，也骤然变得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sup>②</sup> 福山对布什政府的批评仅在于，当局的中东政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采取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相结合来推进内部政权变更的方法是一回事，外部的军事打击引来的祸水是另一回事。在安德森看来，福山的立场其实不是僵化地主张战争或者非战争，而是利益。就如福山在大作的开头从给世界各民族带来民主福音的威尔逊寻求庇护，在结尾则引征懂得如何在胜利之时保持自制的俾斯麦为佐证，从而为其“使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的替代性方案”增色生辉。福山的理想不难想象，就是一位会拿“十四点”来进行配对的令人生畏的“铁血宰相”。从今天福山和其他许多人所开出的处方看来，美国不处在任何十字路口。它在其始终所在之处，即在博爱的理想主义话语与帝国的循环之间按照自身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的路口。<sup>③</sup>

就左翼思想家而言，安德森认为左翼不止喜欢对美国的帝国权力持批评立场，而且还一厢情愿地相信即使没有陷入致命危机，美国也已经衰落的判断。比如加布里尔·科尔克(Gabriel Kolko)等人都对美国的衰落直言不讳，指出“全球权力结构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是不可逆

①[英]佩里·安德森：《内部人》，载《读书》，2006年第8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内部人》，载《读书》，2006年第8期。

③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164.

转的(趋势)”。大卫·卡莱欧(David Calleo)在《超越美国霸权》中期待美国与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达成妥协。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反弹》对美国一意孤行的全球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生动地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险,揭示了美国的错误政策如何为未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安德森认可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反驳和判断:“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是衰落还是走向新的辉煌,选择权依然在美国人手中。就如迈克·曼德鲍姆所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取代我们的位置。”“中国正在变富,而且也将变强,在东亚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增强,但我认为中国不会这么快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强国,承担起美国一直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安德森看来,一方面,今日之美国已经并不断强化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欧洲和日本为两极的单一全球资本体系,形成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相互补充,通过债券和货币杠杆来控制外交的体系在可见的未来并不会走向终结。美国不但从中获益颇丰,还借日本牵动东南亚制衡和弱化中国。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核武器的日益多样化和精确化,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重新获得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可以在第一波打击中就有能力解除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击能力,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从而使得《核不扩散条约》成为一块极为重要的遮羞布。在此基础上,美国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便不再以他者为首要考虑的对象,而是自我内在导向的(inner-directed)<sup>①</sup>——就像杜鲁门在向日本投弹时说的那样:“感谢上帝让原子弹掌控在我们而非敌人的手中,感谢上帝指引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和它的目的使用它。”<sup>②</sup>这正应和了美国的价值观不过是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的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三者的叠加。

<sup>①</sup>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36.

<sup>②</sup>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2000, p. 23. Quoted from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5, p. 36.





和安德森的其他著作一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是一本值得仔细研读的著作。安德森是当代全球最伟大的左翼历史学家之一,对综合分析和把控庞杂的多语种历史文献具有非凡的能力。他的博学令人叹为观止,但该书并未包含所有的主题,很多学者期待他能再出续集,对后美国文化的未来作出精彩的预判。不过对以“理智的悲观主义和意志的乐观主义”为基调的安德森来说,结论似乎已经不得而知。

#### 四、中国崛起的道路与逻辑分析

在一篇名为《中国热》<sup>①</sup>的书评文章中,安德森继续了他在《绝对主义国家系谱》中对西方学者关于东方和中国的种种幻想的批判。即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热”和“恐华症”就在西方周期性地交替出现,而在新一轮大众与知识界的“中国风”之中,钟摆如今又从后者摆向了前者,这方面的著作有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以及阿瑞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等。但安德森认为对中国现代化的描述尚未出现可以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的研究相媲美的真正杰作,真正的邓小平并不是傅高义的邓小平,他更为激进,同时也更为传统。激进是因为邓小平急于让中国富起来,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资本的空间;传统是指他坚定地内继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传统。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也有颇多误读。雅克在该书中认为现代中国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人早在很久前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

皇帝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的商业社会。雅克的结论很鼓舞人心,中国当今的现代文明是内生性的,而不是学界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外生性的。与此相反,欧洲仅仅因为碰巧有充足的土地煤矿资源和无情殖民掠夺来的海外资源,才得以在19世纪超越中国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从整个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来看,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被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

在雅克看来,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影响力辐射区域也将从传统的东亚和东南亚升级到全球。中国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文字、古典医药等,及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都将成为世界时髦,正如当今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总之,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将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中国依托传统文化、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引领世界前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的依托于理性的霸权。

安德森在《两场革命》<sup>①</sup>一文中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分析的视角。它将中国的崛起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国悠久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包括广阔的疆域、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日益繁荣的城市网络和国内商贸的扩张、创纪录的人口增长等因素。在历史学视角下,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在遭受一百多年外国侵略和内部混乱的打击之后,回到她自己在世界上本来应有的全球中心的历史地位而已。佩里·安德森并不认可雅克的结论,在他看来,就中国的历史而言,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即使在18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

从逻辑上说,安德森认为雅克把中国崛起归为文化动力,而不是结构动力。东西方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即中国的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两场革命》,章永乐、叶蕊译,载《思想》杂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第188—189页。



独特性在于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不过安德森认为,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称霸全球就不可能。因为文化的独特性很难变成普遍性的存在转移到其他地方。不管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都充分讨论到了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性 or 独特性的首要特点是不可通约性,从而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中国人一直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因此雅克因为过于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从而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提出任何新东西,包括中国现代性的真正独特之所在。

在安德森看来,中国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军事大国,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的崛起主要依靠的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传统资源,而是由中国革命所确立的基础性条件: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包括: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支受过一定教育、有纪律约束的劳动大军,以及改革开放后,在容忍一定程度的省级自主性制度框架下所建立的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等。

安德森并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性,他认为不能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恰恰要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中国的快速发展,即一个强大而自主的主权国家是中国革命为中国崛起所提供的非常重要、关键性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与中国崛起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前者为后者准备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sup>①</sup> 中国胜于苏联和俄罗斯之处,并不是吴玉山等人认为的那样,是从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一点开始的。<sup>②</sup>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补上资本主义的课。两者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可以是互补的关系。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必须“补资本主义的

①[英]佩里·安德森:《两场革命》,章永乐、叶蕙译,载《思想》杂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第152—156页。

②吴玉山:《〈两场革命〉与中国模式》,载《思想》杂志,第18期《中国:革命到崛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第202页。

课”，因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sup>①</sup>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应该理解为我们在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但在生产的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没有真正达到《资本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高度。这也注定了我们长时期内政治的先进性和生产的落后性并存的境况。革命成功后的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因此，中国的改革本身也是先前革命的继续：改革与革命不是断裂的。

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改革开放是中国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的综合体，或者说是变体：它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党国家。而非吴玉山认为的，经过改革之后，支撑中国崛起的制度框架是由后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混合而成的一种组合结构，即所谓既保持活力，持续创造经济奇迹，又能维持政治稳定的“后极权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其实，安德森所说的双重性，或者说邓小平的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双重历史任务的部分微调。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sup>②</sup>。前一个是主权革命，后一个是社会革命。不过，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革命可以是疾风暴雨式的，而社会革命，特别是经济发展，却是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政党—国家体系是一个内外双层结构，内层核心结构由政党、军队和国家三者构成。政党通过对军队及国家的制度安排，确保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和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外层结构则涉及政党—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把以单纯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替代市场的计划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国家吞噬所有民间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整合为一体的总体性社会的内层结构，转变为促进竞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页。

争、增进活力的市场导向空间的外层结构,而这一转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内层结构的稳定性。<sup>①</sup> 吴玉山关于“安德森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现中国崛起的根源,恐怕是找错了方向”的断言可能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完全割断中国崛起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性,这不仅与历史事实相背离,而且在理论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国家替代市场的计划经济以及国家吞噬社会的全能主义等制度安排恰好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崛起的关键元素,改革正是针对这些政党—国家体系中的“负面元素”(或者意志主义的超前性)。<sup>②</sup>

对于当代中国崛起的模式,西方媒体的观点通常是国强必霸,而国内媒体的观点认为国强并不必霸,中国走的是无论国家大小、强弱的“国家间的民主”之路。在安德森看来,一方面,从国际上说,中国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汉主义也仍有市场:“现代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至少是东南亚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不一定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中国确实不会像美国那样统治世界,但未来一方面是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在安德森看来,阿瑞吉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20世纪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金融扩张周期兴起,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但阿瑞吉认为金融霸权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不过,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的同时衰落,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着压倒性的全球优势,但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因此出现了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相分离的现象。随着美国霸权的凋零,将出

①参见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

②参见肖滨:《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兼对安德森与吴玉山之争的回应》,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现体系性的混乱。而这个混乱的结果是中国承担起新的世界历史的重任。阿瑞吉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她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曾经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将被甩在身后，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安德森批评了阿瑞吉的单一霸权逻辑，即认为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阿瑞吉的叙事中，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最后是美国霸权，每个都是排他性的。然而，从历史来看，正如美国保守派大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样，比如在19世纪打败拿破仑的英国并不是单独对欧洲大陆实施霸权的，而是和沙皇俄国分享了霸权。冷战时期更是毫无争议的双头霸权。阿瑞吉的理论从来没有思考过双头霸权或多极世界的可能性。今天的中国不是取代美国的单一霸权的未来霸主，而是制衡美国霸权的世界一极。世界由单一霸权统治20年之后，逐渐进入了多极的世界治理模式。

## 第四章

### 安德森的文化诊断与社会分析思想

---

#### 一、文化与文明的当代内涵

安德森在《文明的内涵》一文中认为,虽然“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完善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对冷战后的世界仍然是极为有力的阐释框架,但它全然忽视了随历史进程而变化的文化差异”<sup>①</sup>。安德森并不认为存在纯粹的市场,因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总是需要相应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的,生产也一定需要消费的辅助才能完成。而古典经济学既不考虑人的主观态度,也不考虑客观的文化范式和习俗礼制。

通过语义考证,安德森认为“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相互关联却从来不是完全等值的。这两个词从拉丁语语源上有明显区别。“文化”来自乡间,起源于农民的世界,它的本意是指培植耕作自然作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65页。

物,这一含义至今尚有残留;而“文明”一词则起源于城市,来自公民的都市世界。后者的现代用法可以溯源到启蒙运动,它是启蒙运动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前者用来指主观心理状态的现代用法的起源要稍晚一点,应追溯到原型浪漫主义或有时所称的反启蒙主义文献。<sup>①</sup>对此展开过权威论述的著作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

这本书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月,作者亲眼目睹了现代战争对生命的戕害,现代文明对多样性的蚕食。他渴望回到让人无限怀念的农耕文化,以抵制启蒙以来的机器文明。因为原来的农耕文化是多样而丰富的:“我看到的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唯一的线性历史,而是若干伟大的文化所上演的历史戏剧,每一种文化都带着原始的力量从本土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终其一生牢牢地固守于此。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形象里打上自己的资源(即人民)的烙印,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理念、激情、生活、意愿、感受以及死亡。这些真切的色彩、光线、运动是理智的目光仍未发现的。这些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和景观就像橡树和石松及其花朵和枝叶一样繁盛、衰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它们产生、成熟、衰落,然后一去不返。这些文化——纯化的生活精髓——像田野中的花一样无目的地生长。它们如同植物和动物,属于歌德的生机勃勃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那个死气沉沉的自然。”<sup>②</sup>

在这一体系之中,“欧洲文化在与之相对的其他文化面前没有任何优越地位可言。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它们各自都是动态存在的世界,从分量上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同西方文化是一样的”。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导致文化这些奇妙的盛衰交替的有机形式走向灭亡,它是最为外在和非自然的状态,因此是一个终结,是紧跟在生命之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硬,是取代了大地母亲的理智时代和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呆板的城市。与此同时,斯宾格勒悲观地认为,它们是不可更改的终结:由活生

①[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38页。

②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38页。



生的文化走向垂死的文明。<sup>①</sup>

这种文明特有的三重特征是扩张主义(expansionism)、工业化和拜金主义。扩张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帝国主义这种形式中。工业化也一样,在经历了辉煌的开端后,业已成为一种灾难,“机器工业的经济强迫工人服从,它对企业家的力量也毫不逊色。双方都变成了奴隶,谁也不是机器的主人,它正第一次积聚起自己神秘的力量……西方的工业改变了其他文化传统的走向。经济生活的潮流冲向煤炭王座和各种原生资源的广大产地。自然日益枯竭。地球为浮士德式的思维作出了牺牲”<sup>②</sup>。“金钱对这种智慧的力量猛攻也是力大无比。工业像乡民一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它有它固定的场所,和从大地涌出的原料。只有高高在上的金融活动是全然自由的、无从捉摸的。1979年以来,银行和交易所已经从空前增长的工业的信用需求中发展成一种力量,并且它们将成为唯一的力量。”三重特征的结果不是和平,而是战争,“金钱已走到了成功的尽头,最后的冲突——金钱和鲜血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此冲突中,文明将确立其最终的形式”。安德森认为斯宾格勒的著作实际上第一次对法西斯主义的到来进行了清醒的预言。但人们没有选择做这或做那的自由,只有做必需的事或什么也不做的自由,即战争与毁灭。

在回顾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之后,安德森认为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斯宾格勒借以构想其体系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理智世界中。苏东剧变以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几乎排除了向非资本主义之外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因为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至少表面上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巅峰的西方能够在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下处理这个星球上发生的一切事务,他坦率指出:“‘世界统一体’这个词本身已经变为一个委婉的集体名词,它赋予反映美国和西方势力利益的行为以全球合法性。”一切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都正面临着灾难性的处境。

①[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38页。

②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38页。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资本主义遍布全球之后,经济的一体化并不代表文化的一体化。“冲突主要不再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人类之间的最大的分界线和冲突的首要原因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不仅是信仰体系,而且是权力体系。<sup>①</sup>“历史没有终结。世界不是一体。文明结合和分割人类……信仰与家庭、鲜血与信念,人们赖以相互认同,人们也将为之战斗和死亡。”但亨廷顿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真正认识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教价值,而其他文明却努力抵抗它们的传播。

在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的文化或文明观指的是跨国家和跨地区不变的信仰体系,但福山的《信任》一书却指出了另一套逻辑:国内性和可变性,虽然“从现在起文化的差异将日益突出,所有的社会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都将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但文化差异带来的不是战争与冲突,因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已转移到经济的和平竞争领域。在此,为一个国家(而不是地区或更大范围)所特有的、被视为内在的伦理习惯的文化成为关键所在。因为,正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决定了其工业化组织的模式和在经济交往中显示出来的信任水平——福山称之为“社会资本”;而这些又转而决定社会的总体效率和竞争能力。文化可以分为两类,在一类中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居支配地位,需要非人际化的信任为主要模式;另一类则显露出家庭小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较低层次的结合,信任度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每个国家特有文化遗产各自有利或不利于自然形成的社会性。福山最后引述同为长老会教徒的世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内尔(Wiliam McNiel)的论述写道:“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厌恶某一特定的宗教形式,尤其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相信自身更甚于信仰教义。但是他们需要从促进美国社会交往的手段的方面来考虑宗教的社会后果。”<sup>②</sup>文化在福山这里主要指一整套对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的组织方式和交往方式。福山借此批评

①[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40页。

②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载《读书》,1997年第11期,第42页。



了自由的个人主义,因为它对“权利的日益加深的迷信”,腐蚀和瓦解了家庭、邻里关系和政治秩序中的信任,同时还带来了诸如犯罪、吸毒和颓废等社会问题。

在安德森看来,文化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在各个不同思想家那里的滑动和差异,显示了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诉求,就像“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曾被用来指18世纪新商业经济的来临,它被黑格尔用来包容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体系”及其规范它的体制;这个概念传到马克思手中时成为私人财产和阶级不平等的竞技场;20世纪早期,葛兰西使词意再度发生转折,更多地不是用于标示市场的经济空间,而是标示意识形态空间。而50年之后,它的涵义再次倒转。东欧和苏联集团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处于对立位置的知识分子——有些一度是马克思主义者——操起市民社会的口号,把它作为抵抗现存政体的旗帜,用所有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独立于共产主义政体的力量——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来界定它,以此削弱这一政体的根基。于是,一度指明剥削和虚幻领域的批判性概念,如今变为肯定性的原则,标示着真实性和自由的空间。在新的用法中,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目标,而不是魔鬼。

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在《自由的状况——市民社会及其敌人们》中更是明确指认,基于“本质上保守的、整体论的、传统的”文化并不是低效率的代名词,因此“不论我们是否喜欢,那个为低效经济带来死讯的要命的天使也并不总是为自由服务的”。换言之,礼俗社区(Gemeinschaft)与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并非同质的历时的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时的互补关系。或者反过来说,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安德森总结说,至此就至少有三种文化观:文明认同、经济效率、市民社会。而认识不到文化差异的新古典经济学,比如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会让所有的社会或早或晚都达到一个共同而普遍的标准,即所有的竞争都是成本竞争,而与文化无关。而美国战略思想家爱德华·路特瓦克(Edward Luttwak)认为由于当今国家间的竞争要求国家寻求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缘经济学”以便把竞争优势扩大的最大

限度,如果必要的话就要采用补贴和保护的方法。不过,他认为即使在经济零增长的时候,结构性变迁也非常迅速,碾压着芸芸众生和人际关系。这种涡轮式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法西斯偏见。右翼关于资本主义是平和和稳定的秩序的观念,被右翼自身否定了。

与右翼中中间派的文明认同、经济效率、市民社会的文化观不同,左翼的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认为文化既不是区分多种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识别生产效率的分类编码,而是一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经济自身一同不断扩张,并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换句话说,文化现象并不与全球化现象相对立,而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受到多种文化动因的制约,不如说是被某种决定了生产和消费方向的单一文化因素所左右。这种所谓有单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sup>①</sup> 换言之,被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非文化的地方,被詹明信诊断为文化的本质所在。安德森认为它提供的认识当代世界的框架,是这样令人难忘地——既充满诗意义讽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质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们最深层最鲜活的生活经验。<sup>②</sup>

德布雷说,在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社会里,尤其是现代的到来,激发了以古代作为补偿的现象的爆发。各民族首先想到的是以民族文化的新形式求得自我恢复。这些新形式因环绕它们的全球商品交易关系而显得愈发珍贵。共同体愈现代化,就愈想有意识地以创造性的方式使自己与众不同。资本主义与民族政权或多或少地属于同时代的产物:按福山的说法,当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苏联都被资本主义打败之后,就只有没有特殊的社会内容或普遍主张的民族主义,以及在第三世界落后地区局限于某些宗教社团的原教旨主义的局部残余了。在工业化世界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会继续。但主要会是在共同市场已经提供了的合作框架之中所产生的经济方面的竞争。民族紧张和恐

<sup>①</sup>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66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续完》,载《读书》,1997年第12期,第67页。



怖活动并不会危及这个时代的深层结构。即现代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可以替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框架选择。

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区性的。即使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性价值，也越来越被工具化了。比如，另一个政治理论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了所谓的“柔性权力”。他说，刚性权力是钢铁、武器、军队等物质上的东西，而柔性权力是“一揽子计划”，包括流行音乐、美国职业篮球、人权等，总之就是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

不过，安德森忽略了左翼中齐泽克的思路。齐泽克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中，认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的层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文明形态，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者佛教，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 without meaning)这个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the global market mechanism)”<sup>①</sup>。

齐泽克在书中还将其与马尔库塞对这种去文化和崇高化的“文明”机制诊断——“压抑性的俗化”等同起来，这种独特的动力机制其实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欲望背后的欲望，它就是欲望本身，生活于其中的人是一种“天然的野兽”，即处于零层面(zero level)的资本主义主体。它是一种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对它的抗议也往往是“零层面”的暴力与恐怖。这种零度文明的实施是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的，在这样的霸权中，人们有一切破坏、怀疑和疏远自己的自由，而唯一的限度是资本与货币。就如切斯特顿所言，这种自由是永远不会使自己获得自由的自由。对这种自由最经典的表述，见于康德的《何谓启蒙？》一文。康德说：“你喜欢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你喜欢怎么自由地思考就怎么

<sup>①</sup>[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页。

自由地思考,但要服从!”即思想自由不仅不会动摇现在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半根毫毛,还会为这种制度添砖加瓦;只有通过思想自由与多元文化主义,才能真正维护资本主义冷冰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对自由的追求,是以无可置疑的教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条件的。而这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在“被控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主观自由(subjective freedom)的体验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屈从于规训的机制。它通过将人们设置为能动的、自我设定的主体而遮蔽它的被动性,自由的主体总是被迫忘记这一压抑。

其实,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已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预言。马克思明确指出,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sup>①</sup>。“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②</sup>

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后来所总结的“大地毁灭”和“诸神逃逸”。抵抗的出路:要么是大肆鼓吹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封闭民族国家主义,不过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资本的到来将对传统社会实行全面的改造,资本将突破地方性和民族的狭隘眼界,创造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体系,因此闭关自守注定是死胡同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条。要么是强调灵活多样化的策略。它不再是或者我们,或者他们的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它强调灵活性的矛盾共存:一方面,它反对任何文化保守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拒绝;另一方面,一旦接受它为前提,它就呼吁保护特定的文化、种族身份。安德森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全球化所带来新民族主义在安德森看来仍然包含了两种积极的因素:它的特征是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它是一种非殖民化和国家解放运动之后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识。一是高雅艺术和思想集合的文化,以及被理解为日常生活风俗、实际上的生活习惯以及同一社会的惯例的文化,即是审美和人类学两个维度的结合。这种新民族主义与传统马克思所认知的阶级主义的文化不同,它体现着特定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经验,即并非只是某个阶级独有的经验,而是阶级融合的、互动的经验。安德森最后借此提出了自己的乌托邦文化文明观:不再简单地划分西方还是东方、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我们应该回归启蒙的原初用法,真正的文化与文明包括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两个方面的人性化社会,它的反义词是蒙昧。就像卢森堡关于何为社会主义——它并非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反蒙昧一样。今天最理想的文化与文明并非民族化的资本主义或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而是包含着差异和平等的新领域。

这种差异和平等的新领域是什么?我们或许在他分析伯林思想的文章《以赛亚·伯林》中找到一丝线索。康德曾经颂扬人的竞争驱动力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即人类为争夺名利、财富和权力竞争,也正是这种竞争推动着文明的进程,最终达到社会的进步。最完美的文明就是保障全体成员自由的、以法律为准绳的文明社会。而实现国家内部团结的最大障碍来自“人类是需要主人的动物”,并坚持认为这种人性的扭曲在总体上不可挽救。

对于伯林来说,人性合理的追求确实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并不允许群体混合物的存在。他强调生活的种种目标是不可调和的,也是无法衡量的。不同的事物是相互矛盾的,而相互矛盾的事物是毫不相关的。多元论成了存在于社会外部而非社会内部的个人主义。多样性原本是文化多元论的存在依据,同时它也说明了文化多元论的不可测性。

怎样才能评定一种生活模式不同于另一种生活模式呢？多元论的结果是滑向相对主义伦理学。各种各样的文化塑造了有着不同需求、不同个性的社会成员，结果人类没有任何统一的道德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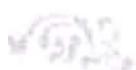
伯林认为：不管文化形式如何不同，也不论它们之间怎么水火不相容，“追求文化多元化是人的本性，如果他被称为人的话”<sup>①</sup>。这是为防止多元论的自由主义演变成相对论的虚无主义。他指责孟德斯鸠一方面表明人类法律道德观随着物质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绝对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司法是存在的。伯林评论说，“两种学说间的唯一联系是对自由的共同追求”<sup>②</sup>。安德森认为伯林的根本特点是捍卫文化多元论而不放弃道德一体化。一体化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对交往的渴求”，谁拒绝人际交往，谁就不属于人类。但安德森批评伯林混淆了共享和理解的差异。伯林认为“人性价值观的核心部分是那些人类共有的”。但这个共有却逐渐被他从世界缩小为绝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并再次缩小为西方欧洲国家，实际上是五个国家所共有的。实际上，当“我说‘我们的行为’规范时，我指的是西方人的习惯和世界观”。

关于多元和一元之间的关系，安德森认为，以前有人攻击多元论，往往认为人类受唯一的最终目标——利益所驱使，多元论实际上是更为隐蔽的一元主义。安德森认为虽然这种指控站不住脚，但却是多元论作为一种价值观处处遭人攻击的一种表现。他认为这种指责过于简单化，因为多数文化多元论者并非没有思考过多与一的关系。比如对维科来说，文化多样性是心灵内在统一的表现。不管局部地区的风俗如何多样化，上帝制定了全世界民族在宗教、婚姻和丧事方面的共同原则。虽然“这些共同的思想产生于彼此陌生的民族之间，但它必定有个共同的理性基础”。而对郝德来说，文化多元论是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维科攻击康德“人是需要主人的动物”的理论，且说

①[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需要主人的是动物”，反对康德把黑人视作劣等人，而把欧洲人视为上等人，并且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使其自身平衡的完美，而这种完美是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sup>①</sup>。多样的风俗和语言，只能因相互理解和情谊而联结在一起，构成多样性的和谐。维科沉迷于民族文化研究而烦于政治制度的探索，未能认识到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恰恰是对多样性文化的象征性补偿。没有中央集权的多样性只会是残酷、不幸和凄惨的。沃尔泽从社会分工的视角讨论了文化的多元与和谐共存，文化多元就像社会分工一样，是互补的。安德森从分工的视角，认为文化多元论与分工密切相关。在安德森看来，理论上个体生活是千差万别的价值观的体现；然而，实际上每种价值观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的共同性原本应该是相同和相异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每种民族主义都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但不能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过于强调这种文化差异。文化价值观和民族差异是多样而矛盾的，然而最终却具有一个散漫的向心结构，即具有共性。但安德森哀叹：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大胆的理想、高尚的牺牲和英雄的斗争，都会在财物和选举的单调乏味中成为过去；艺术与哲学将凋谢，文化被浓缩为仅仅只是对过去的治疗；技术计算取代了道德或政治想象。夜晚的猫头鹰的叫声是哀伤的。

具体说来，“原本通俗文化和先锋文化的彼此渗透，摆脱了‘雅’和‘俗’的分野和束缚，释放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可不幸的是，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组合的味道变了。通俗文化被资本制度收编，失去了当初使一群狂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生命冲动和原创能力，变成了纯粹的商业文化，成了娱乐产业的囚徒”。具体而言，好莱坞正是媚俗的源头，既要拍巨片赚大钱，又要显得高深莫测，结果是天真时代结束了，好莱坞堕落了，媚俗时代来了。“斯皮尔伯格的所有电影，看上去都似乎有什么发人深省的含义，结果什么都没有，不过是些概念化简单化的东西。贝特鲁奇则是一到好莱坞就变得媚俗了。媚俗统治了美国电影，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

乃至美国文化,又随美国的全球化蔓延到整个世界。”精神世界越来越趋于婴儿化。《星球大战》、《指环王》就是例子,《泰坦尼克号》则是超级媚俗。“人类需要想象,电影给人提供的就是想象。可媚俗的文化把人当成傻瓜,继而造就傻瓜。人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公共生活质量就此被商业文化限制住了。”<sup>①</sup>

## 二、后现代主义的起源与特征

在北美世界,“后现代”一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左派知识分子当成“不够现代”的贬义词使用,他们认为后现代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理想毁灭的时代。比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宣称,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已经死亡。当然他首先要证实的是经典社会主义的死讯……那么,怎么看待资本主义呢?在利奥塔写作《后现代状况》之际,正值卡特时代的尾声,当时西方正进入严重的衰退时期,意识形态情绪还没有到喧嚣直上的程度。因此,他可以带着一副貌似合理的样子指出,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仅是一种述行(performance)原则,述行原则只是真实合法化的影子”<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不同于利奥塔,哈贝马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与市场发展对日常生活的殖民状况,但他的做法是想通过重建现代性的方法来确保日常生活的自由状态,并由此进一步影响政府的决策与社会的发展。在安德森看来,这是一种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或者为实际利益彰目的做法,不通过触动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而想通过文化领域的改造来完成社会变革的方法完全是“不合时宜”的。<sup>③</sup>

①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载《读书》,2005年第6期。

②[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③杨生平:《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安德森认为詹明信才真正为后现代主义的定性作出了巨大贡献。詹明信不仅仅把后现代主义现象当成一种文化思潮，更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角度去揭示它的实质。他认为，詹明信通过五个步骤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其一，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固定在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秩序的客观变化中，认为后现代性不仅仅是美学断裂或认识论转移，而是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发展新阶段的文化标志；其二，詹明信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来探索由此引起的主体重大心理变化；其三，詹明信通过实证考察具体分析了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与相关的主要话语领域艺术风格或知识形态的变化；其四，探索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地缘政治模式，进一步探寻后现代主义产生与发展的阶级原因与国际背景；其五，对后现代主义现象与后现代主义观念进行的不是单纯道德谴责与文化批评，而是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中肯评价。<sup>①</sup>

对詹明信这种高屋建瓴、既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总体把握又对它有分层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安德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方面，詹明信坚持“对后现代主义的真正批判不可能是意识形态上拒斥。相反，辩证的任务要求我们透彻地研究它，这样一来，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将呈现另一番面貌。对新的无限制的资本主义的全面理解，一种足以阐释其在全球范围内联系与分离的理论，依然是无法摒弃的马克思主义规划。它排除对后现代二元论的回应。对于他是搞调和的左派批评家的怀疑，詹明信泰然处之。应对这种无序状态的集体能动性仍然缺少；但它出现的条件是从内部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把握的能力”<sup>②</sup>。另一方面，詹明信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维度与经济学维度的分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詹明信的著作在这些一脉相承的思想家的美学探索中，整合了一套衍生于

<sup>①</sup>杨生平：《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8—69页。

《资本论》的经济学范畴,从而开始引导研究的焦点和方向,反响积极,富有创造性。<sup>①</sup>可以说,詹明信在政治上仍然是绝望的,但在对现实的把握上,他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更加深入。

安德森认为,要弄清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实质,就必须弄清其对立面——现代主义的思想实质以及它们各自产生的社会条件。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是产生于半工业性质的经济和社会,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已经获得统治地位,实现了工业统治农业、城市统治农村的现代转型,但在政治领域的统治阶级主要还是农业地主或贵族;现代工业文明在生产领域已经产生了重大的科技发明,现代主义是“没落贵族”对现代技术文明的抵抗和反对。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众多的贵族和地主持身一变,成为现代资本家。但在生产的领域,工业文明开始向后工业文明发展,后现代主义开始全面代替现代主义,成为新的组织力量,或者说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被吸收进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但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日益被吸纳到整个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的同时,也是新的抵抗力量的来源。

具体说来,首先,统治秩序自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并以此维护社会秩序。在此,他借用了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加以证明:“熊彼特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道德的经济制度,驱动它的是追求利润、化解通向市场算计的一切障碍的驱动,它主要依靠前资本主义的——实质是贵族的——价值观和风尚,以便维系自己作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存在。”<sup>②</sup>在安德森看来,现代主义价值观恰恰能维持这种道德并得到社会两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认可。“现代主义可以诉诸其他两个价值世界,两者对市场的商业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家庭崇拜都持有敌视态度,如果从对立的立场出发的话。传统的贵族秩序提供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133页。

<sup>②</sup>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8—89页。

了一套理想,可用来衡量利润和假道学的要求,这些理想蔑视庸俗的精打细算和狭隘的抑制。新兴的劳工运动体现了另一类理想,它同样敌视物神和商品的统治,但它是在剥削中寻找自己的基础,在平均主义的将来而不是等级森严的过去寻找解决方案……现代主义艺术实际投入或假想投入的两个主要地带却是:有头衔的有闲阶级所在的上层社会环境和体力劳动者所在的地位低下的底层社会。”<sup>①</sup>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重组和新的阶级分层,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已成为过去。取代坚固的竞技场的是浮动式的水族馆——当代资本的规划人和经理,审查者和看护者,提供者和投机者;不知社会固定性或稳定属性为何物的金融世界在发挥作用”<sup>②</sup>。另外,工人阶级也出现了明显的“资产阶级化”的趋势。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是,现代主义及其维护的反商品化的道德渐渐失效,有产阶级普遍道德堕落。“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道德规范一旦完结,就好像扩音器突然被关掉一样……后现代主义是在敌手已消失、未取得任何胜利的情况下产生的。”<sup>③</sup>

其次,科技价值发生了变化。安德森认为,单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重要科技发明——彩色电视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彩色电视在以它生动的形象深深吸引人们听觉与视觉的同时,还传递着来自世界各方的信息,它承担着将时间“空间化”的职能。一时间,世界仿佛凝固,人们可以将发生于现在甚至过去与将来的事情一览于“当下”。这种感觉的出现一开始就挑战以“时间”为向度的现代主义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安德森看来,电视传输着“如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图像”,其数量之大是任何艺术无法匹敌的,而它们又传送着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话语。由此,他说:“作为信念而不是艺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氛围从这个领域的压力中吸收了它的许

---

①[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10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0—91页。

多冲动力。因为后现代主义也是先进技术与大众想象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sup>①</sup>

再次,时代政治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两个条件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西方社会背景的话,那么,在安德森看来,接下来的这个条件就是后现代主义得以盛行与广泛传播的国际背景。按照他的看法,诸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政治斗争、赫鲁晓夫的改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意大利的“炎热之秋”以及拉美的游击战争等左翼运动的失败,以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等右翼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横行则从根本上破灭了现代主义的“普遍期待”,即传统的现代主义政治梦想破灭了。“资本的全面胜利……其深层意义在于取消了政治选择……探索其他社会制度的可能性是现代主义一个基本视阈。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了,后现代主义之类的事物便取而代之。”<sup>②</sup>

上述背景使得现代主义发生了分化:“一个方向是渴望重新评估现代主义传统,重新整合它的成分,以矫正新的后现代视觉文化,另一个方向是奋力全身心扑入名流、商业主义、轰动刺激这个具有诱惑性的新世界……与万事万物一样,哪一条几乎都不怀疑自己能承担更多的运载量。”<sup>③</sup>对于后者来说,市场创造的供应规模之大是任何抵制市场的实践都无法控制的,并且“这奇观就是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之着迷的事物”<sup>④</sup>。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深刻说明了“后现代的信念受制于它与市场所规定的套路之间直接的密切关系”。

安德森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实际上在用两套矛盾的方法维护其社会系统:一方面在经济上借助于后现代主义思维,强调求新、求变;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避开后现代主义思维,仍然利用宏大叙事为其永恒存

①[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在进行合理性辩护。在他看来,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把后现代主义推崇的不断变化的力量引向经济,那么,为何不能把这种力量引向政治?一旦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只重视经济上的变化而强调政治上稳定这种内在矛盾也就暴露无遗。不过,他认为,若要真正揭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需要有能够跳出后现代主义制造的种种社会幻象,又需要有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并驾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不同阶段的发展。

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的话,自后现代主义产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左翼人士就参加了争论,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是卡利尼科斯的《反后现代主义》、戴维·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和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卡利尼科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戴维·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后福特制的关系,伊格尔顿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左派政治运动的关系以及詹明信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关系等思想基础之上,安德森又增加了后现代主义与政治维度的深层研究,特别是凸显了后现代主义的国际政治视角。

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国际政治视角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产物,更是全球左派政治运动与梦想失败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渗透,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文化。单从这方面来看,安德森与众不同地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定位在20世纪70年代是有深层含义的,因为这一时间正是西方甚至全球左派激进运动走向衰弱的开始。另一方面,安德森还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单向”关系:“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虽然全世界范围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很少是群众性的政治斗争艰苦争来的结果。自由民主是通过经济榜样的力量或压力——马克思的‘商品大炮’——而不是通过道德剧变或社会动员得以传播的……时代精神鼓动不

起来。”<sup>①</sup>

### 三、社会主义的文化与自由

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是誓不两立的对立阵营。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是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而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等,总喜欢将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将社会主义视为“通往奴役之路”、极权主义或“理性的滥用”。当然,部分左派人士,如汉娜·阿伦特等,亦用极权主义来形容社会主义,甚至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安德森看来,这是十分荒唐的。其实社会主义和自由并不必然矛盾,安德森认为,“谁不希望现实的社会主义同时又是自由主义的?但这并不说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非得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结合史的清醒认识,总是为它们将来良性结构提供积极的条件”。

安德森认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要说来,在起源上,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它是一种以法律规则和个人产权为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传统,特别是雅各宾传统的强烈批判,反对中央国家的权力滥用。这种法国自由主义的最为精彩的代表是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他对自由主义的最大的贡献是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古代的自由,如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表现为公民全面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公民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权力,可以积极地通过投票作出集体的决定。贡斯当认为这在古代的小的城邦国家中是可能的。但这也非常危险,因为这些城邦国家是高度军事化的,所以,极易陷入相互之间的战争。在现代社会,贡斯当论证说,这是极为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危险,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社会是规模巨大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共同直接地参与国家事务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而不是军事社会,人们想的是赚钱,而不是战争,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一条件下,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即不被国家干预的权利,成为最为重要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与民主的思想背道而驰,就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党的批判而言,自由主义认为雅各宾党犯了严重的历史错误,竟然以为可以在现代条件下再造古代的自由,这就导致了专制的祸根。<sup>①</sup>

但安德森反过来认为:“我们还是要承认,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确有非常真实的消极自由,这在宪法、法律意义上是有保证的。比如对一个人,不可以不加审讯就武断地逮捕和判刑。但是在选举制度上,几乎没有为积极自由留下任何空间,在政治选择这个方面,这个框架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另外,西方国家对内坚持消极自由的重要性,对外却总是完全忽视它。因此,虽然“坚持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国家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但它们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且也都是最早有大量殖民地的国家”<sup>②</sup>。

在安德森看来,当面对只强调权利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实质上却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时,遗产的代际传承关系日益决定着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分化,或者说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结果是促成了反对这一现象的社会良心的发展。一些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和积极自由的立场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安德森看来,约翰·斯图亚特·弥尔就是如此。他是一个极为诚实的自由主义者。他开始注意社会主义时还只是把这作为一种理想,一种乌托邦,但后来他就开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实践性的解决方案。另一个例子是贝特兰·罗素,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但他后来成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第三个例子是美国的杜威,他是美国实用主义

①[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100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载《读书》,2002年第10期。

哲学的代表,也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波比奥(Norberto Bobbio),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社会主义和像英国19世纪的穆勒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所谓“自由社会主义”。在波比奥看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只能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而在他讲到“自由民主制度”的时候,重点总是在“自由”,而不像在欧洲总的来说势力更大些的“民主社会主义”那样,把重点放在“民主”上。如果说民主的基础是自由的话,那么自由的基础则在于法治。当然,他指出,西方基于法治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并不足以解决引起争取人类解放运动的那些问题,但它是实现这个理想的起码条件。以下几位是安德森重点关注的自由社会主义者。

#### (一) 昂格尔的双重人格思想

在《热情:论个性》中,昂格尔提出了双重自我的理想模式,认为一方面总是处于有限的条件中的自我被赋予了无限的运动性,另一方面自我的构成因素中包含了对他人的渴望。外部世界及其所有的特性最终会被自我超越,但对他人怀有无限需要将使自我“怯懦地依赖别人”,或希望求得集体性的一致。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人性,但对他人既亲近又害怕的两难心情却总是不变。安德森认为这种观点像是对尼采的“人的基督教浪漫主义形象论”的重申,亦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的意识论有更多共同之处,即逃避宿命和一切被动境遇的变动能力,同时人与他人的关系是矛盾的,若即若离,给人带来痛苦烦恼。但昂格尔试图颠覆萨特的消极性,探讨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在矛盾的生存前提之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思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个体更充实的生命”,他总结道,“更充实的生命——自然是主要目标……是增加我们的神性,享有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因此他主张发展一种“人际关系的根本政治,使左派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并打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被“人们习惯的、盲目相信的对立”。<sup>①</sup>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昂格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倚重生产方式,将其视为深层规律和深层结构的做法,试图用“形成性环境”来替代生产方式理论,因为后者过于僵化了。“形成性环境”是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偶合物。安德森认为其坚持认为“我们直接的实用、热情的待人的品质代表着我们克服社会组织冲突的永久的目的”<sup>①</sup>。

安德森认为昂格尔的计划与哈贝马斯是类似的,即现代社会有两个标准:一是制度——经济与国家,它们是金钱与权力这样的客观媒介所操纵的策略性行动的范围,在个人动因背后运作;一是生命世界——私人与公共领域是交往联系的居所,主观间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在文化传播或是社会化过程中生发。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以制度的形式——所有自愿的社会活动或是美学游戏都受到管理法则或是现金关系的侵害——趋向于生命世界无情的殖民化。哈贝马斯希望抵制这个病态的进程。这是新社会运动的使命。昂格尔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边界是易变的、交叉的,目的是要修正环境、创造程序,而不是二元对抗。但安德森认为,昂格尔在思想上远比哈贝马斯更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在政治上又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传统。昂格尔过高评价了制宪的独立意义,因为宪法总是受制于国家的客观结构、社会力量的平衡力,即过于重视国家的法制框架,而对其官僚机构与党外工作过于忽视。

安德森认为昂格尔的概念缺乏限定性的规定,结果是难免处处散发出“热切与柔和”、“崇高与甜蜜”这样强烈的对比与不和谐。其所谓的“高级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失去了人类本性的个人主义,他试图把“角色混乱”与“团结一致的权利”结合起来,但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昂格尔却语焉不详,并且由于过于重视个体的超越性,而忽视了失业、种族和社会性别、军队或是环境等等问题。如果主体性的力量最终依旧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它就难以避免被指责为“平庸”与“空想”。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肯定是要避免这一切的。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 (二)“现代性”与“革命”

在安德森看来,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现代性”与“革命”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人们政治热情的焦点:他依托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伯曼看来,要完成现代化,就需要有自由主体的现代性,把现代主体置身于允许他们突破传统伦理约束的冒险、权力、快乐的体验之中。这种体验穿越了所有的分界线:地理与种族、阶级与民族、宗教与意识形态。在某种意识上,现代性将全世界的人真正联结了起来。因此这是一个破与立同时存在的双向过程。它把所有的事物都融入到了永恒的解体与更新、斗争与矛盾、含混与苦恼的大漩涡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呈现出一种现代化与现代主义之间辩证结合的“永远扩张、跌宕起伏”的大漩涡,呈现出社会的巨大变迁和主观的重大变化相结合的持续状态:在清洗文化和习俗残余的强大行动中,将所有祖先的界限和封建的制约传统撕得粉碎,个体自我获得了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固定社会地位和僵化的等级角色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个体化社会中,无情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社会关系成了新的标志,个体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但个体解放再次成了被摧毁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自我反而迷失了方向,拥有的只是巨大的不安、失败和绝望的情绪:焦虑与骚动、心理迷乱与陶醉迷失其间。<sup>①</sup>道德界限和个人枷锁的毁灭的结果是自我精神混乱,大街上和心灵中到处是游荡的幽灵。

在伯曼看来,这是个最好又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既值得庆贺又需要谴责的时代,这是歌德《浮士德》的时代,它是一个开拓者的悲剧;它也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所再现的世界;它是一致和平庸的铁笼,是人们精神上的荒原,使得所有的个体性失去了生机的同时,又通过机器工业文明给人带来了现世的幸福。人们开始终身与自相矛盾作斗争,即使看起来他们是如此截然相反的两派:要么盲目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欢呼现代性的到来，要么冷漠和轻蔑地加以斥责，实质上持相同的立场，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封闭的铁笼使得现代人无法塑造或是改变它，甚至因此攻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空想。因为现代性作为熔炉，会使得任何将其僵化的设想又都与个人自由和所有人的自由自相矛盾，现代性因此成了永远停不下来的革命。

安德森认为伯曼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学分析引人入胜而富于激情，但是伯曼首先忽略了资本的积累和商品交换形式的确立和扩大，对旧的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普遍消解力。马克思同时强调，这一无限循环的过程的每一时刻又都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安德森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并不是一往直前的直线过程，而是曲线形状。伯曼的第二个缺陷是，没有意识到现代性的空间也是异质性的，其因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差异而显得各不相同。第三，伯曼未能把现代主义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进行差异化对待，比如德国的表现主义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反差极大、调子各异。第四，伯曼的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是进化论的另一变种，褫夺了革命概念中时间和政治的确定性，尤其劫掠了它作为发生于某一特定时刻事件的时间特定性。安德森以他一贯的风格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这项使命既不是延长现代性，也不是要完成现代性，而是废除它。

安德森自己的路径是一贯的，从不同历史瞬间的交叉入手。比如他认为旧的贵族文化的传统主义并不一定与现代主义相冲突；反过来，它可以重新被用于现代主义，反对那个时代的商业气息，比如庞德的意象主义和爱德华式的传统等。而从普鲁斯特或缪塞尔到法国或者是奥地利的所有的反讽都可见一斑。它们是半贵族的统治秩序、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半隐半现的劳动运动的交叉结合体。而第三世界则呈现了另一幅画面。因此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化进程的永恒的表达形式，只能在划定范围的星座之中和特定的历史关口的社会中，才能确定他们自身真实的形象。伯曼的错误正在于他对“激进的个人主义”的坚持，认为“是自我延伸之路而非自我压抑之路把人类领进了美德的宫殿之中……随着每个人学会表达自己与开放自我……他对他人的同情

心与爱心也会有所加深”，而这一所谓的深度必定包括一种激进的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安德森认为，与伯曼的误读和虚无主义不同，马克思认为“自我从一开始并不是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之前而是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所构成的：女人和男人都是社会个体，他们的社会性并不是后来才有的，而是与他们的个性同时产生的”，毕竟“只有在社会中与其他人在一起，个人才会有全面磨炼才能的手段：因此，只有在社会中才谈得上个人自由”。<sup>①</sup>但在伯曼那里，个人和社会是二元分离的：如果自我的发展天生就与他们的关系交叠在一起，那么它的发展就永远不可能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动力；因为与他人共存总会有界限，没有界限的伯曼式虚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发展。而马克思的个人与社会则是辩证与互融的，并且排除了人类本质上无限本体论的可塑性。这些基本的本质性向度可以被扩大和发展，但不能被抹掉和代替。这就与所有虚无主义的无拘无束原则划清了界限。安德森认为伯曼的自由只是一种幻想。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永远只能以“全体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才能实现，因此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就不是伯曼所理解的无形欲望潮流的本质，而是一个深度的内聚力和稳定性。伯曼令人不安地接近于——虽然是用激进和正派的方式——自恋文化的假想。

安德森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决不贪婪无厌地寻求新的东西，它要寻求的是一种增大了差异、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更加多种多样的、并存的风格和实践：创立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建立在更大程度上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复杂化的社会的基础之上，人们不再以阶级、种族或者性别来划分高低。这种自由平等的社会的艺术轴心将平行发展而不是垂直发展，时间表不再主宰艺术意识或者是使之有机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就既不再是延长也不是完成现代性，而是取缔它。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非要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而是修正它，“社会主义将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值完全相容,但肯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sup>①</sup>。差异何在?在于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国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国家。如马克思在壮年时期曾写到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哥达纲领批判》)。一个世纪之后,彻底废除国家依然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sup>②</sup>

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因为共产党是“充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多样性的政治党派;继承所有自由民主制的现存遗产。但这一政党制度本身将被改变——不是通过政治的法令,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事实,它必然会被社会结构的转变而改变。这些变化将遵循社会主义计划的日常实现。选举所使用的这一新的‘实践政治学’框架将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并且这一党派制度将会反映出这一点,这一新的框架将是新的霸权的明确的政治意义。一个永恒的社会学的大多数就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它将走向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党派必须从事的唯一的地平线”<sup>③</sup>。

社会主义“民主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谁投票,而是就什么投票”<sup>④</sup>。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

---

①[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6页。

③Perry Anderson, “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 in *Towards Socialism*, with Robin Blackburn (eds.). London: Collins, 1966, p. 246.

④[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sup>①</sup>。在安德森看来,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不同在于,资产阶级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于政治,对他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优先于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并且极力主张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对他们而言,国家机器本身只要不影响到或者说只要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行。但对于工人或者穷苦百姓来说,政治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对经济无动于衷的层面上,它只有通过集体的方式来控制经济,克服资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方能实现自身的革命任务。<sup>②</sup>

###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

与先知式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在给费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这样说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sup>③</sup>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规定为研究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进行理论的批判和革命实践的变革。他宣布:“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sup>④</sup>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本人从未试图描述他自己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的运行方式,他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时却戛然而止。因此,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4—585页。

②Perry Anderson, "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1966(35), p. 9.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3页。

④[德]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与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名词相符的理论。<sup>①</sup>霍尔瓦特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它的灭亡的（批判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sup>②</sup>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安德森认为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策略方面有重大进展的、分析逻辑与经验细节相结合的、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它把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结合在了一起，并“清除了100年来关于资本的对立面可能是什么状态这一问题的先验偏见和假象，第一次使我们真正看到民主管理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像是什么样子”<sup>③</sup>。

总之，要将历史唯物主义放置于过去与未来、经济与政治、历史与策略的交叉点上。“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要包容面很广，能够把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展望与当前的种种现实矛盾和运动及其从过去的结构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关于整个社会发展的独特动态理论。”<sup>④</sup>佩里·安德森认为在《论社会主义的人》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多伊彻没有沉醉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他展望未来，问道：无阶级的社会一旦实现，我们该怎样评说人们的潜力及其局限性？在多伊彻看来，社会主义虽然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但也不可能是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社会主义无法“解决人类所有的困境”，对于“饥饿、性、死亡”的问题，往往也只是比资本主义更能解决好第一个困境。超越了阶级之后，人类仍将——对不起，雪莱——忍受罪恶和痛苦、感受文明对本性动力束缚的不愉快。社会主义既不会把人类从劳役中完全解放出来，也不会让人类本性的想象力就此止步。

同时，安德森在《当代世界形势》中论述了汤姆·奈恩（Tom

---

①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44—345页。

②[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8—149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Nairn)的《民族主义的面孔》和即将出版的《全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观点:尽管马克思设想在一个长期的时间里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完成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的使命时,这才是可能的。解放并不一定是彻底的阶级解放,在某些阶段上,民族解放承担了阶级解放的主要任务,正如1848年欧洲模式已经显示的,民族化了的阶级往往才是历史的推动力,民族成为马克思为之战斗的民主革命的承担者,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纯粹的全球市场不可想象,因为届时边界便会消失,任何认同都变得不可能。因此,在假定的历史终点,没有社会或文化的同质性在等待我们,“我们依然在现代性的急流之中”。未来的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分离的。

## 第五章

### 安德森对当代思潮的分析批判

---

安德森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基本流派。关于划分的标准,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一书的前言中作了简短的说明:关于右翼,之所以将奥克肖特、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等人作为右翼思想家的代表,是因为他们的共同主题就是反对人民主权、遏制民主。反对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和管理的资本主义,即安德森所说的通过民主的方式限制自由的阶段。主张遏制民主,重新彰显自由的价值。路径是主张国家与市场进行分离的“两分法”,如奥克肖特对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的区分、施特劳斯对神秘智慧和通俗见解的划分、哈耶克对合法国家和立法国家的区分等等。

安德森之所以将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等人视作中间派的代表,是因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都主张“共识”(consensus)<sup>①</sup>,在国际问题上都认同“军事干预”原则。<sup>②</sup>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提供的“正义”、“公共领域”的论证,安德森认为在哲学的层

---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页。

面上真是美妙至极，“连特权阶层、超富阶层、保守人士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问题”，但安德森要揭示美好价值的高调后面隐藏的不美好和不那么容易解释的丑恶与冷漠。比如安德森指出，罗尔斯、哈贝马斯、博比奥就是三位认可了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巴尔干、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合理性的哲学家，他们“潜意识中的愿望都是这样一个平常无奇的日常愿望的哲学表达：有一份自己的蛋糕，然后吃掉它……总是坚持已然被经验玷污的规范性标准，并把世界的进程描述为一次不断朝着理想前进的、越来越有希望的朝圣。依靠普遍的道德作出肤浅的证明，或者偷偷摸摸地求助于凑巧的历史，在这两者之间打转转，结果可想而知：美利坚帝国就会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标杆”<sup>①</sup>。因此，每个人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陷入悖论。

## 一、对奥克肖特“个体性”思想的批判

奥克肖特被安德森称赞为“最富创意的一位思想家”，但并非学界所说的是一位“很难盖棺论定的人”、“英国制度的典型呵护者”，他是一位“更受美国人推崇”的保守主义阵营中敢说敢道的人物，既是反动的天敌也是改革的天敌，是个务实、守一、恪守传统的人。事实上，他是欧洲四大著名的顽固右翼学者中的一位，并且只有把他们放在一起，才能真正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他的思想特征。奥克肖特强调个性和决断论（decisionism），以霍布斯为基础，构建国家理论，认为《利维坦》堪称一部最伟大，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哲学杰作，应当被当作评判现代一切阐述公共权力（civil authority）<sup>②</sup>学说的试金石。

奥克肖特十分推崇“个体性”的意义，认为它改变了从丈夫、妻子与孩子的关系到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的一切人类关系。洛克虽然是自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页。

由主义的使徒,但却对极端的事物深怀恐惧,这也受到奥克肖特的鄙视。人们因为个体性的出现得以从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了自然恩赐的个体性等级差别不受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主张建立公民联合体类型的政府,以确保“做我们自己的选择,在这么做时觉得快乐,每个人以热情从事各种事情,每个人所持信仰的不同,但深信它是唯一真理”。公民联合体类型的政府并非共同体,它是一种“非工具性目的”的权力,有强大的法律却从不干涉个体的自由。人们享有广泛的自主选择权,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职业、信仰、意见、义务和责任等。公民联合体类型的政府鼓励人们的自主行为和自主选择;充分行使个性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事业联合体的政府实现的是一种共同体,共同体道德是一种与中世纪家庭或村社共同体生活相适应的道德存在,共同体道德观是对这种道德生活的观念反映。这一共同体的组建并不取决于其成员的意愿。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取决于个体身份,个体很难从血缘关系的网络中挣脱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或者说谈不上有什么道德标准的变革或发展。它试图消除所有人的个性,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再为自己谋划、为自己担当,效忠的不是既定而明确的规范,而是具体的个人。因此往往需要一个全知全能的领袖,“反个人”专制由此诞生。共同体政治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从总体上说,统治是一种地方性活动;第二,政治合法性来自于惯例和传统,而不是基于人们的同意;第三,管理和统治来自毫无章法的偶然性。

安德森认为奥克肖特的观点在哲学上接近尼采的立场:人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应否定。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民主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倒退,否定从中世纪后期走向历史舞台的“个人”,这一摆脱了共同体束缚的自主的道德个体,这一能够自行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是欧洲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的“庸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个人独立的责任,是一群道德沦丧又没能在社会上混出名堂的,在不满中不能自拔的蛀虫。他们试图将代议制政府转变为“全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他们依赖人数的多寡,即只立足于“纯数量的权

威”(the authority of mere numbers),公然藐视自然恩赐的等级和决断权,也不考虑智慧的高低。<sup>①</sup>

因此奥克肖特称普选权是一种负个体性(anti-individual)的道德缺失。在奥克肖特看来,真正的个体性追求的是“一种无预设、无保留、无禁忌、无修饰的经验”,“企业实现一个完全一致的经验世界,这当中或许有着某些堕落的甚至颓废的东西”,即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标和虚假的意义。因此任何政治规划都可能会招致糟糕透顶的实践幻觉,他甚至批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反计划的计划。在《论人类行为》(On Human Conduct)中,奥克肖特提出“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的概念。“公民联合体”是指依靠程序性规则建构的共同体,以此为指导的政府称之为“规则统治型政府”(nomocracy);而“事业联合体”则是指为达到实际目标建构的共同体,追求这类目标的政府称之为“目标统治型政府”(teleocracy)。“公民联合体”的基础是原子化的自由个人,是以自由个体的荣耀为基础政府,因此不包括集体意图在内;而“事业联合体”的基础则是普遍同意和集体目标,它受文化、宗教和价值的影响,更受“生产力伦理”和技术统治左右。因此它的伦理是工具性的,不像“公民联合体”是以“非工具性”(non-instrumental)为目标的。换言之,政治应该是审美化的,而不是工具化的。它追求高尚的品质和自豪的态度,以实现理性和意志的统一。

安德森认为,这与奥克肖特自己宣布忠于霍布斯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后者的国家理论以“联邦不能容忍节衣缩食”为目标,他之所以有选择地忠于霍布斯的国家公共权威的主张,因为这个公共权威不是经民众同意和选举出来的,它没有给现代民主的典型诉求提供支持。但如何保证公共的权威是公正而不侵犯个体性的自由,安德森认为奥克肖特的解答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后者求助的黑格尔的法律不能与同时代的“有教养的道德感知力”(educated moral sensibility)相冲突的理论,其政治哲学的根基又循环地回到伦理哲学的基于“同意”的德性说。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因此奥克肖特又试图把黑格尔“这位认为国家是一个实在的、目标导向的共同体——被提升到最高权力的共同体——的最重要的理论家，矮化为一名公民联合体的卑微职员”<sup>①</sup>。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伦理生活的社会形式，是普遍历史的内在发展的结果。而在奥克肖特这里，国家变成了偶然性的存在，真正的根基变成了伦理性的“同意”。

因此奥克肖特的政治理论就如他的性格一样，是超脱的、审美的、乌托邦的。他对官方的荣誉无动于衷，就像他对国家压倒一切的存在理由——战争——这一最工具理性的集体活动视而不见一样，他也从来看不到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完整而展开的军事竞争的逻辑。即他的视线完全是国内的，并且把任何公共事业的痕迹都从政府视线中清除出去。对他而言，这种集体主体的大门必须关上。他的政治哲学最终建立在了一种人性的简单二分之上，即崇尚“自力更生”（self-employment）的精神和鄙视卑下的“合作关系”（partnership）。安德森因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克肖特一切堂而皇之的所谓渊博学识，到头来只是以这个有关经济人的灵魂分裂的小故事的草草收尾而告终。”<sup>②</sup>从而“治国之法”（the laws of rule），即西方历史上权力和财富的积累所带来的社会现实，在“依法治国”（the rule of law）——“自力更生”的人的理想栖息处——这层薄雾下被忘得一干二净。那些被他热情称赞为公民联合体的国家和民族，其实是一些无出其右的征服和殖民的机器。连施米特都指出，那些被奥克肖特赞美的程序超越性，其本身和财产权、分配、抢占土地密不可分。就如“nomos”（律条）和“nemein”（获取）之间在词源上一样紧密。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之间其实并无明确的界限。

同样，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否定作为自然内部的一种永恒的不平等。施特劳斯认为从自然等级的视角来看的话，人注定天生是不平等的，发现真理的能力只局限于小部分人，而能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够坚持真理的人更少。因此,最好的政体将会反映出人的美德的差距。“神秘的智慧”和“通俗的见解”之间必须泾渭分明,否则二者就会两败俱伤。<sup>①</sup> 施特劳斯的“两种智慧”的主旨在于提倡政治民主应该基于自然的等级不平等之上。<sup>②</sup>

如果不能得以如此的话,奥克肖特式的政治虚无主义似乎也能勉强为右翼知识分子接受。比如芒特在《政治剧场》一书中,就认为政治不是利益争夺的战场,也不是对真理的追求,更不是进步的航程,它是迷惑观众的艺术表演。但不是高雅的戏剧,而是二流的商业演出,大街上的杂耍,拨动着人们的情感,戏弄着我们的困窘。总之,它是闹剧。<sup>③</sup>

与此同时,安德森批判福山将自由民主视为黑格尔核心思想之一。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因为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欧洲自由主义,即法律统治——保证个人享有人身自由、私有财产和舆论自由,并确保有才能的人能够担任国家公职的公众秩序。安德森认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并不民主,因为它惧怕民众的统治,拒绝普遍选举。因此福山说他是自由民主的创始人自然是时代的错误:它拥护的是君主立宪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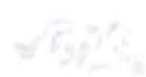
安德森对消极自由的个人主义观念持批判态度,认为积极参与政府事务是个人自由的核心意义,贡斯当区分了古代社会的自由和现代社会的自由,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更主要是消极性的。黑格尔把市场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体个人主义的消极自由限定在市民社会之中,以便国家形成没有个人私利色彩的公共服务体系。但安德森反对这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的主张,他认为国家体现的是积极自由和政治意愿的普遍原则,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并非相对立的抽象概念,它们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结构。国家要进行调控,以避免“危险的动乱”并保证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生存的权利。国家,而不是个体性或者国家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与市民社会二元论,是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前提。

## 二、对哈耶克反民主思想的批判

对于哈耶克,安德森认为他所依靠的主要有“三部曲”:首先是对“合法的国家”和“立法的国家”的区分。哈耶克认为现代民主误将“法律面前的平等”等同于“法律制定方面的平等”,但两者实际上是绝对不同的两种原则,且后者会破坏前者。因为人民主权的观念包含这样的前提,即颁布的公法是一种立法上的多数派可以随意颁行的法律,能够置私法普通法的代代相传的智慧于不顾,可以僭越自由秩序给个人财产和人身权利所划定的底线。现代民主必然导致“自由社会的自发秩序逐步转变为一种极权的制度”。因此,一种压制民众选举权但尊重法制的专制政体,可能比一种易受经济干预和社会再分配诱惑的民主政体更好地守护自由。民主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最和平的变革形式和教育群众走向成熟的最好的手段,但这些优点都是技术性的、短暂的,不能据此证明民主本身的价值。<sup>①</sup>

其次是“外部秩序”(taxis)和“内部秩序”(cosmos)的区分。哈耶克崇尚自发的“内部秩序”,这是一种非有意打造的但前后一致的个人主体(individual agents),因各自追求着不同的目的而形成丰富的关系网络,控制这个网络的只能是通行的程序性规则。他反对“外部秩序”,后者是外部性强加到个人身上的有规划性的集体目标,其福利性的制度导致独裁、专制、腐败和没有活力的堕落。只有在政府结构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分离的情况下,法制才能得以保持,活力才能得以重现。而民主国家会导致在虚构的“社会公正”名义下,实现“外部秩序”对“内部秩序”的擅自闯入,从而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在安德森看来,哈耶克的学说中有很强的功利主义成分。即评判一种合意秩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序的尺度不是哲学的真理,而是现实的幸福(well-being)。而且安德森认为“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间的边界日益受到侵蚀,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如果要重回到界限分明的二分法则,则需要对国家的结构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设计。哈耶克为了把“律则”(nomos)式的自由法律从人民主权的逻辑中拯救出来,认为有必要剥夺45岁以下的选民资格。因为真正值得追求的是无民主的民治(demarchy without democracy)。

第三是政治与经济的区分。哈耶克主要是从私有财产的视角来讨论的,在哈耶克看来,“任何社会只要将政治和经济混淆在一起,在其中国家垄断财产,那么,就必然会出现极权主义”。“缺少国家与私有产权的分离,就会产生极权主义。”<sup>①</sup>也就是说,公有制就是专制的起源,因此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制和公有制,反对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因为国家计划对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经济自由,同时也对他们认为的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安德森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法西斯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法西斯体制虽然有其计划,但它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不干预私人财产。德国没有取消市场,私人产权并没有改变法西斯体制。”<sup>②</sup>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不过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的老师米瑟斯比较坦诚,他在《自由主义》一书中直言:“只要法西斯主义能够击败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我们就应该感谢法西斯主义。”<sup>③</sup>因此在安德森看来,新自由主义害怕的是人民主权带来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冲击。

在安德森看来,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让现代民主和人民主权上不了岸。他们都有高超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奥克肖特有一套高超的劝诱艺术,作品总是一气呵成。虽然其学术性的思辨不及罗

①[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97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97页。

③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97页。



尔斯,社会影响力却远远超过后者。在安德森看来,如果右翼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任何民主的计划都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如果左翼的解释是正确的,苏联的错误就不是计划本身,而是缺乏民主参与的机制。公民作为国家的成员,就需要以民主的方式参与经济问题的决定,而不是简单将经济问题交给市场自我运作。另外安德森坚决反对左右翼共同的逻辑前提:国家本身必然是专制的、极权的、实行暴力镇压的。在他看来,国家并不是屠杀和专制的罪魁祸首。哥德哈根的新著同样认为整个德国民族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引起了许多争论。这些问题仍然是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问题,但至今人们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

在安德森看来,以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极为保守的,甚至是军事主义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传统在这一潮流中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这一主流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公司自由、财团自由,以及作为所有这些权利保障的战争逻辑。民主不仅与此无关,而且对这些权利构成威胁,因为民众将通过民主投票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毁掉上述自由。因此,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猛烈抨击,安德森认为这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通往奴役之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sup>①</sup>在哈耶克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因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而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不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第4期。

少的。反过来,极权主义的国家可能较之民主国家更为自由。军事独裁与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力量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应当只赋予那些中年以上的上院成员以投票权。<sup>①</sup>

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众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sup>②</sup>

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三个杀手锏可以打败新自由主义:

第一方面,需要坚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即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中心准则。当然,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在他看来,马克思早就对此作出了深刻的说明,即真正的平等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平等,不但不会阻碍社会的活力,而且“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sup>③</sup>

在安德森看来,在马克思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表述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平等和公正在马

<sup>①</sup>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载《视界》第四辑,2001年,第101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第4期。

<sup>③</sup>[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



克思那里,根本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批评的,或者如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所误解的一刀切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sup>①</sup>。

在此,我们看到安德森与内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思路是有呼应的,即后工业时代的最大生产力不是物,而是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生活,因此这种个人的全面发展与消费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循环的增长关系:通过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每个人重新释放出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而这些资源的获得,不能仅靠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宽管制的市场获得。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不同的财政体系。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而新自由主义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第二方面,就所有制而言,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这支反社会主义的十字军在最近的几十年实现了它的目标。但安德森认为,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应该被发明出来以克服私有化运动带来的弊病,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

---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第4期。

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是非常有益的,而与之配套的是人民民主制。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与国家的分离,甚至主张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以避免人民民主对资本的限制和对市场的干预。因此,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就需要更多的人民民主,重新塑造更完善的人民民主体系,而不仅仅是简单化的选举制民主。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集权主义的诞生。

对此,内格里、哈特等人似乎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国家意味着集体意愿的单一化,甚至极权化。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存在“群体智慧”(swarm intelligence),这是对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的再阐释,其与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政府的自然起源”不同,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普遍理论不同。但安德森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并形成全球化市场的压迫和大众对其进行反抗的一个无解僵局。

安德森更赞成布尔则提出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所构建的从自由市场到自由国家有秩序的通道。这一遗产在20世纪早期为从右派到左派的对立所废除,其变形是需要的,并且集体智慧与集体意愿之间并非是绝对冲突的。颠覆黑格尔的定则:不是将市民社会纳入国家,而是相反地以一个潜在的非市场的基础重构市民社会,背离国家逐渐消亡这一趋势,这一点马克思和葛兰西都曾经设想过。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他们的思路: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代议制民主已经遍布世界,从东欧到东亚和南非,看不到明显的倒退或停止的迹象;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从高加索山脉到太平洋,超越它们的新的民主形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大众网络汇合到了一起,却没有中心方向,无论是在西雅图还是在热那亚。安德森认为,各种不同的超越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新的社会形式还要去想象。

安德森的论述表明,虽然新自由主义在当代已经确立了霸权地位,过去十年最重要的方面可以确定为新自由主义在事实上的巩固和普遍蔓延。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时代仍然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只是我们必须从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教条主义的模式中摆脱出



来,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上重新理解马克思。而且,作为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一种力量,哪怕是日前遭受挫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对于保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

安德森在《艾萨克·多伊彻的遗产》一文中,认为多伊彻的《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上升和衰落”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只存在一个基本要素。它非常简单明了,但却集中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的分析。这个基本要素就是:生产过程中日益增长的社会因素和资本主义财产中反社会因素之间的尖锐矛盾。生产者不能再像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下那样,一代又一代地独立生产,就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的生存模式,也即整个生产方式,正在逐渐变得社会化。我们社会中的每个因素、每个细节、每个细小的环节都相互依赖。整个生产过程变成了我们社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生产过程。同时,你又拥有某种反社会的财产,即私有财产。这种反社会的财产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暴政和不理性的根源。”<sup>①</sup>新自由主义非但解决不了这一矛盾,反而加剧了这一矛盾,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和自我消灭,以及社会主义重新获得复兴和真正的生命力。

### 三、对罗尔斯“设计共识”思想秘密的暴露

对于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安德森认为当代以任何语言写成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像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学术反响。<sup>②</sup>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立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下实现机会的均等,并给运气最不好的人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2—83页。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带来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其基本论点是为分配的正义而呼喊,鼓吹让最弱势者获得最大利益的“不平等”,也就是并非平均分的“差异原则”。但如果你因此期待他能够把分配的正义原则也推展到富国与穷国的国际关系上和财富的再分配上的话,就大错特错,因为他的《万民法》中提出的东西正好与此相反: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义务把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差别原则并不适用于民族之间,因为他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并不是因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的,主要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所致。每个社会本质上应该对自己的经济命运负责。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之间毫无关系,因为富国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根据罗尔斯的《万民法》,世界的主要划分标准不再是贫富和剥削,而是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攻打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就是现实的《万民法》。安德森认为,罗尔斯“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是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罗尔斯是属于美国的极端左翼学者的主要原因。<sup>①</sup>

安德森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揭露罗尔斯的这种“儒表法里”的两套逻辑的虚伪性,为真正的左翼正名。安德森首先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形而上学抽象性,罗尔斯为了使处在原初状态下的各方产生“最大最小值”正义观,进而选择他的两个原则,他把只有这些原则本身才能带来的同情心赋予了无知之幕后的各方。<sup>②</sup>换言之,罗尔斯笔下的“人”给人的感觉是既非历史的,也非社会的,更非某种文化传统中的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玻璃心的抽象人。个人的理性选择可以定型于原初状态之中,公正的社会契约可以从这种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来,因而是全球普遍性的普适原则。但安德森指出,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其实是美国这个特殊共同体——这个与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国度,这个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载《读书》,2002年第10期。

<sup>②</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必须考虑到组织需要和经济效率”的民族——的设计。<sup>①</sup> 因此只是“一个历史时间和国家空间，从中抽象出了表面上普遍的永恒的原则”<sup>②</sup>。即并非是从普遍到特殊，而是从特殊到普遍，或者说是要把美国模式推广到全球。因为他的哲学的根基是“最有可能适合一个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人的概念的社会合作的概念”<sup>③</sup>。

在这样的形而上学预设中，罗尔斯一方面借助民主社会的自然场景去建立他的“人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诉诸他的人的概念去建立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sup>④</sup> “无知之幕遮蔽了每个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选择机会，但并未遮蔽其有关其典型制度的集体意识。”<sup>⑤</sup>而这种集体意识恰恰是资产阶级试图将丰富而复杂的人还原为经济人的意识，而其关于自由的平等总是优先于物质满足上的平等的主张，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其财富不平等事实的一种巧妙遮盖，就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而言，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是压倒一切的。<sup>⑥</sup> 没有什么比《万民法》更清楚地暴露了这位哲学家思维的“肮脏的小秘密”：他并非像他宣称或暗示的那样是以清白的“无知之幕”为出发点抽绎出他的政治哲学原则，恰恰相反，他是他以他青睐的现实存在为基础来构建他的理论模型的，而经过一系列理论推演，他恰好证明了那个预先获得青睐的现实存在是最好的可能形式。

在安德森看来，即使如此，这样的美国也是理论构思中的美国，罗尔斯理论的形而上学性使得其一碰到真实的现实便一败涂地，对于美

---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⑤[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

⑥[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国这个“在《正义论》中宣示为近乎公正的社会”，这个“民主民族的骄傲”，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也不得不承认，“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立法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可能处于一个腐败的社会……这个世界并非本身对政治正义与善不友好。我们的社会世界也许本应该有所不同。希望留给了那些在别的时间和地点的人”。<sup>①</sup>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已经放弃了共享“差异原则”或者某种更深层的最终目标的追求，只需要在社会上各种相互竞争的学说之间达成某种宽松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即可，从而从普遍永恒原则的坚守堕落为了多元性的综合，而且这种多元性还只考虑到了宗教的多元性，政治理念的多元性被大大地忽视了。或者说他所以为的不相容性，不过是康德的自由、洛克的新教精神、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安德森看来，只要看看这份名单就足以理解伟大的不相容性说法有多么无聊了。罗尔斯既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全球霸权，也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的哲学模型，更没有认识到资本逻辑的剥削本性，反而认为“取决于社会出身的公民生活前提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合作是必要的或非常有利的”。<sup>②</sup>在罗尔斯看来，哲学的任务不是抵抗，而是要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实现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和解。和解与其说是顺从，倒不如说是积极地接受现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就像齐泽克所讽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那么我们就最好假装很乐于接受和欢迎它。而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就属于这种作为和解的政治哲学的范畴。差别原则在这一现实主义的面前，再次羸弱不堪，仅仅成为缓解挫折感，平息我们对社会及其历史的愤怒的工具。安德森认为，在这些语无伦次又相互矛盾的句子中，罗尔斯的哲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sup>②</sup>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67. 参见[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学坍塌了。<sup>①</sup> 在安德森看来,如果罗尔斯更多关注现代社会的真正僵局,他就会写出更多的作品,不过书名不应叫《正义论》,而应为《非正义论》。<sup>②</sup>

#### 四、对哈贝马斯思想“背叛”的批评

安德森与哈贝马斯的具体交锋主要表现在《思想的谱系》第五章中,安德森先回顾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即在文明的开端,人类就展开了“要控制自然就需要控制他人和自己”。就如荷马的奥德修斯形象所表现的那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而他的水手们在他的下方塞住耳朵划桨,以抵挡女海妖美妙动人的歌声。而现代理性工具化进步的结果是反犹太主义和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启蒙没有完成人性的自律成熟,启蒙以痛苦的方式实现着自身。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社会受到两个中心问题的困扰。一个是非人格性制度,通过回避主体间沟通的机制协调社会行为,即通过金钱权力的媒介来主导市场和国家;另一个是生活世界,它是主体之间直接沟通理解的领域——家庭、教育、艺术、宗教。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机制对生活世界不断的蚕食——官僚和金融规则入侵或腐蚀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本身的内部联系又受到倍增的专家文化(expert culture)的威胁,任何稳固的文化所依赖的继承特性也被来自理性化普遍规范的增长压力逐渐损坏,自由交际就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威胁。<sup>③</sup>

但哈贝马斯相信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权力的工具理性能够而且应当受到从它们之外的生活世界里喷薄而出的交往理性的抑制。这种交往理性中,家庭、学校、志愿团体、文化企业等的行动不是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06—208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85页。

以物质成就为导向,而是以相互理解为旨趣。虽然后者有被殖民化的危险——经济或技术的机制侵入亲密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自然形式,并使它们扭曲变形,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就是生活世界的抵抗与公共领域的可能之所在,纵使生活世界的舆论不能占领金钱和权力的堡垒,至少可以对其施加舆论和政治压力。甚至法律也是来源于生活世界的社会团结,而生活世界的非强制沟通又给法律条文提供了一种超越于纯粹合乎法律的合法性。因此,法律不再是与生活世界本身相抵触的,而是重建诸如家庭或学校这些生活世界本身的必要中介。不过安德森批评哈贝马斯没有注意到合法性与真实的法律之间的现实距离,并且认为“只有法律秩序与基本道德原则不冲突,它才是合法的”<sup>①</sup>。而这个道德原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所有人的平等利益”。

不过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经济分离的国家与社会现在开始相互渗透。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随着社会化的进程,家庭也正在失去它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兴盛也日趋摧毁真正独立的公众,文化不再是某种批判理性的领域,而只是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消费。政治决策不再是无私的理性共识,而是不同博弈势力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妥协。这条道路的结果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文化的、政治的启蒙复合体,而是庸俗的当代意义上的“宣传”或“公共关系”,即它的趋势不是交往理性的兴盛,而是其毁灭。

具体说来,哈贝马斯至少犯下了三个传统左翼所不能容忍的错误。首先是对现实不平等的漠视。安德森指出,“不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有多么的不平等——让我们申明,这种说法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几乎完全找不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所产生的法律结果仍然会是‘公正的’,倘若它们获得的相互交谈的机会是平等的话。随着这根魔杖的挥动,不平等竟然又变成某

<sup>①</sup>[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种类似平等的东西”<sup>①</sup>。虽然哈贝马斯就此问题也提供了相应的解释，但在安德森看来这终究还是“自相矛盾”的答案和“空洞”的标准。哈贝马斯毫无疑问已经登上了新自由主义的战车，对传统界限分明的劳资关系不再感兴趣，从而也就“避免就地球上穷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sup>②</sup>。

其次，哈贝马斯试图用“更高水平的主体间性”代替传统的“人民主权”观，从而使得公共领域往往成为权力的外衣与装饰。比如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在解释公民的共同努力如何能够偶尔影响那些统治着他们的人的算计时，给出了一个隐喻：“舞台上的表演者为自己的表演魅力应感谢顶层楼座上那些送给他们的赞许。”<sup>③</sup>安德森认为，这种论调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坐看政治表演”的被动受众的角色被得到了默许，结果是助长了资本主义系统对“人民意志”的剥夺，以致“权力留给了非人化的公共行政权威，而与任何人民意志的行使无干”。<sup>④</sup>“在欧洲层面进一步消解人民主权，并且在推定的全球层面上使人民主权蒸发。”<sup>⑤</sup>其所看重的在国际关系领域为任意“践踏国际法”的单边主义大开绿灯，比如美国诸多霸权行动就“迄今从未过多地困扰哈贝马斯”。<sup>⑥</sup>甚至在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北约攻占南斯拉夫的联军行动中，哈贝马斯更是抛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支持论”。“忠于西方的长期立场”以及“美国偏向”，在安德森看来是哈贝马斯学术视野中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幽灵。政治立场被偷偷塞进了

---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3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

④[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

⑤[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⑥[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表面上看起来“中立而严谨”的研究之中,并成为所有学术的出发点和落脚处,“政治情感”优先于“法律主张”的本质所在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是从彻底的社会解放退回到了“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团结与行政权力和金钱三足鼎立的现实考量:哈贝马斯一开始是“针对体制对生活世界实行殖民统治的危险发出警告,并且认为在它们之间需要某种新的平衡,在这种新的平衡中‘团结的力量能够胜过其他两种控制资源的力量,即金钱和行政权力,并因此成功地捍卫生活世界的实际要求’”,后来,这一点变成了“金钱、权力和团结之间某种可以接受的平衡”,再后来,他的设想又修正为“社会团结可能获得充足的力量支持自己抵抗其他两种社会力量——金钱和行政权力”。从“胜过”到“可接受的平衡”再到自我保护的“抵抗”,词形的变化构成了一条哈贝马斯态度的变化曲线。<sup>①</sup>这还不算,到了《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部著作时,哈贝马斯就进一步退却为“它既没有肩负起准确描述现实的责任,也没有肩负起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提出批判性建议的责任。相反,它在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游移……成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过时又过时的哲学”<sup>②</sup>。在安德森看来,哈贝马斯已日益悲观性地接受了国家和资本对生命的强大统治力,从而退回到他曾试图超越前辈的悲观主义战壕。

对于哈贝马斯在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缺陷和混乱,安德森认为“完全归因于哲学头脑的退化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哈贝马斯在逻辑背景知识方面的不足,或没有严谨的推理能力”。<sup>③</sup>安德森把原因归向了良心和信义,并不无遗憾和痛心指出,“在这里,哲学让位给了这样一些蹩脚的、混杂的、自相矛盾的主张和

①[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3—154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③[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借口,而我们似乎只能用坏良心或者背信弃义才能解释它们”<sup>①</sup>。哈贝马斯的所谓先验真理恰恰不过是对经验现实的无批判接受。

客观而论,安德森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横扫了东西方的壁垒,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取得重大胜利的背景下,当“马克思主义在左派文化中不再举足轻重,甚至工会主义也大大地瓦解了”<sup>①</sup>的时候,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不妥协的现实主义”<sup>②</sup>,是非常难得的。他也坚信:资本主义愈是发展,愈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社会才对。所以社会财富越丰富,越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准备着物质基础。

世人常说坚持客观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失去理想性,并认为晚年马克思因其对科学性的坚持而缺乏理想性。其实,马克思对生命情感的坚持是贯彻终身的。1835年8月12日,17岁的马克思血气方刚,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豪迈地写道:“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而无声地存在下去,

---

①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1), p. 5.

②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1), p. 5.





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sup>①</sup>

这不是虚假的高谈阔论，而是虔诚的生命承诺与崇高的命运交付。1867年4月30日，年近50岁的马克思因自己的毕生之作《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而欢欣鼓舞，但并非因为版税或者现金收入，而是他离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而高兴。在给别人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最内在真挚的情感：“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实际的。”<sup>②</sup>对“人类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体察成了马克思心甘情愿奉献“健康、幸福和家庭”的根本动力。1872年9月8日，已届晚年的马克思，面对自己创立、领导的第一国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挫折，他理智上承认了工人运动暂时的失败，但却在理想和意志的层面上说出了如下感人肺腑的话：“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sup>③</sup>马克思发誓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去争取的那个事业，就是社会主义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这是马克思在人类感性时间中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注，正是这一点激励他去从事毕生的工作。

安德森的思想变迁路线和价值关怀与伟大的马克思有几分相似之处，他长期关注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民族，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丧失痛彻心骨。当西方世界向右的潮流浩浩荡荡时，安德森虽然深感革命暂时无望，依然在向右的潮流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左，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0页。

流而上,选择向胜利者发出不和谐的声音。<sup>①</sup>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时坦克出沒的莫斯科街头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中国,从局势动荡的委内瑞拉到战争不断的阿富汗,安德森的足迹遍及全球。对安德森来说,行路是广义的,其实就是实践,在实践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保持批判性的了解和研究,复原社会历史时间和空间的真相,在对“旧世界”的研究中发现新社会线索。

此外,安德森在重视结构关系的同时,亦重视历史传统在当代的激活和复兴,这对于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复兴之路,形成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气象的民族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sup>①</sup>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载《读书》,2005年第6期,第41页。

## 参考文献

---

### 一、佩里·安德森本人著作

#### (一) 中译本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3. [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英]佩里·安德森、[英]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7. [英]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8. [英]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 (二) 英文本

1.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2.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3.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4.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1980.
5. 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6.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7. Perry Anderson,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Verso, 1992.
8. Perry Anderson & Patrick Camiller (eds.),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9.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7.
10. Perry Anderson,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London: Verso, 2005.
11. Perry Anderson, *The New Old World*. London: Verso, 2009.
12. Perry Anderson, *The Indian Ideology*. New Delhi: Three Essays Collective, 2012.
13. 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London: Verso, 2015.

## 二、国内关于安德森思想的研究论文(暂无著作)

1. 程祥钰:《经验与历史——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2. 段忠桥:《对安德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说法的质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3. 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安德森》,载《读书》,2005年第4期。
4. 郭方:《评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5. 国恩松:《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评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6. 姜芑:《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7. 李瑞艳:《安德森的社会批判思想及其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年。
8. 李瑞艳、闫义:《浅议佩里·安德森的结构主义情怀》,载《沧桑》,2008年第3期。
9. 龙宏甫:《评佩里·安德森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0. 鲁绍臣:《佩里·安德森对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扬弃及其启示》,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7年。
11. 鲁绍臣:《佩里·安德森:传统反思与理论重构》,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8年。
12. 鲁绍臣:《反思与重构——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图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年。
13. 乔瑞金:《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载《理论探索》,2006年第4期。
14. 乔瑞金、李瑞艳:《试论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及其意义》,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15. 乔瑞金、李瑞艳:《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索》,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16. 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 乔瑞金、师文兵:《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历史的整体视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理论”之争及其启示》,载《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8. 乔瑞金、师文兵:《走向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融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载《哲学堂》,2004年。
19. 师文兵:《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文化批判意识——E. P. 汤普森与P. 安德森的争论与对话》,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20. 师文兵、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政治意识》,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1. 王金强:《继承与超越——评佩里·安德森的工人阶级观》,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2. 王晋新:《评佩里·安德森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3. 谢济光:《佩里·安德森的后现代主义追溯》,载《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24. 杨春吉:《佩里·安德森的学术思想探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25. 张亮:《从激进乐观主义到现实主义——佩里·安德森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理论退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26. 张亮:《从激进乐观主义到现实主义——安德森与〈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理论退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27. 张亮:《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载《文史哲》,2010年第1期。
28. 张文涛:《析E. P. 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之间的争论》,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29. 赵国新:《佩里·安德森及其后现代观念》,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30. 赵国新:《以史笔抒政见:安德森论20世纪英国学术文化》,载《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 三、国外关于安德森思想的研究论著

#### (一) 著作

1. Dennis Smith,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Polity Press, 1991. 中译本:[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Gregory Elliott,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3. 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Marxism and the New Left*. London: Merlin, 2004.

4.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译本:[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二) 论文

1. Anthony Giddens, "The Shrinking of Social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ruary 17, 1995, No. 4794.

2. Arthur Goldhammer, "Did Historians Make History?" *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Summer 2006, Vol. 24, No. 2.

3. Callinicos Alex, "Perry Anderson and 'Western Marx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984, Vol. 2, No. 23.

4. David MacGregor, "The End of Western Marxis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March 1, 1978, Vol. 7, No. 2.

5. Fred Inglis, "Marxism's major-general,"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November 6, 1998, No. 1357.

6. James A. Winders,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Book Revie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pring 1986, Vol. 27, No. 1.

7. Joe Cleary, "Toward a Materialist-Formalist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Irish Literature," *Boundary 2*, Spring 2004, Vol. 31, No. 1.

8. Krishan Kumar, "Sociology and the Englishness of English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March 2001, Vol. 19, No. 1.

9. Lawrence Goldman, "Foundations of British Sociology 1880-1930: Contexts and Biographies," *Sociological Review*, August 2007, Vol. 55, No. 3.

10. Matthew Gandy,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Book Review)," *Antipode*, January 2000, Vol. 32, No. 1.

11. Maurice Meilleur,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Antioch Review*, Summer 2006, Vol. 64, No. 3.

12. Norberto Bobbio, "At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8, No. 231.

13. Paul Allen Miller,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ry Anderson and Marxism Today," *Southern Humanities Review*, Fall 1994, Vol. 28, No. 4.
14. Paul Blackledge, "Morality and Revolution: Ethical Debate in the British New Left," *Critique*, August 2007, Vol. 35, No. 2. 中译文:[英]保尔·布莱克雷治:《道德革命:英国新左派中的伦理论争》,林育川等译,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
15. Paul Blackledge, "Perry Anders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0, Vol. 7, No. 1.
16. Paul Blackledge, "Realism and renewals: Perry Anders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the Left," *Contemporary Politics*, December 2001, Vol. 7, No. 4.
17. Richard Lachmann, "Comparisons Within a Single Social Form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Perry Anderson's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Qualitative Sociology*, March 2002, Vol. 25, No. 1.
18. Robert Albritton, "Perry Anderson's Materialism,"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eptember 1987, Vol. 17, No. 3.
19. Robert Wuthnow, "State Structur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Reformation (A Reply to Moad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une 1989, Vol. 54, No. 3.
20. Simon Bromley, "On Gregory Elliott's Perry Anderson: 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2, Vol. 10, No. 3.
21. Stanislaw Andreski,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y*, January 1978, Vol. 12, No. 1.
22. The Editor, "Socialism: A Time to Retreat?"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2000, Vol. 52, No. 4.
23. Wesley Teo,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Book Review)," *Library Journal*, December 15, 1976, Vol. 101, No. 22.

## 四、其他相关参考资料

### (一) 中文参考资料

1.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
- 5.〔德〕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重庆出版社，1993年。
- 6.〔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53年。
- 7.〔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8.〔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
- 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 1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从》，顾浪、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 11.〔法〕雷蒙·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冯学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 12.〔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 13.〔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14.〔法〕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 15.〔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16.〔法〕雅克·德里达：《写作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 17.〔美〕阿克里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 18.〔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9.〔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20.〔美〕艾伦·D. 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1.〔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2.〔美〕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林淑贞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

2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4.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5.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7.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28. [美]卢瑟·S. 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9.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谢立中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30. [美]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31. [美]约翰·F. 威尔逊:《当代美国的宗教》,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2.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33.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
35.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36. [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7.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余其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38.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和飞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39. [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40. [英]杰拉德·德兰迪、[英]恩靳·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1. [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42.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43.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4.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45. [瑞士]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46.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47. [意]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麟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
48.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49.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50.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主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1.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吴宇晖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52. 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3. 国恩松:《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评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54. 黄继锋:《阿尔都塞与马克思》,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55. 黄瑞祺主编:《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
56. 姜芑:《E. P. 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57. 雷金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初探》,载《兰州学刊》,2001年第

5 期。

58. 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59.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李泽厚十年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60.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61. 梁民恂:《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霍布斯鲍姆史学方法论思想述论》,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2. 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 E. P. 汤普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63. 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4. 欧阳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

65. 庞卓桓:《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66. 旗歌主编:《旗与歌:在北大的六次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67. 沈汉:《爱德华·汤普森的史学思想》,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68. 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 安德森访谈》,http://www.cul-studies.com。

69. 王维、庞君景:《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70. 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

71. 奚广庆、王谨、梁树发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

7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73. 徐崇温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

74. 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载《学术界》,2000年第2期。

75. 衣俊卿:《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76. 俞吾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77. 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



第6期。

78. 俞吾金:《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6期。

79.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

80.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81. 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

82. 俞吾金:《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内在张力》,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83.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

84.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8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86.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87. 张一兵:《作为哲学生活规定的历史与时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

88. 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访加拿大学者赖恩·帕尔默教授》,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二)英文参考资料

1. Alex Callinicos,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80.
2. Alvin W.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London: Macmillan, 1980.
3. Bart Grahl and Paul Piccone (eds.), *Towards a New Marxism*.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3.
4. 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9.
5.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6. Gerard McCann, *Theory and Histor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E. P. Thompson*.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1997.

7.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8. Louis Althusser, *The Spectre of Hegel: Early Writing*.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88.

9.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10.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New Left Review (ed. ),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New Left Books/Verso, 1977.

12. Norman Fischer *et al.* (eds. ),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rxism*. Sussex: Harvester, 1982.

13. Robert A. Gorman (ed. ), *Biographical Diction of Neo-Marx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5.

14. Russell Jacoby, *Dialectic of Defeat: 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Tom Bottomore *et al.* (eds. ),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

钟送黄昏鸡报晓，春夏秋冬弹指间。数载时光荏苒，攻读博士学位的求学生涯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渐渐远去。本文最初构思于2006年，作为博士论文写作于2007年3月至2008年4月，是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从理论回归实践——佩里·安德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基础上，在俞吾金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两年的潜心思考撰写而成的。

博士毕业后的我年少轻狂，眼高手低，一直期盼能过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哲学生活，以为如果自己愿不揣浅陋，孜孜不倦地探索和求知形而上学的真理，便肯定能为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增添一抹新的亮光和色彩，为人类灵魂的拯救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对佩里·安德森不太形而上学的话语总是有些抵触，同时因为安德森思想的广博性又觉得难以把握，故而总是不愿意真正用心去研究和投入实际的写作。在此期间，每逢面对恩师俞吾金或陈学明教授询问论文修改进度时，均羞愧有加。

真正决定动笔进行大动作修改并出版是在2015年夏天。通过前几年的阅读和积累，特别是2013年前往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2014年前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跟随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博尔(Roland Boer)和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访学进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有了亲近和喜爱之情，对安德森看似简略却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也渐生钦佩之意。当然，这一工作最终能付诸实施，与

我最为尊敬的长辈学者陈学明教授、吴晓明教授等爱之深、责之切的提携关爱密不可分；与汪行福、王凤才、张双利、林晖、吴猛等同门师兄（姐）弟的关照帮助密不可分；亦与内子莉莉的任劳任怨和小女贝贝与可可的聪明可爱密不可分……在此，诚挚感恩、感激每一位支持过我的长辈与朋友。现如今虽然恩师俞吾金教授永远离我而去，未能亲眼见到本书的付印出版，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必也甚感欣慰。我也将以此为起点，心怀感恩，砥砺前行，以求不再辜负恩师多年的栽培和期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参阅了国内学者翻译的有关原著，参考、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我向所有译者和著者深表谢意。当然，本书的顺利出版，与重庆出版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更是得益于王晓静、秦琥编辑夙兴夜寐的辛苦工作，借此机会，一并感谢。由于本人学识和能力所限，难免挂一漏万，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指正、赐教。相关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我今后还会陆续发表一些有关这个主题的心得与体会，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鲁绍臣

2015年9月于复旦大学